

炎黄春秋



张学思(右)陪同周总理,邓颖超视察大连海防

瞿秋白狱中遗言: “日后自有定论”

杨西光与第一篇
“真理标准”文章的发表
忍辱负重
战死沙场的左权将军

张学思与张学良
的手足情

冤案十载民告官
天人相助得平反



左权将军

5
95

慘離年華
 終皓首宜毒
 聲遙長秋野
 一夜帶水空
 險阻劫嶠同
 胞染香情

甲戌年
 小如

本页内容详见《书法家吴玉如书赠条幅张大千》一文

祖國統一 乃全國人民之寶 如先生切實辦法 有求必應 永銘上心 謹此

炎黃子孫
統一

乙丑夏日奉寄平海親

有年務見
其書以先生
持贈愚師
張子光先生
李富祥 識
一九八二年
於南京書畫院
逢念故人
李里祀切
六月中旬
懷石
兩篇共四卷
相協協主祝
元八十年之幸
張書

[illegible]

本期导读

瞿秋白狱中遗言：“日后自有定论”

长期以来，瞿秋白屡受误解、诬陷和打击，直到他壮烈就义 50 年后，盖棺才得以论定。由此可见，“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说时容易做时难！难就难在破除迷信，排除干扰，扫除种种曲解与偏见，还历史以原貌。尽管千难万难，共产党人也一定要具备这种精神、勇气和追求。

“芦沟桥事变”时的守桥排长李文成

芦沟桥畔的硝烟虽已消散，浴血抗敌的英烈虽已长眠，这一段历史却是我们永远不能忘却的。至今健在的当年守桥排长李文成，作为历史的见证人讲述了他和战友们挥刀杀敌、血战疆场的惊心动魄的经历。

杨西光与第一篇 “真理标准”文章的发表

善于发现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的真理，这固然需要丰厚的学识和敏锐的头脑；而要冲破思想禁锢，甘担政治风险，把这一真理传播于世，则更需要无畏的勇气和坚韧的魄力。请看，第一篇《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文章，是怎样被发现和发表的。

冤案十载民告官 天人相助得平反

要法治，不要人治。京东三河县白庄村农民以自己的血泪申诉，向当权者发出正义的呼声！农民抵制违法占地，这本是维护法制的正当权利，却因此遭到人命关天的不白之冤，十年之后，才得以平反。此中隐情令人愤慨；当代青天，值得赞扬。

忍辱负重战死沙场的左权将军

他毕业于闻名世界的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参加了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长期担任军队的高级领导职务，参与策划了著名的百团大战。他就是 1942 年 5 月战死在抗日前线的八路军最高将领左权。本文不仅介绍了他的聪睿才智、赫赫战功，也向读者展示了他那令人感叹的忠贞不渝、忍辱负重的精神和操守。

张学思与张学良的手足情

在近代历史舞台上，像张学思与张学良这一双亲密兄弟与患难手足，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了。从他们的传奇生涯中，折射出时世沧桑：帅府兴衰，国恨家仇，“西安事变”……直到周总理拉着张学思和杨拯民两对夫妇，潸然泪下，真使读者为之动容。

下期要目

- △历史巨变：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国前后
- △忻口战役国共协同作战纪实
- △“文革”后同“两个凡是”的那场斗争
- △几乎断送“包产到户”的“张浩事件”
- △广东方方“地方主义”冤案始末
- △夏衍与潘汉年的挚友情
- △罗荣桓元帅的夫人和子女
- △我与蒋纬国先生的同窗交
- △日本有些人为什么老想为侵略战争翻案
- △明代的特务机构——东厂

目 录

春 秋 笔	轶闻录	同心结	艺苑志	文荟园	人海浪	古镜台	古今谈
④⑧ 长沙大火及其引发的一场笔墨官司 辛 平 ⑤③ 天下第一「血」 杨顺东 周 哲 姚 奇 ⑤⑦ 武汉「七·七」献金运动 陆茂清 ⑤⑨ 以戎攻心 宫洁民	⑥① 藏匿在赛珍珠名著中的间谍秘密 马牧英	⑥⑧ 炎黄子孙盼统一 明月何曾照两乡 王浞华	⑦⑦ 奉系军阀并未禁演《风还巢》 葛献挺	⑦② 思故人兮沉心曲 郑 晋 王 恂 ——学者吴晓铃谈往录	⑦⑤ 丁肇中的科学之路 桂 峰 ⑧⑦ 巾幗大使施燕华 宗道一	⑤② 历史的铁证——台湾制「康熙通宝」 张志煌 ⑧④ 康熙和平统一台湾 陆茂清	⑧⑥ 曹操性格琐议 何轶光

瞿秋白狱中遗言：『日后自有定论』

——对瞿秋白几次重要的历史评价

● 温济泽



1927年瞿秋白在武汉

历史上的功罪，日后自有定论。

我也不愿多说，……

——瞿秋白 1935 年 5 月 28 日
在汀州狱中给郭沫若的信

引言

有些人死了，继续在人们的心里活着，一代一代地活下去，永远永远地活下去。瞿秋白就是这样一个人。

有些人死了，盖棺未能论定，人们重新研究他，深入剖析，细密了解，终于认清和恢复了他在历史上的本来面目。瞿秋白就是这样一个人。

瞿秋白从容壮烈就义，是在 1935 年 6 月 18 日，至今 60 年了。

瞿秋白殉难之时，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正在艰难的长征途中，华夏的大部分国土被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着，东北已经变成完全的殖民地。在上海的他的挚友鲁迅得悉噩耗之后，强忍着悲痛，支撑着病体，把瞿秋白去瑞金时留存在他那里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高尔基等文学作品的译著，编成一部《海上述林》，分为上下两卷。当时国内不能出版，鲁

迅托日本朋友把书稿寄到东京，以“STR 译著”（史铁儿是瞿秋白的一个笔名），“诸夏怀霜社校印”（诸夏：全中国，怀：怀念，霜：秋白曾用名）的名义出版。鲁迅悲愤地说：“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一个示威！”“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

瞿秋白被害，引起中国和世界的震惊。上海的《申报》、天津的《大公报》和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等报刊都及时报道了他牺牲的消息。在纪念瞿秋白殉国一周年的时候，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秘密出版过一本《纪念我们的民族英雄和人民战士》，莫斯科用中文出版了一本《殉国烈士瞿秋白》。在后一本书里，有陈云、李立三、肖三、杜宁（杨之华）等同志的悼念文章，还有共产国际和日本、英国、美国、德国、加拿大等共产党人的纪念文字。此后，在每年这个忌日，国内外差不多都有些报刊发表纪念和缅怀的文章。

象征着无数先烈血染的五星红旗在祖国上空升起以来，全国报刊发表的怀念和研究瞿秋白的文章更多。据《瞿秋白研究资料索引》（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编，1985年出版）的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到1965年，这方面的文章就有222篇，平均每年约14篇；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些年不去算它了；从1978年到1984年，有336篇，平均每年48篇。另据瞿秋白纪念馆的粗略统计，从1985年到1994年，有500多篇，平均每年50篇以上。在同期出版的瞿秋白研究专著和传记等书籍约40本。瞿秋白纪念馆是1983年在常州筹建的，自1985年开馆以来，参观者络绎不绝，每年人数多达五六万人。去年这个纪念馆被评为全国14个优秀社会教育基地之一，这固然由于全馆同志的努力，瞿秋白的威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事实说明：凡是为人民立了功勋的人，中国人民是永远忘不了。

上述文章和书籍都对瞿秋白作了崇高的评价。本文不去谈论这些，这里只就中共中央文件和领导人正式讲话（或题词）中5次对瞿秋白的历史评价，作一简要的回顾。瞿秋白在就义前给郭沫若的信中说：“历史上的功罪，日后自有定论。”本文所要评述的，是“日后”经过多少年月、多少曲折才“自有定论”，以此祭奠秋白同志的在天之灵。我也希望人能死而有知，这也可以告慰秋白同志于九泉之下了。

第一次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扩大的七中全会通

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两处提到了瞿秋白同志。

其一：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

其二：“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他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当时我是一个普通党员，在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当编辑。我是在1945年8月听到这个决议的口头传达的。传达人是《解放日报》的一位副总编辑，七大的代表。他按照《决议》文本逐段宣读，让我们逐段提问和讨论。我听到瞿秋白同志的名字，特别注意。

我是在1930年初看了瞿秋白的两本书之后加入共青团的。一本是他编译的《社会科学十二讲》，一本是他在党刊《布尔什维克》上连载的批判三民主义的5篇文章的汇集。我把瞿秋白看成是自己走向革命的引路人，而深深敬仰。这一年冬天，我到了上海，做地下工作，知道瞿秋白是党的领导人，使我对他更加尊重。1935年，大约八九月间，这时已是我在苏州军人监狱坐牢的第三年，听一位新关进来的难友说，瞿秋白同志已经不幸牺牲。他还讲述了从报上看到的瞿秋白奔赴刑场时手夹香烟，顾盼自如，唱《国际歌》，呼口号等情景，这给我永远不能忘却的印象。这些就是传达时听到瞿秋白同志名字引起我特别注意的原因。

从传达中，我知道了瞿秋白“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六届四中全会上对他的“打击”是错误的。这时已是在六届四中全会之后15年，在瞿秋白“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后10年。我深为瞿秋白同志不平，也为第一次听到对他的平反而高兴。至于六届四中全会为什么和怎样“错误地打击”他，当时及以后一个很长的时间，我是不怎么清楚的。“文化大革命”之后，我研究了党的一些历史问题，特别是去年以来，读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关于党的历史文献的编辑和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等一系列文章之后，才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六届四中全会是在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操纵之下召开的。“毛主席批评瞿秋白在党内没有多大经验，是一介书生。王明、博古在党内没有什么地位，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结果让他们夺了权力。四中全会

上王明实际上做了总书记。后来上海党中央被破坏后，成立临时中央，博古实际上做了总书记。”“四中全会时，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夺权，当时的中央招架不住。”“四中全会不太合法，是闹出来的。推选的领导人不能反映出党的情况。王明、博古等人原先都不是中委，都是米夫等人搞的鬼。”“四中全会以前就是王明在那里闹，米夫与他的搭档，互相配合，互相利用。”“四中全会就错了，不仅是政治路线错误，所采取的组织形式在党内也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很多同志说是篡权。”（以上所引，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6—47页，66—67页。）

六届四中全会撤销了瞿秋白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以后不断地诬陷和打击他，不分配他工作；1934年初，他奉命去了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仍被排斥在党的领导之外；长征前夕，瞿秋白要求同行，“被故意与恶意地拒绝与丢弃”了，此时“中央领导变为三人团，变为外国顾问一人专政，剥夺政治局委员过问军国大计的权利，甚至根本停止政治局的工作，‘则是宗派主义在最高领导机关中发展到了极点的时候’，达到这样恶劣的组织政策与干部政策，是任何过去犯路线错误的时期所没有见过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29页）瞿秋白同志就是这样被“丢弃”在红军主力撤走的苏区，最后不幸被俘以至“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这些就是当时宗派主义错误领导对瞿秋白同志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第二次

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题词。全文如下：“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下面是毛泽东的签名和日期。

题词所说的“遗集”，是指冯雪峰主持编辑，1953—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那套《瞿秋白文集》，只是文学方面的，共4册。令人难解的是，当时这个题词并没有在这部文集上刊登，也没有在报刊上发表。直到1980年以后，我们受命重新编辑《瞿秋白文集》时，才从中央档案馆发现这个题词。经批准，我们把这个题词

首次发表在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选集》上。

现在没有人知道这个题词被搁置达三十多年而没有发表的原因。我们只能肯定，这是毛主席亲笔写的，按照毛主席写明的日期，应当是中共中央和党的领导人对瞿秋白同志作出第二次正式的重要的历史评价。

第三次

1955年6月18日，这是瞿秋白就义二十周年纪念日，上午9时，中共中央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隆重的瞿秋白遗骨从福建长汀迁到北京的安葬仪式。

主祭人是周恩来，陪祭人有董必武、陆定一、周建人、叶圣陶、许广平等。中央机关有关干部、亲属杨之华及生前友好等参加了这个仪式。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作关于瞿秋白生平的报告。他首先说：“今天是瞿秋白同志就义二十周年纪念日。我们选择这个日子来安葬他的遗体，并对他表示我们的深深悼念和崇敬。”他说：“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他在报告瞿秋白生平时着重地说：“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瞿秋白同志同毛泽东同志、任弼时同志在一起，为维护党关于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驳斥了资产阶级右翼的反苏反共的谬论，也批评了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最危急的关头，他同其他同志一起，在八月七日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紧急会议，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革命统治的正确方针。在这次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书记。”（按，瞿秋白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后被选为常委，主持中央工作，实际上是书记。）报告接着说：“一九三〇年，……他主持了中国共产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当时党的领导机关的冒险主义路线的错误。”“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瞿秋白同志在上海同鲁迅先生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在这个期间，他曾致力于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介绍俄国和苏联的文艺作品，对中国的革命文化运动作了重要的贡献。”报告最后说：“瞿秋白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忠诚的战士。他献身革命直到最后一息。他的高贵的品质和毕生功绩将活在人民的心里，永垂不朽。”

瞿秋白同志墓，位于任弼时同志墓东面。墓前立着高大的汉白玉的墓碑，碑的正面刻着周恩来同志题

写的“瞿秋白同志之墓”七个大字，碑的后面刻着陆定一同志上述报告的全文。

我参加了这个仪式。仪式结束之后，我问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还有其他同志的遗体要迁葬北京吗？”他微微叹了一口气说：“我们牺牲的同志太多了，中央只决定迁葬秋白同志一个人，别人就不再迁葬了。”当时我深感觉对瞿秋白同志的特殊敬重。

我又问杨之华：“《瞿秋白文集》只出版了文学方面的著作，政治理论方面的著作还要出版吗？”她告诉我：“这是中央的决定，只出版文学方面的文集，政治理论方面的不出了。”我又问：“为什么？”她说：“中央认为那些文章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很不够。”我说：“不论怎么说，这些都是党在历史上的重要文献啊！”她告诉我，她也有这个想法，并且自己已经开始在搜集整理。我表示愿意帮助她，我说：“整理出来，不能出版，也可以送交中央档案馆保存。这是很重要的历史文献啊！”

不久，我去她家，她把已经搜集到和复写好的一百多篇文稿郑重地交给我。那时候，她在全国总工会任主席团委员兼女工部部长，我在中央广播事业局任副局长，都只能挤出业余时间来做这个工作。我们本职工作都很忙，空下的时间很少，因而进度非常慢。不到一年，整风开始，很快又转为反右派斗争，斗争之火越烧越旺，快烧到我的身边。在我感到快被隔离审查的前夕，急急忙忙又把全部文稿郑重地送还给杨之华。我们都很难过，相约过了这阵子再继续搞，没有想到一下子等待了二十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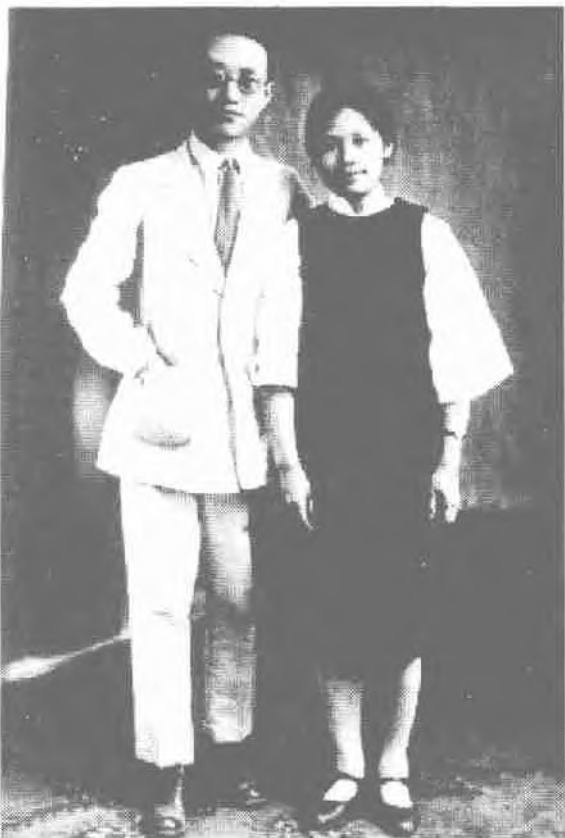
第四次

“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拖进了黑暗的年月。华夏大地上，天昏地暗，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康生、林彪、“四人帮”这伙罪魁祸首，兴风作浪，仅在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央监委、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中，就有三百多人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已达31年之久的瞿秋白同志，也遭受到这伙恶人的诬害和凌辱。他们硬把瞿秋白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断章摘句，任意歪曲，诬称之为“叛变投降的自白书。”

在这伙恶人的指使下，红卫兵成立了所谓“讨瞿”战斗队，办起了诬蔑瞿秋白的“战报”，发出了“讨瞿”的叫嚣。1966年10月的一天，某些大学和附中的红卫兵一百多人，手持铁锤、铁铲、斧头等工具，冲进

八宝山革命公墓，试图挖毁瞿秋白的墓穴。因为灌注坚牢，未能毁坏。他们从早砸到晚，把瞿秋白同志的墓碑和其他一些烈士的墓碑砸毁了。直到1983年，江苏常州瞿秋白纪念馆筹建之时，才将砸坏的瞿秋白墓碑碎块运去保存，永留纪念。当年参加砸墓的红卫兵，都是些十几二十岁、对历史无知的上当受骗的孩子，你们到什么时候才知道干了这么一件错事和坏事啊？！

“文革”的悲剧结束之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首先抓“文革”中受迫害的大案要案，为受诬者平反昭雪。1979年，中纪委在常委曹瑛同志分管下，成立第八组，由孙克悠同志任组长，专门进行瞿秋白被捕就义情况的复查工作。全组同志在北京，又到杭州、上海、常州、南京、长汀等许多地方，访问了所有有关知情的人，查阅了一切有关的档案材料，作了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1980年写出了《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说明：瞿秋白同志被捕后，“拒绝劝降”，“坚持了党的立场，保持了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雄气概。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可歌可泣的革命先烈。”至于《多余的话》，迄未找



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

到手稿,即使就流传的这个《多余的话》而论,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客观地全面地分析《多余的话》,它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

1980年6月17日,这是瞿秋白就义四十五周年的前一天,经中央同意,由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举行纪念瞿秋白同志就义四十五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首先回忆了1955年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瞿秋白遗骨安葬仪式,感慨地说:“匆匆又过了二十五个年头。这期间,一位杰出的革命先烈,在离开人世三十年之后,也象我们许多活着的人一样,遭到了莫大的凌辱,经历了一场令人震惊的磨难。回忆当初我们怀着虔诚的崇仰之情,把他的遗骨从福建长汀迁葬北京的时候,哪里料到秋白同志的‘寂寞身后事’会是这个样子呢!但是‘四人帮’一旦被铲除,大家就立刻想起了秋白同志,为他身后所蒙受的冤屈愤愤不平。”他评价说:“秋白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才识卓越的领导人,他不仅挑起过革命实际工作的领导重担,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无产阶级文化事业建设上,做了大量开拓性、奠基性的工作。”“他有一颗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一切的火热的心。”他有“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的热烈愿望。“在这条道路上,不管有多少风险,他坚持走到了底。他作为一个饱经风霜的敏感的文人学者,纵然有时也不免流露出低沉伤感的情绪,但他始终保持了对革命的忠诚信念,在敌人和死亡的威胁面前无所畏惧。秋白同志的革命一生将永远为人民所纪念。”

曹瑛同志代表中纪委在会上介绍了对瞿秋白被捕就义情况复查的经过。他说:“瞿秋白被捕以后,丝毫没有做危害党和革命的事,而是坚信马克思主义,大义凛然,宣传革命,痛斥敌人,最后壮烈牺牲。”周扬的讲话,第二天在《人民日报》头版新闻中着重报道。此后不久,中纪委的《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也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全党。

在这次座谈会上,李维汉也发了言。李维汉在八七会议上同瞿秋白一起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同瞿秋白一起受到错误地打击,被撤销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李维汉在发言中说,他在他们被撤销职务后当天,曾问过瞿秋白准备怎样办,瞿秋白回答说听从党的分配,以后几年果然行如其言。他又说,秋白是正派人,能平等待人,愿听取不同意见,能团结同志,能服从组织和遵守纪律,在党的历届主要领

导人中,他是最能贯彻民主集中制的,不搞家长制。1935年被捕以后,他宁死不屈,英勇就义,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他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座谈会上宣布,中共中央已经批准搜集瞿秋白同志的文稿,重新编辑出版包括他的政治理论著作在内的《瞿秋白文集》。中央文献研究室兼主任胡乔木把这个任务委托给周扬,并要我协助他。1982年,周扬病了,就把这付担子让我挑上。

陆定一同志未能参加这次座谈会。他是与瞿秋白一起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工作过的。他尊称瞿秋白为“我的老师”。他后来在1991年出版的《陆定一文集》的《自序》里,对瞿秋白写的《多余的话》作了解释,他写道:“我现在认为,这不是情绪消沉,而是秋白同志有内疚。《多余的话》说,‘我是一介书生’,把我推到领袖的地位上,这是‘历史的误会’。秋白同志所以内疚,是因为他当了共产党的领导人,但没有把王明路线反掉,以致革命遭到灾难,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有愧于被推为领袖。”定一同志说,他把“这个想法原原本本写在这里,还我思想上的欠债”,我看这也是对《多余的话》的误解和曲解的澄清。

第五次

我从1980年协助周扬同志筹划重编出版《瞿秋白文集》,1982年周扬同志患病之后,这付担子就全落到我的肩上。

我开始时找了瞿独伊同志,希望找到二十多年前她的母亲杨之华曾经辛辛苦苦地搜集和整理的瞿秋白的一些文稿。杨之华已在1973年被迫害致死。那些文稿,早在“文革”初期被抄家时已不知去向了。后来又从人民出版社得知,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已经有几位同志在搜集、整理和研究瞿秋白的文稿。我就请他们和我们在北京组织起来的一些同志,组成一个大的《瞿秋白文集》组,下面分成两个小组:政治理论组和文学组。政治理论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丁守和同志负责,文学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士菁同志负责。瞿秋白文稿有五百多万字,计划首先编出一本《瞿秋白选集》,同时着手编辑《瞿秋白文集》。文稿的政治理论部分有三百多万字,编为政治理论编,分为8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文学部分有二百多万字,编为文学编,分为6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总共14卷。因为所有参加编辑工作的人没有一个是专职的,都是挤出业余时间来从事搜集、整理、研究注释和编辑

的，而大家又分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央党校、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十几个单位，平时联系都不容易，因此整个工作进度缓慢。到1985年，只出了一本《瞿秋白选集》和一本《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一卷。

在研究和编辑的过程中，特别是政治理论组的同志们提出，过去不出版瞿秋白的政治理论著作，说他的这些著作理论联系实际很不够，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是，早在1927年，瞿秋白就说过：“革命的理论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分离。”瞿秋白的大量著作不仅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注重了马克思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关于中国社会阶级的分析，关于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关于农民运动和教育农民的重要性，关于无产阶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关于武装斗争的重要作用，等等，对这些问题他都有所论述，虽然当时党处在幼年时期，他自己也年轻，在论述中不免有些幼稚、不成熟或者不正确的地方，但是他毕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联系起来了，成为我们党早期探寻中国理论和革命道路的先行者之一。研究党史，对于所有先行者们的功绩决不应贬低和抹煞。丁守和同志多次同我谈论过这个问题，我们商定应当把这个看法和意见汇报给中央党史领导小组。1985年5月初，那时候，我患脑血栓初愈，刚出医院不久，就拄着拐棍到乔木同志家里，向他作了汇报，要求中央能对瞿秋白同志进一步作出全面的如实的公正的历史评价。谈的时间不长，乔木同志当即表示完全同意。

1985年6月18日，这是瞿秋白同志就义五十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纪念会，纪念会由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主持。彭真、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万里、习仲勋、宋任穷、胡乔木等，与瞿秋白同志在工作上有过联系的党内外老同志，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瞿秋白同志亲属和生前好友二百多人参加了纪念会。

中央政治局委员杨尚昆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开头说：“今天我们举行这个会议，纪念瞿秋白同志就义五十周年。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长汀，瞿秋白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那时，他刚刚三十六岁，秋白同志在短暂的一生中为中国革命艰难创业，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牺牲，他的崇高的献身精神和巨大的革命功绩，在半个世纪之后，仍然受到党和人民的景仰和怀念！”他接着说：“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他对秋白同志在

党的政治理论建设方面的评价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研究工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的国情，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在他的论述里，虽然不免包含某些偏颇和失误，但是他无疑是我们党早期探寻中国革命理论和革命道路的最优秀的先行者之一。”对他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功绩评价说：“他同党的其他领导人和党外革命人士一起，努力促进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发展，推动广东国民政府进行以北伐战争为中心的各种革命运动，开创了轰轰烈烈的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大革命崭新局面。”他讲到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主持召开八七会议时说：“这次会议开始把革命从惨重的失败中挽救过来，实现了我党发展进程中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会后，秋白同志勇敢地担负起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重任，主持中央工作，……他同战友们一起，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和振兴革命，开辟革命的新时期，这个功绩是不可埋没的”他讲到瞿秋白在党的六大之后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这一期间的工作时说：“在对待共产国际某些‘左’倾政策，处理中山大学风潮，反对米夫、王明的宗派活动等方面，都坚持了正确立场。”在讲到秋白同志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米夫、王明一伙的报复、诬陷和打击，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之后，同鲁迅一起积极参加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时说：“他是党内最早认识和高度评价鲁迅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杰出作用的领导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树立了不朽的丰碑。”在讲到秋白同志到了苏区，最后要求参加长征没有得到批准，终于被迫留在苏区以致不幸牺牲时说：“他是遭受以王明为首的‘左’倾路线最残酷迫害的领导人之一。”尚昆同志最后说：“我们隆重地进行这些纪念活动，就是为了如实地确定秋白同志在党的历史上的地位，正确地评价他革命的一生，扫除在他生前身后横加给他的一切诬陷的灰尘，恢复和发扬秋白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运动史上杰出的早期领导人的光辉。”最后又对秋白同志的一生作出评价说：“秋白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的一生。他是中国现代革命知识分子的一个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从没落的封建家庭中叛逆出来，经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走向了共产主义。在党还十分缺乏马克思理论和革命实践经验准备的幼年时期，他担负了中国革命道路的开拓者的重大责任，他没有辜负时代和人民的托付，为寻求中国革命的真理，为开创中国革命的大业，奉献了毕生的心血以至整个生命，作出多方面的卓越贡献。无论是在疾病缠

结 语



瞿秋白烈士纪念碑

身的时候,在极端残酷的白色恐怖中,在党内遭受无理打击和迫害的逆境里,秋白同志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革命气概,他无保留地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勇于进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探索 and 解决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的毅力;在对敌斗争和党内斗争中是非分明、立场坚定的原则态度,服从大局,不谋私利,团结同志,模范地遵守纪律的品德;言行一致,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勇于自我批评的作风;所有这些,连同他的思想文化理论方面写的五百多万字的著述和译作,是先驱者为后人留下的极为珍贵的精神遗产,值得全党和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认真地学习和继承。”

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杨尚昆同志的重要讲话,并在头版显著地位刊登了纪念会新闻报道,肩题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就义五十周年”,大字主题是“党中央举行纪念会作出公正评价”,副题中说“杨尚昆代表中共中央讲话高度评价瞿秋白革命的一生,扫除横加于他生前身后的一切诬陷的灰尘”。配合新闻报道还登出瞿秋白的照片,下面注着“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领导人瞿秋白”。

从1931年瞿秋白遭受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地打击”,到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作了清算,并对瞿秋白问题作出正确的结论,这期间经历了14年。这个时候,瞿秋白牺牲已经10年。怎么会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呢?这同历史上我们对于共产国际的迷信有关,也同当时处于战争环境,情况复杂,有些事不容易很快弄得清楚有关。从1945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这11年期间,一直保持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瞿秋白所作的评价,其间陆定一同志评价过瞿秋白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文化方面的重要贡献。“文化大革命”中,再次遭到恶毒的诬陷。到1980年,才得到昭雪平反。又过了5年,1985年,杨尚昆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讲话中对瞿秋白的一生作出了全面的如实的公正的评价。这个时候,已经是瞿秋白英勇牺牲之后50年。为什么过了这么长时间才能够作出全面的如实的公正的评价呢?这又和后来我们党逐渐产生“个人崇拜”和“现代迷信”,不顾历史地忽视和贬低先行者有关。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恢复和发扬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破和消除了“个人崇拜”和“现代迷信”,加上对瞿秋白的生平 and 著作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之后,才使作出对瞿秋白的全面的如实的公正的评价有了可能。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们的主观认识往往不符合客观实际,有时候差距很大甚至相反。瞿秋白就是一个许多年不被人了解而受人误解,甚至屡受凌辱、诬陷和打击的人。他说过:“历史上的功罪,日后自有定论。”谁曾料到得出这个全面的如实的公正的“定论”竟在他死难之后50年呢?而他一生在人世间只活到36岁啊!“实事求是”,我们说了多少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例如对有些事实的澄清,对有些人的“定论”,却又这么困难,这么曲折!能不让人感叹吗?从对瞿秋白评价的这段历史来看,我们应当深切思考,从中吸取应得的沉痛教训。

(责任编辑 王 恂)

杨西光与第一篇“真理标准”文章的发表

● 王强华



杨西光同志

1978年4月10日，一张《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第77期）大样，按规定送到了当时总编辑杨西光的案头。他立刻被《哲学》上的头条署名胡福明的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吸引住了。他在详细审阅了该文后，把我叫去，要求把它从专刊上撤下来。杨西光提出的意见有两条：一、象这样重大主题的文章应放在第一版刊登，在专刊上发表影响小，太可惜了；二、文章要作重大修改，主要是应针对当前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混乱思想，作比较充分的论证；要进一步触及当前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冲破禁区的一些现实问题，提到理论和思想路线上来的批评、阐述。

胡福明当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师。他的这篇文章是我在1977年8月到南京参加一次理论讨论会时向他约的稿，原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稿子寄来后，从1978年1月14日发排到4月10日经过了5次修改，才送到杨西光手中。对杨西光的两条

意见，第一条我照办了，当即把文章撤下，换了现在《哲学》（第77期）上刊登的那篇文章。但对第二条却感到为难，因为按杨西光的意见，文章要作很多修改，而作者又远在千里之外的南京，来不及征求意见。作者是一位大学教师，在南京理论界有一定影响，这样做就心他会有意见。杨西光说没关系，改出来后可以用你的名义发表。杨是从政治家的角度办报，考虑的是大的问题，只要能够尽快发表，用谁的名义则是次要的。可我作为文章的编者，又是我约来的稿子，就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

无巧不成书。正当我两难之际，胡福明从天而降。他是从南京到北京来参加国家教委召开的一个哲学教材（或辅导材料）座谈会的，住在朝阳门外的那个招待所里。他一到京就与我联系，我把杨西光的意见告诉了他，同时又立刻向杨西光报告。杨很高兴，说赶快把胡福明找来报社，一起讨论文章的修改。

4月13日是周末。吃完晚饭，我就乘了杨西光的小车到朝阳门外的一个招待所，把胡福明接到报社。接着，又按照杨西光的意见，到阜成门外把当时中共中央党校教员孙长江请来。孙是党校《理论动态》（内部刊物）的编辑，当时党校副教务长吴江与他也正在撰写一篇主题与胡福明的文章差不多的文章。杨西光知道此事，就让我把孙长江请来。

是日晚7点多钟，杨西光、胡福明、孙长江，还有当时分管理论宣传小组成员马沛文和我，就在杨西光的大办公室里开了会。开始时，杨西光说明原委，还说了当时的形势，接着就询问孙、胡二人对写这样主题文章的基本思路 and 重点。胡福明认为重点应该放在理论上分清是非，而孙长江认为主要应放在思想路线上分清是非。杨西光当场决定，你们二人可以按照各人的思路写，光明日报都给你们发表，谁的文章先写好，定了稿，就先发谁的，两篇文章都要发。

接着在杨西光的主持下，对胡福明的文章进行了讨论。大家认为在当时撰写这样的文章，意义重大，要保持原稿的长处，并议定了修改的原则意见。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文章一定要解放思想，批评“两个凡

是”，冲破禁区。这个意见是杨西光提出来的。对“两个凡是”的批评，最早是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5月24日与中央两位同志谈话中提出来的（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页），但一直没有向下传达，许多同志包括我在内，当时都不清楚，所以在胡福明的原稿和我们历次的修改稿中都没有涉及。由于我觉得这个问题重要、新鲜，就在我的笔记本上记下了“两个凡是”这四个字。现在人们对“两个凡是”的危害是非常清楚了，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杨西光敢于明确提出批评“两个凡是”，是一个大胆的意见，画龙点睛，一下子就把文章的要害抓住了，把主题升高了，实在功不可没。后来我们在修改稿子时，就十分注意贯彻这个意见。在一次改稿中，曾经在两处明确提到革命导师“并不认为凡是……并不认为凡是……”，以后又就心这么提太露骨了，就改成现在发表的那样：“他们（革命导师）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接受实践检验的；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这么一改，“凡是”的字样是没有了，但精神没有变，文章仍然是针对“两个凡是”的。

会议结束以后，胡福明、孙长江回去分头行动。胡福明很勤快，而且又有现成的稿子在手，所以第二天就改出来了。第三天我们派人取回了他的改样。杨西光、马沛文和我又一起审改了一、两次，认为基本上可以了，就派人送到中央党校吴江、孙长江审看，他们很快就告知认为文章有基础，愿意把他们正在撰写的文章放下，集中力量参加对胡福明文章的修改（这时胡福明已返回南京了）。以后又经过了几次修改，最后送交当时仍在主管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胡耀邦审定发表。《理论动态》是旬刊，逢十刊出，这样文章就定在5月10日刊登，文末注由光明日报供稿，第二天即5月11日由《光明日报》公开发表。

（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纸评论员文章发表以后，特别破天荒的是，第二天由新华社全文发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全文转载以后，各方面反映异常强烈。据统计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各大军区的负责人，都先后发表谈话、撰写文章，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中的观点，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时间从1978年8月到1979年6月，历时近一年之久，形成了强大的政治、舆论力量。许多人和外国新闻媒介纷纷打听这篇文章发表的背景和“来头”。

杨西光规定不许我们介绍文章发表的过程。经我直接处理的有两件事：一件是中共江苏省与湖南省，结成互帮互学的“姊妹省”，省里的一位与我相识的同志来电说，他受当时江苏省委第一书记许家屯的委托，询问这篇文章的背景，我向杨西光汇报，他明确指示只讲这篇文章是报社组织并修改发表的，其他都不要说。我照办了。这位同志与我是同乡，比较熟，但杨西光有言在先，我只有服从。另一件是，1978年下半年开始《光明日报》经中央批准，在各省恢复记者站，报社决定我到青海省建站。青海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与杨西光过去同是新四军的，后来又同在华东工作。在我离京赴西宁之前，杨西光给谭启龙写了一封信，来电说，他受当时江苏省委第一书记许家屯的委托，请他支持《光明日报》在青海建站。杨对我说，如果谭启龙要问及这篇文章，你就带个口信，说文章很重要，意义很大，而且要告诉谭这话是他说的。

（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以后，光明日报社的同志反映也不一样，但大家都非常关注，尽管角度不同。杨西光作为报社的总编辑，这篇文章的主要策划者、组织者，当然更加注视社内外的特别是上面的评论。后来我才听说，这篇文章不仅引起了新闻界、思想理论界的重视，而且惊动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一个时期内，“砍旗子”、“丢刀子”、“犯了方向性错误”等等“大帽子”劈头盖脑而来。这篇文章的发表，确如杨西光所说，是没有按组织系统向上级请示报告的，听说当时中央宣传部的领导同志竟因此被指责“没把住关”，而且规定《光明日报》今后再要发表这样的大文章要报告，征求意见。

可能就是由于出现了上述情况，杨西光在一个时期内神色比较严肃，大家心里多少也有些紧张。杨西光是不愿意同我们谈这些事的，但从我接触到的两件事，可见一斑。一是有一次下班以后，在他的办公室里，他一个人喃喃自语，大不了把“乌纱帽”丢了，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大意）当时我已感觉到问题的严重和他承受的沉重压力，由于我弄不清楚这是他在自我抒发情愫，还是对我说的，所以也没有答话。大家的这种心情，直到后来，特别是听到了邓小平同志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后，才算真正松了下来。小平同志在这篇讲话中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讲求实求是》，讲话虽然没有提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但通篇强调实践的重要，明确指出：“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

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4页）这篇讲话实际上是给发表和支持“真理标准”文章的同志撑了腰。

另一件就是本文前面提到的约请中央党校同志写文章的事。当年4月13日晚，当听到胡福明和孙长江等人认为，应当从理论或路线问题阐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并已经和正在撰写文章时，杨西光非常坚决、明快地表示两篇文章都应写，《光明日报》都给发表。但事与愿违，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胡福明撰写的第一篇文章以后，中央党校吴江、孙长江等写的第二篇文章却未能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而是在6月24日，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军报上发表了。这篇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文章当然也很重要，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不过由于它是在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以后刊登的，其“轰动效应”显然就受到了影响，但它毕竟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姊妹篇”，对推动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篇本来是《光明日报》约写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为什么后来却转到军报发表呢？现在外面对此事有种种说法，也许是真的，但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和分析，这里也有杨西光的苦衷或策略。本来，杨西光对组织和发表实践检验真理的文章是十分坚决和积极的，但是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以后，引起了上面的异常关注，特别是听到了关于《光明日报》以后发表重要文章要报告之类的“指令”，他对继续发表第二篇文章就不能不认真加以考虑和有所顾忌了。《光明日报》是直接由中央及中宣部掌管的报纸，而《解放军报》则直接由中央军委掌管，如果第二篇文章由《光明日报》“顶风”发表，难度较大，风险也较大，但如果改由军报发表，由一位思想解放、敢于负责的军委领导人审阅定稿和签发，（后来听说此文由罗瑞卿同志定稿签发的），也许就可以绕开“宣传口”而直接见诸报端。我认为基本情况可能就是这样的，否则无法解释杨西光那么热心于发表实践检验真理的文章，亲自向孙长江约稿，而最后文章却转到其他报纸发表的现象。当然，后来军报的文章在写作和发表过程中还有些什么内幕，局外人无法推测、判断，但我写的上述情况是确凿无疑的。

（三）

历史是必然的，但其中有许多偶然因素在起作用。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来说，那时是1978年，即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三年，中央提出的各行各业拨乱反正的任务正在深入开展，人们迫切

希望从根本上也即从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一再告诫的全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在深入人心。因此，象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或迟或早肯定要出现，这是必然性；但文章的题目、写法、发表在哪家报刊，用什么形式和名义发表，则又是偶然的。《光明日报》适逢其时，抓住时机发表了，但也仅此而已，任何人不能贪天之功为己功。

然而，偶然性中也有一定的必然因素。如前所述，如果没有报社总编辑杨西光，这篇文章就将在《哲学》专刊上作为一般的理论文章发表，它不会引起那么大的影响。而杨西光为什么对这篇文章情有独钟，竭尽全力抓它的修改、发表呢？我以为至少有两个原因。

杨西光是一位1933年入党的老同志，长期从事文化、教育、宣传工作。他在建国后就担任福建省委的宣传部长兼《福建日报》总编辑，后来调任上海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教卫部长，一度又兼任过《解放日报》总编辑。长期的政治斗争使他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和敏感。“文革”中他首先被“造反派”揪斗，当年上海批判的“党内走资派”的主要对象是“陈、曹、杨”，他是排在陈丕显、曹获秋之后的第三号人物，可想而知他在“文革”中是吃了很多苦头的，对林彪、“四人帮”那一套假“高举”，借“高举”之名行“整人”之实是深恶痛绝的。他正是怀着这样一种感情，冒着相当大的政治风险，组织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这是第一。

第二，也是无巧不成书。杨西光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在1977年4月被中央分配到《光明日报》担任总编辑之前，恰恰在由胡耀邦同志任常务副校长的中央党校高级干部班学习。据杨西光同志说，他在学习期间，参加过由胡耀邦提出并主持的关于“什么是检验历史的标准”的讨论。大家认为只有实践才是检验历史的标准，而领导人的言论不能成为检验历史的最高标准。杨西光是支持这一观点的，而且由此及彼，由“历史”发展到“理论”，认为检验理论的标准也只能是实践，而不能是领导人的言论。由于他有这样的思想、理论基础，加上从他明确提出要批评“两个凡是”上来看，他自然较早对小平、耀邦同志的一些思想、言论有较深的了解和理解。这又是偶然性中的必然因素。

（责任编辑 凌辰）

（王强华在《光明日报》是杨西光的助手，副总编辑，后曾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

忍辱负重战死沙场的 左权将军

高玉亭

一、被保送赴苏留学

左权 1905 年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一个农民家庭。读中学时，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阅读进步报刊，研究社会科学，立志为改造中国而献身。1923 年冬考入广州陆军讲武学校（湘军讲武堂），1924 年 8 月转入黄埔军校，1925 年 2 月经陈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随黄埔军校参加讨伐陈炯明叛变革命的第一次东征。在围歼陈炯明王牌军洪兆麟部战斗中，他率领的连队冲锋在前，缴获甚多，受到当时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赞扬。以后又参加回师广州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作战，负伤后仍坚持率部杀敌，获得胜利，战后受到传令嘉奖。同年 10 月，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在中国招收第一期学生，左权作为优秀军官被保送赴苏留学。

1925 年冬左权到苏联，先在中山大学学习，1927 年 9 月转入莫斯科陆军大学（又名苏联红军大学，也是闻名于世界的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这是一所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员的学校，进该校学习的人必须具备较高的军事素质。左权因才华出众和有在基层担任指挥官的经历，得到特殊批准而入该院学习。就在这年暑假将过，开学前夕，左权、董亦湘、陈启礼、萧劲光、李卓然、俞秀松等二十几个同学相约到在东方大学当翻译的孙冶方的宿舍，买来肉和菜，各显身手，做了中国饭，边吃边聊。正当热闹之际，擅打小报告的王长熙从窗外经过，听到屋里有江苏、浙江口音的很多人在谈话，便

把此事报告了学生会主席王明，并说这些人在搞“江浙同学会”。王明立即将此事报告了中山大学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说他发现江浙同乡会有托派嫌疑，并把左权划进了“江浙同乡会”。当时苏联正在进行反托派（即托洛斯基派）的斗争，苏联共产党中央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得知极为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召集在莫斯科学习的学生开会，斥责所谓江浙同乡会搞地方主义。此后，苏共以老党员寇尔山诺娃为首组成调查组，中共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为首组成调查组，经内查外调，一致认为并无“江浙同乡会”组织一事。王明、米夫并不甘心，他们不顾事实，仍把左权视为庇护江浙同乡会的一员加以反对。1929 年在莫斯科清党斗争中，虽然左权真诚地向党声明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和托派没有任何相同的地方，在组织上没有任何关系”，但仍然受到了国际清党委员会的批评，并且给予劝告处分。1930 年 6 月左权戴着“托派嫌疑”的帽子回国。

二、闽西肃反蒙受不白之冤

1930 年 6 月，左权回国后，9 月分配到闽西革命根据地工作。闽西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南方建立较早而比较巩固的苏区，后与赣西南苏区连结成为中央苏区。闽西苏区乘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无暇对付红军之际，得到了很大发展。随着时局的好转，党内“左”倾发展起来，中共中

央于1930年发出第70号通告，在对形势的估量和对党的任务、路线、策略等方面表现了明显的“左”的倾向，要求红军脱离农村根据地，在战略上向交通要道和中心城市发展。由于立三“左”倾路线的错误，导致闽西红军作战接连失败。就在红军与国民党政府军血战之际，闽西苏维埃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加紧反对取消派和广泛地开展“肃反”工作的指示，从1930年上半年在党政军内开始了“肃反”运动。当时闽粤赣特委主要负责人邓发在“左”倾思想指导下，混淆敌我界限，不加分析地把革命队伍内的思想问题同对敌斗争的政治立场等同起来，把干部群众中出现的不良行为和思想混乱全部归咎于地主、豪绅、阶级异己分子混进我党、政、军组织的破坏。特别是后来，邓发在“肃反”工作中偏听偏信于肃反委员会负责人林一株的个人意见，并放任其大搞逼供信，使闽粤赣苏区的“肃反”运动愈演愈烈，许多优秀干部和群众被诬陷，遭杀害，造成了严重后果。就在这种情况下，左权被派往闽西各地进行调查，改编部队。1930年10月，闽西红军第二十军和第二十一军合编组成新十二军。中共中央命令施简到闽西任新十二军政委，左权任十二军军长兼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教育长。1931年12月宁都起义后，左权调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政委。左权在任新十二军军长期间，闽西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三次大规模围剿。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首的党中央，不仅没有纠正立三的“左”倾路线，反而执行了一条更“左”的路线，在肃反问题上，进一步要求在苏区内“以最大的决心”反对取消派、AB团等，从而对苏区的“肃反”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左权的不白之冤一案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1931年红军打下闽西汀州（长汀）后，一天在军部开会，一团政委刘梦槐无意之中在施简（新十二军政委）的衣带中发现了一份由上海托陈取消派（即托派）邮寄的一份托派文件，刘团长当即将文件交给了军长左权，左权粗粗看说了个“没有什么”，即将文件装进衣袋。事后左权与项英一起去了江西。不久，施简做为托派被抓起来了，刘梦槐便把在施简衣袋发现托派文件的经过报告了苏区中央局，这就牵涉到了左权。左权奉命回到瑞金后承认刘梦槐所讲的事实，并检讨了自己因疏忽不知文件遗落何处的错误。同时向党郑重声明，自己未参加过任何小组组织的活动，与托派在政治上无任何相同之点，组织上无任何关系。但当时正值苏区肃反扩大化高峰，肃反委员会滥施酷刑，被抓者受刑不过乱招乱咬，左权也蒙受了不白之冤。当时虽因左权到苏区后工作一贯不错，未将他作反革命论处，但还是

撤掉了他十五军领导职务，同年秋调到瑞金工农红军学校（后改红军大学）任教官。1932年在邓发（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出席的红军军官学校会议上，宣布给左权以留党察看的处分。从此，左权背着处分，心里埋着委屈，默默地为党工作着，连自己的妻子刘志兰也不曾告诉。

三、忍辱负重赤胆忠心

左权蒙受着不白之冤，决心以行动证明自己的清白。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他忠心耿耿，兢兢业业，长期担任我高级指挥机关的参谋长工作，参与了许多重要战役的规划与领导，表现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和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



1925年左权（站立者）在留苏前留影

土地革命时期，他参加了反围剿作战。特别是在长征时，左权担任红军第一军团的参谋长。在辗转作战中，红一军团担任前卫，频繁的战斗带给他的是超负荷的工作，从后勤保障到前线战斗，事事都要经他筹划。抢渡大渡河、突破天险腊子口、直罗镇歼灭战、山城堡战斗等一系列对全局有重大影响的战斗和行动中，都

有他做出的巨大贡献。

1935年5月红军通过凉山后,准备强渡大渡河。蒋介石命令四川军阀杨森等部在大渡河堵击,并令薛岳、周浑元部衔尾猛追。5月20日,中央红军到达泸沽(今四川省冕宁县境),从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是大路,经越西,通过彝民区到大树堡,沿途敌人守备力量强;另一条是小路,从泸沽往冕宁,通过彝民区到达安顺场。为将敌人主力吸引在大道上,中央军委决定由左权参谋长率领红二师第五团一部和军团的侦察连,佯攻大树堡(今四川省汉源县境)钳制和吸引大树堡对岸富林敌之主力,以保证红军主力经冕宁北进,从安顺场抢渡大渡河。左权率领部队从泸沽一天行军150里赶到小相岭,消灭了扼守小相岭隘口的全部守敌。攻取越西县城后左权率领部队又一天行军140里从越西到达海棠,追歼了从越西逃跑的敌两个连,活捉了伪县长,而后部队赶到大渡河边的晒经关。派侦察员化装成川军,摸清大树堡敌情,然后指挥部队兵分三路直插目标,经激战歼灭守敌,占领了大树堡。左权亲临大渡河边,指挥部队佯攻,命令部队集木造船,砍竹扎筏,造成红军主力要在此渡河的假象,从而吸引大树堡对岸富林敌之主力,保证了刘伯承总参谋长、聂荣臻政委率领红军主力从安顺场顺利地强渡了大渡河。

1935年9月17日,中央红军到达甘肅迭部县的天险腊子口。聂荣臻、左权亲临腊子口前沿阵地察看地形,调查研究,帮助红二师制定作战方案。在杨成武等同志的指挥下,红二师第四团以两个连兵力攀登峭壁,从敌右侧后配合正面进攻,打垮了守敌甘肅军阀鲁大昌的部队,攻克天险腊子口,10月17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吴起镇。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正值蒋介石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国民党5个师分两路进犯,妄图在富县地区夹击红军。党中央、毛泽东决定集中会师陕北的各路红军,在直罗镇一带给敌人一个迎头痛击。左权参加了直罗镇战役。战前,和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等人一起到直罗镇观察地形。红军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将敌第一〇九师诱至直罗镇后,中央红军从北向南,红十五军团由南向北,把敌人全部包围歼灭。活捉了敌师长牛元峰。为了防止小股敌人逃跑,取得最大战果,左权命令军团直属队所有人员进入阵地参战。红十五军团在追击,又歼灭了敌第一〇六师一个团。直罗镇一仗,彻底打乱了敌人进攻陕北的部署,为党中央和红军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推动全面抗战举行了奠基礼。战役中,缴获

敌师长牛元峰的左轮手枪,以后一直为左权长期使用(现收藏于北京军事博物馆)。

1936年5月,抗日先锋军东征回到陕北后,中央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辖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第二十八军、第二十九军、第八十一师,执行西征作战的任务。以左权为代军团长兼参谋长(军团长林彪去红大任校长)、聂荣臻为政委的第一军团为左路军,从延川出发,经吴起镇向甘肃曲子、环县一线开进,配合右路军红十五军团阻击盘踞在三边和宁夏之敌。6月初,红二师在杨得志、肖华同志率领下攻打曲子镇。红军冲进城内后遇守敌拼死顽抗。在情况十分严重的紧急时刻,左权和聂荣臻在战场上出现了。他们亲自指挥,调整部队,改进战术,战士们高喊着“军团首长看着我们”、“不能丢脸”的口号冲向敌人。城门牢固地掌握在红军手里了。待第二梯队前进时,左权和聂荣臻才离开。这次战斗全歼马鸿逵部,活捉敌一个旅长,打响了红军西征的第一炮。

1936年11月,胡宗南指挥的第一军气势汹汹地



左权(左)与刘伯承(右)

向我驻守在甘肃环县以北的山城堡的红军发动进攻。红军在左权、聂荣臻指挥下，发挥红军近战、夜战特长，利用夜幕展开攻击，经5小时激战，歼敌1.5万余人。此战给胡宗南以沉重打击，迫使其向西撤退。山城堡战斗的胜利与左权、聂荣臻的正确指挥是分不开的。几年后，刘伯承在《纪念左权同志》一文中曾写道：“左权同志部署作战是细致周密的，山城堡战斗就是一个范例。”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芦沟桥事变，日军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亦称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改编后从陕西出发，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9月6日，八路军总部从陕西三原县云阳镇出发，在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左权和朱总司令、任弼时主任、邓小平副主任共坐一艘木船，劈波斩浪，越过黄河天险，进入山西境内。18日总部到达稷山县。深夜，左权给叔父左铭三写了一封家书，表达了他对祖国和人民前途的深切关注，抒发了他为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崇高抱负。他在信中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为自卫应战”，“这一战争必然要持久下去，也只有持久，才能胜利”，“没有坚持持久艰苦奋斗的精神，抗日胜利是无保障的”，在战略战术上“将以游击运动战的姿态，出于敌人的前后左右各个方面，配合友军粉碎敌人的进攻”，“我军已准备着以最大的艰苦奋斗与日军周旋”。信的最后写道：“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愿以自己成功的事业报答你与母亲的恩爱。”

10月底，左权随八路军总部挺进抗前线。11月8日，太原失陷后，八路军总部奉中共中央指示：“与华北人民共存亡”，“开展敌后游击战”，“创造抗日根据地”。总部从晋北南下到达太行山后，左权是最繁忙的人。总司令部作战科是八路军最高统帅部指挥机构的神经中枢。作战参谋们24小时昼夜轮流值班，而左权副参谋长则必须天天值夜班，以便迅速果断地处理一些军机大事。

八路军在晋东南地区取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也震撼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1938年4月，日军以一〇八师团为主力，并从正太、同蒲、平汉几条战线调动3万余兵力，从晋东南根据地周围交通线上的博爱、邯郸、邢台、石家庄、阳泉、

榆次、太谷、沁县、长治，分九路围攻晋东南根据地。妄图在辽县、榆社、武乡、襄垣地区消灭八路军一二九师和八路军总部，摧毁太行山抗日根据地。

左权与朱德、彭德怀一起详细地研究了敌情，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决定以一部兵力和游击队在内线开展游击战，发动群众，坚壁清野，袭扰疲惫日军；以勇敢善战而闻名太行山的第一二九师和第一一五师一部为主力，跳到外线，寻机歼敌，打击日军其中一路。八路军以迅猛的动作，将日军围歼在长乐村，其他各路日军纷纷逃窜。这次作战胜利地粉碎了日军的九路进攻，收复了辽县、黎城等18座县城，巩固和扩大了晋冀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并为向冀南、豫北平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0年秋，八路军总部在5千华里长的华北战线上，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此时，朱德总司令已回延安，指挥华北抗战的重担便落在彭德怀副总司令肩上。在王家峪召开的总部预备会上，左权按照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意图，提出了百团大战的作战方案。之后，他又亲赴一二九师驻地，与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商量。左权传达了作战方案后，说：“这是彭副总司令的设想，这次破击战的目标放在正太路上，而平汉、同蒲、白晋、平绥、北宁各线都要配合行动。除一二九师和晋察冀部队外，一二〇师和豫绥远的八路军决死纵队都参加作战。”一二九师邓小平政委立即表示：“这个设想，我看行，可以这么干！”刘伯承师长也表示赞同。他们认为这个战役非常重要，只有切断日军的交通动脉，华北敌后的局面才能改观。第二天，左权又到晋察冀军区 and 一二〇师，与聂荣臻司令员、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一起，进行了周密的研究、部署。

为了百团大战，左权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苦心策划，周密部署。完成了地形、敌情的侦察，兵力的部署，道路的选择，爆破器材的准备，以及对敌宣传品的印刷，军队和民众的动员，兵站的建立，粮食的储存等各项工作。在这些日子里，作为副参谋长的左权忙碌万分，几乎天天要工作十五六小时以上。

战斗打响了，这一夜，彭副总司令与左权副参谋长在指挥部彻夜未眠。值班参谋、机要员不断地从屋里进进出出，电报、电话不断，捷报频传：

“一二九师主力进攻阳泉、寿阳成功，破坏了铁路、桥梁、水塔、隧道，爆炸声震动正太路附近200里地面。”

“正太路东段，执行破击任务的聂荣臻所部，一举攻克娘子关天险。”

“一二〇师所属21个团，不仅破击正太路，阻拦了

增援之敌，而且歼灭了沿线日军大部。”

……

左权高兴地彭总说：“打得好，漂亮！”“进展神速，看来这是一场好戏！”

这一晚，八路军出动105个团、40万人的兵力，在广大民兵、自卫队的配合下，同时向正太、同蒲、津浦、北宁、胶济、平绥、德石铁路干线之日伪军开展进攻，并沿线进行大破击，给日军一个迎头痛击。

当时百团大战的总指挥部设在武乡县砖壁，军用地图整整覆盖了左权住处奶奶庙的一面墙壁。左权每天晚上端着蜡烛面对着地图，细心安排，巧妙指挥，捕捉每一个战机，他把整个身心都沉浸在这个伟大战役中去了。

10月30日，百团大战即将结束的关家垴战斗异常激烈，日军不仅配有大炮而且有飞机配合，阵地上硝烟弥漫，枪弹横飞。左权不畏艰险亲临前线指挥。在离关家垴二里远的一个山坳里，临时搭起草棚，作为左权的临时指挥所。左权在这间简陋的草棚里，处理华北各根据地来的电报和文件，指挥参谋人员部署整个华北战局。有时子弹就在草棚的上空呼啸而过，敌机的盲目轰炸竟能震得草棚频频摇动。

一天，左权的警卫员郭树保送信回来，刚踏进草棚，敌机投弹在指挥所旁边，郭树保机警地扑向左权，把他按倒在地。草棚子被掀掉了一个角。

秋风吹进指挥所，郭树保边卷着地图边说：“副参谋长，往后面退一退吧！”郭树保重复了三次，左权才脱下身上的衣服，边包电话机边说：“对，转移。”可是，他又说：“不是往后，而是应该往前！”说完，他先一头钻进了茫茫的雨雾中。

郭树保等同志在紧挨山崖的地方，搭起来了新的指挥所。一切刚刚就绪，一个参谋匆匆跑来喜冲冲报告说：“卫生部的医院转移到附近来了，刘志兰同志（左权妻子）在那里，副参谋长，你是不是去看一下？”他万没想到左权转过脸来，严肃地说：“你现在应该向我汇报的是战斗情况！”参谋再不敢吭声了。

关家垴战斗进展十分顺利。在彭副总司令和左权副参谋长的指挥下，八路军集中三八五旅、三八六旅、新十旅，以及决死一纵队、总部特务团等部，全歼日军片山旅团冈崎大队800余人。百团大战至此胜利结束。

百团大战是一次空前规模的带战略性的进攻战役，它的胜利给全国军民以极大鼓舞，毛泽东同志也曾给予嘉奖，称赞“百团大战实在振奋人心”。

四、要求洗涤不白之冤

1941年和1942年，是德、日、意法西斯十分猖獗的时期，也是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极其尖锐而又极为艰苦的时期。日军为准备和配合太平洋战争，确保其战略后方和交通要道的安全，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力图将其在中国的占领区，变为稳定的后方基地。为此，特别对华北地区集中较大兵力进行反复的清剿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从而更增加了我在敌后作战的艰巨性和残酷性。此时的左权做好了时刻为国捐躯的准备。他在给妻子刘志兰的信中曾这样说：“我虽如此爱太北（左权之女），但如情况有变，你可大胆的按情处理太北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再多给你受累，不再多妨碍你的学习及妨碍必要时之行动为原则。”

那时，对于忍辱负重、时刻准备献身的左权最为了解的，当属既是领导又是战友的彭德怀了。抗战以来彭德怀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左权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在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工作期间，同住在一个巷子里。彭德怀住在东边，左权住在中间，每天晚饭后，彭德怀总要和左权一起研究工作。多年的并肩战斗、艰难与共中，彭德怀对这位寡言深思、机敏沉静、文武兼备的战友和助手，十分敬重，凡重大军事问题均与左权共同研究决策。同时，一向仗义直言的彭德怀又对左权的托派嫌疑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澄清，而深感不安。为洗涤左权的不白之冤，他背着左权于1941年11月25日和1942年1月23日决然二次写信给毛泽东、张闻天。信称：“几年来对于左权同志的处分，虽在事实上早已撤销了，但在党的党规上从未作出明确结论，……根据我对左权同志的了解，不论在中央苏区及长征时期，以及在抗战时期，对党的路线是忠实的，对于工作是积极的负责任的，近年来在政治上已有较高的进步。过去的问题应该清理一下，建议中央撤销他的处分，使其安心。”

左权对于蒙受不白之冤一事，当然更是一块心病。在他看来，为了祖国的解放，自己生命可以抛弃，家庭幸福可以置之度外，人世间许多东西都可以不顾，然而一个共产党员的清白和声誉是至为重要的。为坦露心迹，他于1941年12月给中央写信说：“……忍受党对我的处罚决定，在工作中斗争中去表白自己，迄今已将十年了，不白之冤仍未洗去，我实无时不处于极端的痛苦过程中。回溯我1925年2月在广州入党，那年冬即赴莫斯科，1930年6月回国，同年9月入苏区，直到现在将近17年了，在这过程中我未离党一步，一贯受

党的教育与培养，在党内生活，做党内工作”，“其中没有犯过有损于党的过失，也没有在任何斗争情况下动摇过，也没有在艰难困苦面前低过头，我没有苟安，也没有消极，我一切为党工作，为党的路线斗争，虽由于我之能力低微，无所建树，在工作中还有不少的弱点，但自问对党是真实的，对工作负责的积极的……我亦曾多次想向党要求解决这一不白之冤，但总以真金不怕火炼，党有工作给我做，在斗争中工作中去表白这一不白之冤，自有水落石出之一日安慰自己。”“现在我觉得不应再忍受下去了，故向党提出要求，请将我的问题作结论，洗涤这一不白之冤……希中央讨论答复。”

党中央对此是重视的，在收到彭德怀的信和左权的申诉后，即由中央书记处陈云同志负责，开始向有关人员着手做调查了解，刘伯承等同志还写了证明材料。但是……

五、战死在抗日最前线

1942年4月，日军调集了第一军之三十六师团、四十一师团、六十九师团及独立第九旅团共3万多人，向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所在地进行大扫荡。参战的日军有师团的步兵联队，山炮兵大队，还有空军第二十九独立飞行队，并从三十六师团中特别抽调两个联队组成“特别挺进杀人队”。

5月23日傍晚，根据情报得知，日军阴谋合击八路军总部。左权将此情况向彭副总司令作了报告，并于当晚在麻田镇天主堂的总部会议室召开紧急作战会议。

左权在讲话中，介绍了敌情，谈了作战部署，交待了任务后特别提醒大家说：“从局部看，我们是处在日军的包围之中，然而从全局看，日军已陷入我军和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接着，他又指出：“这次华北日军是在下赌注，把老本拿上来了。日本侵略者妄想把我们消灭在太行山上。为了吸引日军，配合我们外线主力的行动，我们必须坚决顶住，粉碎日军的合围。目前情况十分严重。我们的处境是相当艰苦的。北方局、总部、党校和整个后方机关都在我们周围，保护几千人生命安全的责任，都落在我们的肩上。我们一定要掩护他们安全转移，跳出合围。”说到这里，他转过身来，向警卫连长唐万成说：“你们连里百分之八十都是共产党员，百分之九十是经过长征锻炼的老红军，相

信你们会完成艰巨任务的。回去告诉同志们，一定要顶住！即使太行山压下来也不能动摇！”

“是！”唐万成响亮地回答。

左权接着命令道：“天明后，连队立即进入阵地，总部各直属队机关做好转移准备。指挥机关黄昏出发，夜间通过敌人增兵较少的偏城东边的那个据点，到河北、山西交界的山沟里去。大家现在分头行动！”

5月24日，一切都按左权的部署在行动。

左权更是忙个不停，向下面了解情况，向上面汇报，还要随时掌握日军的动向。当他得知日军同时由各线全面开始进攻，日军飞机向我驻地反复侦察时，断然决定提前行动，并命令一位参谋即速带一个警卫战士跑步出发，到特务团送一份作战命令。他交待那位参谋说：“电话至今还没有与特务团欧致富团长联系上，现在形势紧迫，不能等待，一面要电台继续联络，一面将书面命令送出，双管齐下，十万火急！假使到团部驻地找不到他们，你们可以向南艾铺方向找总部归队。”

24日傍晚，左权陆续指挥总部各直属队离开。部队在左权指挥下井然有序地撤离。在警卫员的催促下，他最后一个离开驻地。这时，天已昏暗，耳边不断传来远处的枪炮声。

由于后勤部门携带物资太多，动作迟缓，影响了整个计划。当夜，上千匹驮着物品的骡马，在一条大路上前进，你推我挤，天明时才到十字岭附近，一夜只走了20多里路。

上午10点左右，彭德怀和左权下达命令说：由于情况不明，白天后方机关转移有危险，部队在山上坚持，待黄昏后分路转移。中午时分，几架日军飞机在头顶低飞盘旋后，未曾投弹，急急忙忙掉头飞走了。左权



左权与妻子刘志兰、女儿左太北合影

意识到情况严重,他想两千多人马,挤在十字岭下,敌机若施以轰炸,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左权立即将各路负责人找来,说明这种严重形势,决定分路突围,后勤部人马较多,单独一路,往东北羊角、黄泽关先行突围。其余少数机关干部和转移部队留在十字岭周围待命。半个小时后,数架日机飞来,向地面轮番轰炸、扫射。掩护部队也与地面日军接火。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在这紧张复杂的情况下,左权十分沉着、镇静,在一块坡田旁矮树林中,与彭德怀、罗瑞卿紧急碰头,决定分路突围。彭德怀命令道:总部和北方局由左权率领向西北方向突围,从和顺、辽县间通过公路转到外线;野战政治部由罗瑞卿率领向东南方向突围到武安的太行六分区,由野政警卫连掩护。作战参谋分随两路,各携一部电台联络,由警卫连掩护,各自为战,必要时,机关人员化整为零,冲出去以后再集中。彭德怀转向左权:“你带一部电台突围,这里由我指挥。”这时左权却说:“这里由我指挥,彭总你立即突围。”彭副总司令坚持要左权先走,左权说:“彭总,不要争了!你是副总司令,八路军指挥机关不能没有首脑,你先冲出去,总部跳到圈外就主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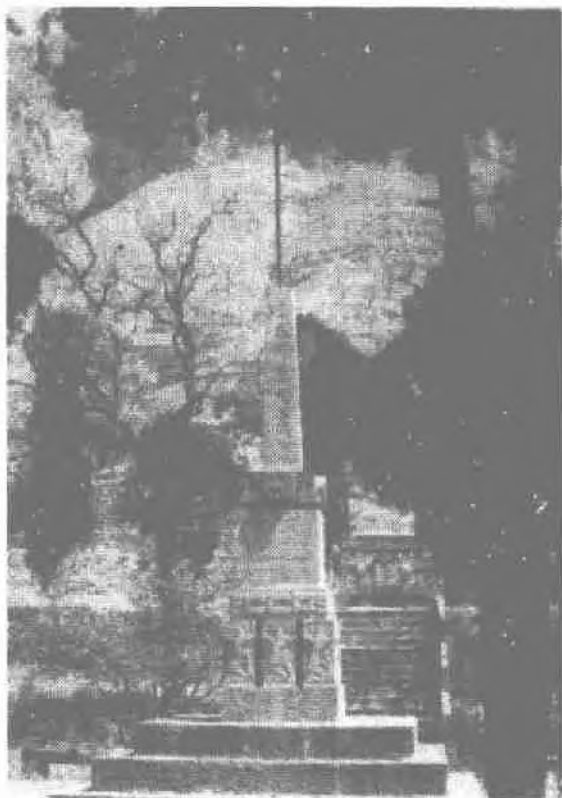
彭副总司令考虑良久,最后无可奈何地说:“只能……可左权同志千万保重,我等着你们归来!”

彭德怀、罗瑞卿在十字岭下与左权握手告别后,左权命令战士将身边的几门山炮埋掉,说等司令部翻过山后,部队分散活动。随手又从口袋里掏出本子,飞速写下了“总部在转移中,誓死保卫安全——左权”的条子,交警卫员以最快速度送到警卫连连长唐万成手里。

这时敌人的火力更猛了。估计日军发现了我方正掩护大部转移的企图,以数倍于我的兵力,拼死冲来。左权知道,更大、更恶、更艰苦的战斗还在后面。

正在小山坡上指挥战斗的唐万成连长忽见左权的警卫员满脸血污地上来就有几分吃惊,看了左权亲笔写的纸条便嗔怪地说:“十四号(左副参谋长的代号)在哪?你怎么不把他拖下去!”没等警卫员回答,唐万成连长便命令三排长代他指挥,翻身朝警卫员来的方向跑去。见了左权便喊:“十四号快转移,这里很危险!”左权反问道:“你说哪里不危险?别管我,快去指挥你的部队。”接着边用望远镜瞭望,边以命令似的口吻说:“唐万成你看见没有?那边山上还有老乡,快派人去牵制一下!”

在唐万成返回警卫连阵地,派人把山头上的老乡掩护下来,正组织指挥还击敌人时,枪声竟渐渐稀疏了。按照以往反扫荡的经验,也许敌人该暂时往回撤了,唐万成感到肩头的万斤重担可以卸肩了,整整两夜



1942年10月建在河北省涉县烈士公墓中的左权将军墓和纪念塔

没得休息的困倦的眼睛竟立即迷糊起来。

这时日军第三十六师团组成的“特别挺进杀人队”穿着便衣从十字岭后背偷偷抄了上来。

当左权发现一群装扮成八路军和老乡的队伍,鬼鬼祟祟地往十字岭边横插过来,企图断绝警卫连后路的日军时,他飞跑着往警卫连驻守的山头奔去。看到迎面迷糊的唐万成,大声吼道:“唐万成,敌人上来了!”

唐万成蹿了起来,只见满脸尘土,右手握着左轮手枪的左权命令说:“快,抢占前面的山头!”

唐万成以百倍的勇气,带领部队冲了上去,终于先敌一步抢占了山头。

这时,十字岭背后也响起了激烈的枪声。炮弹呼啸着从头上飞过。一会儿,敌机也来助战了。原来,日军停止进攻是个阴谋,企图以此麻痹我们,造成我们认为日军撤退的错觉。此刻日军正分兵两路,悄悄摸过来了——一支从左偷袭,一支从警卫连后背抄过来。但是正当那支从左偷袭的日军超过山垭口时,左权令埋伏在那里的政治部警卫连,向偷袭日军发动猛攻,经激战将其全歼。左权组织部队继续突围,日军的炮口对准十字

岭东坡上的突围人群，日军飞机在突围人群头顶上盘旋，向十字岭投弹，天上、地下火网连成一片。左权站在—块高地上从容地指挥着。

太阳偏西时，总部机关终于跳出了日军的合围圈。就在左权高喊“同志们快冲啊，冲出口就是胜利”的时候，—发炮弹在左权身边爆炸了，他机警地回过头来，向大家高喊—声“快卧倒！”第二发炮弹又打了过来，—块罪恶的弹片击中了左权的头部，他仰面倒下了……

左权把最后—滴血为中华民族、为无产阶级流尽了。时年 37 岁。他是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最高将领。

噩耗传来，彭德怀作为左权生死之交的挚友，开始听了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继而怀疑消息的准确性，直到左权的左轮手枪作为烈士遗物交到他手，他默然了。他不忍接受这严酷的事实：他为左权鸣不平的第二封信发出后刚满四个月，左权等不及党中央为其作出结论，便带着遗憾战死在抗日前线。在这以后的—个多月的时间里，彭德怀每天晚饭后总是孤独的—个人来回散步，熟知他的人知道：他的心在哭泣！

左权殉国的消息传到延安，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及在延安的各将领，手持电报为之动情。延安各界同声哀悼。

朱总司令挥泪即席作挽诗—首，以志哀思：

名将以身殉国家，
愿拼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
留得清漳吐血花。

为永久纪念在清漳河畔殉国的左权副参谋长，特将山西省辽县改名为左权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一年后，即 1950 年 10 月 21 日，位于河北省邯郸市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落成典礼之时，为左权等烈士举行了移葬仪式。他的墓用青石建造，高大的墓碑正面是周恩来手书“左权将军之墓”，背面是周恩来在 1942 年 6 月写的《左权同志精神不死》悼文的节录。左权墓东西两面的石碑，分别刻有朱德的挽诗和贺龙的悼词。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将领、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党员、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左权将军，安息在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国土上，他那生前的不白之冤，早已以自己的所作所为洗涤干净；他生前渴望的组织结论，早已写在延安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刻在他的墓碑上，铭记在人民的心中。

历史的尘埃不会埋没—个真正的人！

（责任编辑 洛 松）

粤北星子公社亩产稻是六万斤不是二万四千斤

《炎黄春秋》1995 年第 2 期“说真话难还是应该说真话”—文，谈到 1958 年粤北连县星子公社放高产“卫星”的报道，由于事隔 30 多近 40 年，作者有的记忆可能不够准确，因此有两个方面和事实有些出入：

—、这颗“卫星”不是“说—亩高产了 24000 斤”，而是“突破亩产六万斤大关”。

二、关于“这数字怎么来的”，报道中不仅写了，而且写得很具体，就是“把六十二亩二分田抽穗的禾苗集中进行最高度的密植”。这方面的报道，在发往北京的稿子中，也没有被删去。

只是在 1958 年 9 月 5 日《人民日报》—版右下角登出的“据新华社广州 4 日电”的报道中，把“插下去四、五天后的，由于禾苗密不通风，杆部发热，叶色转黄”以及如何抢救—段 300 多字的报道（见《南方日报》9 月 5 日—版头条），简化为“随后，他们对稻田的通风、送水、追肥、除虫作了巨大的努力。”

周方錫

1995 年 4 月 4 日

□来函照登□

张学思与张学良

1936年12月28日下午，南京太平门外，长期无人居住的孔祥熙公馆四周，突然间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宪兵，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如临大敌。豪华雅静的洋楼里，窗户被黑纱遮严了，门厅旁、走廊上、楼梯口、房间内到处是流动的军统局便衣特务。两小时之前，陆海空军副总统司令张学良将军，经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审讯”后，被秘密关押在二楼的一间屋子里。

这时，戒备森严的孔公馆大门外，急匆匆奔来一位身穿国民党军校服装的青年。“咔嚓”，一把把明晃晃的刺刀挡在他的胸前。青年目光如电，扫视了一下密密层层的大门岗，按下心头的怒火，从容地说：“我是张学良的弟弟，请允许我进去见见我大哥！”宪兵虎着脸生硬地回答：“这里无此人！”这个青年恳求说：“我刚从宋公馆来，宋子文先生说他就关在这里，求你们给个方便吧！”宪兵更蛮横了：“告诉你，无此人！”青年的眼里喷火，拳头攥得紧紧的，他竭力克制着自己，没有发作，只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长久地、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幢华丽的楼房，渐渐地，眼眶溢出悲愤的泪水……

这位身着军装的青年，就是张学良将军的四弟张学思。

张学思与长兄张学良同父异母，年龄相差15岁，在大帅府的八

兄弟、六姐妹中，这兄弟俩的情谊最笃，关系最为特殊。话还是从头的说起。

(一)

赫赫有名的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大元帅，平生最喜欢三个孩子。一个是女儿张首芳，为原配夫人赵氏所生，是张家的老大。她小时在张作霖的马背上突过围，尝过高粱米掺野菜的美味，在患难之中长大，因而最受父亲的疼爱。

另一个为张作霖喜欢和器重的是长子张学良。他与父亲好象有一种奇缘，他出生于1901年6月4日，那天，张作霖平生第一次打了个大胜仗，从而飞黄腾达。由于张作霖与冯德麟拜了磕头兄弟，那时冯德麟已有五个儿子，因此，张作霖把张学良排行第六，叫他“小六子”，以后一直未改口。张学良青少年即随父鞍前马后，东征西杀，并参与大帅府的军政大计，成为名声显赫、举足轻重的“少帅”。

除了长女和长子之外，张作霖再一个喜欢的就是四公子张学思了。他从小聪明伶俐，十分惹人喜爱。4岁，张作霖就带他参加每年的奉军阅兵式。6岁，就为他与直系军阀首领曹錕的六小姐定了婚。张作霖虽是草莽出身，却十分重视子女的文化教育，他请来一位前清的举人，命他严格管教子女，“谁不

听话就用烟袋锅子打！”于是，大公子张学良小时候不听管束，脑袋上留下了一块永远去不掉的大疤痕。轮到老先生管教四公子时，生性活泼的小公子养了一条德国种的大狼狗，老先生的烟袋锅还没有落下，就被它扑上去凌空叼走，吓得老先生魂飞魄散，跌坐在地，从此而辞别大帅府。张作霖并未责怪张学思：“这小子，像我，有股灵气！”

张学思12岁那年，大帅府发生了一件天大的惨案——张作霖大元帅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在吊唁的日子里，张学良以大帅府新掌门人的身份问三位弟弟：“父帅遇害，你们有什么打算？”二弟张学铭涕泪俱下，嘶哑着嗓子喊：“我要是你，就把沈阳的小日本鬼子统统杀了！”三弟张学曾回答：“可惜我是个文弱书生，只有把书念好，以慰父帅在天之灵！”四弟张学思的回答却有些特别，他说：“父仇要报，国仇也要报，但报仇先要自强！我们听大哥的！”

张学良感到四弟不凡，他拍着张学思的肩膀叹道：“小小年纪，竟能如此虑事，难得啊！”

大帅府易主。28岁的张学良子继父业，执掌了东三省军政大权。当时东北军新、旧两派势力的斗争日趋激烈。张学良为首的新派势力多为40岁以下的少壮派，呼之为“一二三”，他们反对旧派的昏

情手足的

● 刘永路

庸腐朽，主张推行欧美化革新；以杨宇庭、常荫槐为核心的旧派势力，多为40岁以上的元老派，称之为“四五六”，他们加紧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实行“满蒙独立”，颠覆张学良的统治。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力挽狂澜，采取两项断然措施。首先，实行东北易帜，将东北的五色旗换成南京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促成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接着，先发制人，在大帅府老虎厅内，除掉了杨宇霆和常荫槐，从而巩固了张学良新派的统治地位，使军威整肃，令行禁止。

张学良励精图治，声望骤增。他积极推行欧美式改革，整编东北军，修筑葫芦岛军港，开发满铁并行线，扩建东北大学，力图建设一个富强的新东北。帅府里也出现了自由、开放、欧美式的新家规。

这一番新的变化，给张学思带来了兴奋和喜悦，他从大哥的身上看到他们的希望。可是，这种希望的火花不久就消失了。张学良在政治上开始向右转，参与国民党军阀内战；在生活上染上打吗啡针的嗜好。帅府又恢复了昔日死的沉寂。张学思对这位曾经奋发有为的大哥失望了。

(二)

1930年的端午节到了，帅府又热闹起来。按照惯例，张学良作为帅府的掌门人，要到各房走走。

他走进四弟的书房。“嗨，你书房里的书，比我的还多啊，到底不愧是咱们张家的读书人！”张学思这一阶段，在启蒙老师王西微和进步同学王金镜的影响下，读了许多进步

书报，他对家庭的看法变了，对人生的看法也变了，心中萌发了争自由、争民主的思想。

张学良似乎从四弟忧郁、深沉的目光中，发现了什么。他关心地



1934年，张学思（左）和大哥张学良（中）二哥张学曾（右）合影

询问起四弟的学业和读书情况。他一边问着，一边顺手从桌上拿起一本书翻翻。突然，他眼睛瞪大了。原来，这本书是丁玲著的《在黑暗中》。

“这书是从哪里来的?!”张学良板起面孔厉声问道。

“是我从书店买的。”张学思回答。

“你知道吗?这是共产党写的!”

“我看写的没什么不好呀!”

“岂有此理!”张学良火了:“以后不准看这种书。烧掉!”说罢，他扔下书，气呼呼地走了。

一时，平静的帅府掀起了轩然大波。各房里都传开了:“四爷赤化了，学共产共妻哩!”学思的母亲吓坏了，在她看来，张学良手掌生杀大权，如同过去的皇帝一般，虽说是一家兄弟，可要是当了共产党，也会惹下杀头之祸的!她向张学思哭劝道:“你们几个，是我守活寡，遭人家白眼，好不容易才拉扯大的。你是我最小的孩子，我也最疼你，你可千万不能走歪路，学共产共妻啊!”张学思那时还搞不清共产党是怎么回事，只觉得书上写的全是好话，并无“共产共妻”之说。但他不愿使母亲过于担心，为了平息这场风波，只好拣出几本书烧掉了。

这便是当时哄动帅府的“烧书事件”。帅府的老人们说，这件事是促使四公子出走的一个原因。三个月后，他便随一位古怪的先生去了北平，从此一去而不复返……

(二)

“九·一八”事变爆发。正在北平汇文中学读书的张学思痛感于国恨家仇，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可是，同学们在大骂张学良“不抵抗主义”的同时，对

张学思也怒目而视，加以指责。“瞧，他就是张学良的弟弟!”更有些激进的同学，用墨汁在他的衬衣上写了7个大字:“不抵抗将军之弟”……

张学思感到羞辱难忍，便冲进北平顺承王府，当面指责大哥为什么丢弃东北?为什么要背上千古骂名!张学良一言不发，憔悴的脸上带着隐约可见的泪痕。当他看见四弟内衣上那7个大字的时候，他痛苦地闭上眼睛，狠狠地捶打着自己的头。张学思看得出大哥有难言之苦衷，不禁声泪俱下，劝他立戒毒瘾，振作精神，率东北军抗日复土。张学思虽然言辞激烈，但张学良毫无反感，他被四弟的爱国激情所震动，他真诚地说:“四弟，请你相信大哥，我不是那种卖国之人，总有一天，我会向世人证明，我是对得起国家和民族，对得起祖先和同胞的!”

1933年初，热河沦陷，民怨沸腾。蒋介石政府又像丢失东北一样，把失土的责任全部转嫁到张学良将军身上。张学良代蒋受过，下野出国。张学思更加愤恨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决心跟着共产党抗日救国。4月，他在共产党员王金镜和关成章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张学思受党之命，打入国民党军队之中，从事“兵运”工作，以便将来为党拉出一支抗日武装。

1934年春，张学良旅欧结束，回到上海，住在宋子文公馆里。张学思应邀前去会晤。他一走进大门，张学良就热情地迎上前，拉着他的手笑着说:“嗨，真快呀，四弟都长成大小伙子了!”张学良出国前已戒掉了毒瘾，张学思惊喜地发现，此时站在他面前的哥哥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和出国前判若两人。

兄弟俩在客厅坐定，张学良滔

滔不绝地讲起他出国的见闻与感受:他非常羡慕西欧各国强盛的景象，特别是在德国希特勒的登台和意大利墨索里尼对他的款待，使他格外感奋。他表示，对法西斯主义甚为欣赏，认为中国要抗日御侮走向强盛，也得象德、意等国那样，走法西斯主义的路，绝对拥护领袖实行独裁。张学良一反过去反对自家兄弟从军的主张，赞同张学思投笔戎，他希望张家兄弟醒悟起来，为抗日复土而奋斗。接着，张学良又劝说四弟入中央军校学习，他说:“中央军校就是以前的黄埔军校，由蒋先生当校长，办得很好，将来我们东北军的干部也要从那里派，你是中央军校的学生，将来才好做事情。”

张学思从大哥的言谈话语中，知道他是决心抗日的，只可惜他对蒋介石还抱着天真的幻想，但此时有些话是不便向他挑明的，只有先答应他的要求，“大哥，我听你的，先上中央军校!”

“好啊，四弟果然出息!”张学良见四弟如此干脆，非常高兴。

这时，门突然开了，一个被绳索五花大绑的人跌跌撞撞地闯进来，“大哥!求您快快发落!”

张学良和张学思都吃了一惊，此人竟是三公子张学曾!

原来，张学曾在天津交了一个外国女朋友，被母亲知道了。“混帐东西，一个堂堂的中国人，竟要娶一个外国女人做老婆，你给我跪下!”许夫人怒不可遏，用鞭子将儿子痛打一顿，又命家里人将张学曾捆起来，送给任天津市长兼公安局长的张学铭处理。张学铭很为难，他是自己的三弟啊;再说，交外国女朋友犯什么法呀?因此请求宽恕了他。但老太太不依，又派人把他送给张学良发落。

张学良哈哈大笑，给张学曾解

了绑。他对来说：“给老太太回个话，就说我依照国法家规，很严厉地处理过了，请她放心好了！”

来人走了，张学良还不住地感叹：“老太太虽然有失偏颇，但她的一片爱国之心真是可贵啊！”他转向张学思说：“三弟，你怎么不向四弟学学，投笔从戎，报效国家呢！”张学思笑笑，摇摇头说：“光是军队也救不了国，还得要文化要科学，我喜欢自由自在地搞学问，受不了军队的那一套。为了一个外国女人，妈捆了我好几天，哥你就饶了我吧，别让我到军队去没完没了的立正、稍息了！”

“哈哈……”兄弟三人一同大笑起来。

笔者至今还珍藏着一幅兄弟三个当年摄于宋公馆的合影照片。将近60年过去，照片中最年轻的一位英年早逝！另两位健在者，一位在台湾刚刚结束漫长的幽禁生涯，一位侨居美国搞了一辈子学问……

(三)

1934年7月，张学思在张学良的积极保荐下，插入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十期二总队预科班学习。他刻苦训练，后来居上，成绩超过了先入校的学员，成为军校出类拔萃的高材生。

在中央军校学习期间，张学良来看过张学思两次，均由军校的教育长张治中陪同。张治中夸奖张学思是个出色的人材，很能吃苦，很有培养前途，建议让他升入中央军校本科。张学良非常高兴，感到四弟为自己增了光。因为和张学思同期的还有何键的儿子和朱培德的弟弟，他们的纨绔之风很盛，又不听管束，而张学思则与其完全不同。张学良感慨地对张治中说：“在七个弟弟中，我最喜欢、最器重的

就是这个老四。我们张氏八兄弟之中，将来大概只有他会有出息！”

十期学员毕业前夕，在西安任“剿总”副总司令的张学良，特派他的警卫营营长孙铭久来南京看望张学思。孙铭久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这时期张学良思想发生了变化，准备联共抗日，他在王曲镇办了军官训练团，正在积极改革东北军，他准备吸收军校毕业的学员到东北军任军事干部，招募东北大学和平津一带的进步学生任政工干部，把东北军改造成一支新式的抗日武装，准备打回老家去！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临潼上空，响起了一阵清脆的枪声，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出于民族的利益，毅然拘捕了蒋介石。

“西安事变”的前一天，张学良将军电告张学思火速去西安，电报送到中央军校，可是张学思并未收到，当时，他正在宣城野外基地参加毕业前的大演习。“西安事变”的当夜，宣城野外万籁俱寂，军校学员均已进入梦乡。突然，有几条黑影窜到张学思铺前，他尚未弄清怎么回事，嘴已被什么东西堵住，手臂也被捆了起来……

张学思被押回南京中央军校，已是翌日早晨。一进军校大门，他就感到气氛异常紧张，军校正在开誓师大会，进行“讨逆动员”，墙壁各处贴满了“打倒张匪学良”的标语。一会儿，他被带到政训处，上校处长满脸凶相，暴跳如雷：“你哥哥张学良当了共产党，已经叛变了！他竟敢把蒋校长拘捕了，犯上作乱，大逆不道！……”，从他的吼叫中，张学思大致弄清了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也晓得了他们是奉何应钦的手谕逮捕自己的。张学思的心里坦然起来，他做好了牺牲的

准备。审讯毫无结果，张学思被带到练习营秘密幽禁起来。

“人们只知道‘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长期幽禁，其实，最先被幽禁的是他的四弟张学思……”1985年夏，当年张学思在中央军校发展的进步骨干之一，现为铁道部顾问的宁志远（原名宁金波）和笔者谈起往事：“学思被软禁的次日中午，我得到消息，赶到练习营后面的小砖房去看望他，但卫兵把守很严，根本不许靠近，更不准给他带东西，我们只是远远地隔着木栅门，彼此招招手，没讲一句话……”

关于张学思被囚后的情况，他本人的《自传》中记载得较为详细：

“我被扣在军校练习营，食宿、拉屎均不准出屋，亦未进行任何审讯。这时我回想孙铭久所讲的话，已知道西安事变大体是怎么回事，张学良的进步看起来是真的了。我很佩服他的勇敢和果断，但他这种方式真出我意外。我希望他真能由此而掀起抗日战争，我根据党的《八一宣言》，相信张学良一定与我党有联合，但如果打起内战，中国就不堪设想了。我对自己也做了思想准备，我想抗日战争如能发动，我就有自由的可能；如打起内战，蒋介石活不成，我也好不了。我便以一切听之任之的态度，等着两种可能的来临。过了五、六天，练习营长突然找我和他一起吃饭，他说蒋夫人、宋子文均到了西安，事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让我写信劝张学良放回蒋来。我觉得写信是可以的，反正放不放由他，只要不打内战就好，我便写了一封信，内容是双十二事变，举国震惊，日寇更觉有机可乘，对政治问题我不懂，唯觉破碎的祖国已不堪再起内战，请他送蒋回京，以抗暴日。这封信是否送到我不知。25日，张学良和蒋



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部代表张学思在
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发言

介石突然一起到了南京，我也恢复了自由，被送回队上学习。校中打倒张学良等标语均撕下来，同学们以惊奇的眼光看我，以为我已死掉，队上军官对我非常客气，弄得我莫名其妙。第二天我去看张学良，他住在宋子文家，很多人去看他，他说很忙，几天即回西安，要我明天再去与我详谈。次日去时张已被扣……”

1937年1月30日，国民党中央军校大礼堂里，军乐齐奏，第十期学员毕业典礼正在举行。1700多名毕业学员，身着一式的军装，整齐地排列在大礼堂里，目光集聚在台上。今天，不知是什么原因，校长蒋介石破例没有出面，毕业典礼由冯玉祥将军主持。此刻，他庄重地将一面银盾赠予本期毕业成绩第一名的张学思。这是一件小巧精致的银盾，它的正面刻有张学思的名字，背面刻有东三省地图。张学思心里明白，这是冯将军在鼓励他，要他不忘大哥的志愿，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张学思激动地向冯将军立正行礼。

可是，随着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登台训话，会场气氛急转直下。汪精卫捶胸顿足，大骂“西安事变”是共产党串通张、杨胡作非为，大骂东北军不抗日，在国内捣乱，劫持领袖，违反国家纲纪……

张学思站在头一排，他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气愤得流出眼泪，被台上的张治中将军看到了。散会后，张治中把张学思叫到办公室，好生安慰了一番。他说：“我与张将军的私交很好，不是他们那样看法。张将军的功过，历史自有公正的评价。眼下时局未定，外面情况很复杂，我看你哪里也不要去了，我已决定把你留校见习，将来你想出国留学，我可以保送，你看如何？”

张学思心里暗忖：这会不会是军校当局对自己实行的变相软禁呢？也许，你张治中将军是一片好心，可你不想想，这儿是我呆的地方吗？现在这种情况，我还留在蒋介石的身边，会有好果子吃吗？不行，我一定要设法远走高飞！张学

思灵机一动，决定将计就计。“好吧，我同意留校见习。不过，我有个小小的请求，按惯例，毕业学员都有个探亲假，我想先回天津探望一下母亲。不知教育长肯不肯准假？”

张治中表示同意，但他再三嘱咐张学思：“悄悄离校，快去快回！”

然而，张学思一去不复返。他搭上北去的列车，千里找党。他与北平地下党接上关系之后，又受命赴保定东北军五十三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四)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了“芦沟桥事变”，开始向中国腹地发动全面进攻。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就此开始了！

抗战的枪声打响后，社会上风传张学良将出来继续领导东北军。在这种情况下，心怀叵测的蒋介石也放出可以释放张学良的风声。

张学思听到这个消息，又惊又喜。他想，大哥若能获释，不仅兄弟可以团圆，而且会大大有利于中国抗战。经过“西安事变”之后，大哥一定会认清蒋介石的本质，从而积极和共产党合作，全力以赴率东北军抗日复土。张学思决定亲自去奉化溪口，探望被幽禁的张学良。

7月中旬，张学思经过一番周折，从北平回到天津，又从塘沽经海路前往上海。

在上海，张学思与大嫂于凤至和赵四小姐见了面。自从张学良将军由南京被解到奉化溪口看押后，两位女眷均回到上海，每周轮流或同去溪口陪伴张学良将军。一天，蒋介石派来一位名叫黄仁霖的代表到上海，约赵四小姐同去溪口见张学良将军。他会见了张学思，说蒋委员长早有释放张将军出来之意，此次派他与张将军谈话，就是

为张将军出来做准备。张学思向黄仁霖诉说了自己探望大哥的迫切愿望，经他电请蒋介石获得了批准。于是，张学思、赵四小姐，还有黄仁霖一行3人，一同乘由上海开往宁波的客轮，再换乘汽车去往溪口。

在距溪口镇西北约10公里处，有一座巍峨秀丽、峰峦叠嶂的雪窦山。山上有座雪窦寺，是我国佛教禅宗十大名刹之一。在寺的西隅山麓500公尺处，是水基岩风景区，建有中国旅行社的十几间房屋，张学良将军就住在这里。从此，“中国旅行社”的牌子改成了张学良将军的“招待所”，然而“招待”他的却是30多名便衣特务和一个连的武装宪兵。

第二天早饭后，黄代表找张学良将军在客厅里单独谈话。张学良将军从客厅里出来时，张学思发现大哥面色不悦，心里感到蹊跷：不是说蒋介石要释放大哥吗？难道蒋介石又打大哥什么鬼主意了。他问问大哥，但周围尽是特务监视，除了谈吃、喝、玩、乐外，不能说别的。

午饭后，张学良将军兴致勃勃地邀张学思和赵四小姐去游览雪窦山名胜。在特务们前后簇拥下，张学良将军游兴十足地上路了，他一路指指点点，谈笑风生。张学思则心情沉重，不声不响，他多么想和大哥说说心里话啊！哪有心思游山赏景呢？莫非大哥忘却了抗日救国、复土还乡的大志？张学思望着闲情逸致十足的大哥，心不住地在往下沉。

好不容易盼到了张学良回去吃晚饭。张学思心想，晚上一定要找个机会和大哥说几句话。然而，饭桌一撤，大哥却拉着他打起乒乓球，下起国际象棋……张学思暗暗叫苦：大哥啊大哥，你玩起来，把

什么都忘了！

一天、两天、三天，都是在玩乐中消磨掉了。

第四天，也就是张学思临走的前一天。天空突然雷雨大作。吃完早饭后，张学良对四弟说：“今天不能出去逛了，走，到书房里看看画报去。”这时，赵四小姐留下来，张罗着和特务们玩牌。

张学良把四弟领到书房一角，借着三个书架和一个报架，正好挡住了门窗外的视线。张学思顿时明白了，原来大哥已选好了谈话的场所啦！然而大哥示意张学思别吱声，他指了指墙壁（暗示装有窃听器），然后拿出纸和铅笔，兄弟俩进行着无声的“谈话”。

张学思以最快的速度在纸上飞写着：抗战的形势……共产党的主张……东北军的情况……人民的愿望……张学良将军看完后，用橡皮擦去铅笔字，又在纸上写起来……他们的“谈话”虽是无声的，然而，他们的心里却似翻江倒海，电闪雷鸣！

这次雪窦山秘密笔谈的内容，除张氏二兄弟外，旁人无从知晓。然而，在张学思逝世几年后，笔者在档案馆所藏的《张学思自传》中，却意外地发现了这一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张学思是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的：“张学良告诉我，他曾写信给蒋介石，请求去抗日。蒋回信不允，叫他好好读书。此次蒋派姓黄的来，是要他写信给东北军各军军长，嘱咐他们服从蒋的指挥一致抗日，不可乱闹。他渴望奔赴抗日疆场，急于知道东北军的现状，要我经常设法报告他。他说他是在宋子文保证之下跟蒋介石来南京的，未想到被扣。他认为东北军如能团结，抗日战争扩大，他就有恢复自由的可能，让我把此话传达给东北军各军长。他坚信中国将来一定是

社会主义的前途。蒋介石绝不是抗日的人。要我多看进步书，回东北军去，抗战到底！”

张学思接过大哥递来的一张张字条，默读着，泪水止不住地从腮边滚下，把字条淋湿了。灼热的文字，火一般的激情，燃烧着张学思的心。他心里想：多少年来，我们虽然是同胞兄弟，却因为政见不一，从没有谈过一次心。这一次是大哥在被看押的情况下，头一次和我谈心里话。可是，此时此刻用的却是这种方式，张学思感到非常难过。想好言安慰一下大哥，可他自己却忍不住鼻酸泪流。他真想扑过去和大哥抱头大哭一场，把积郁在胸中的感情倾吐个痛快。可是，此时此刻地，哪里能倾诉兄弟之情呢？！对大哥的最好安慰，就是把他未竟的抗战事业进行到底。他在心里默念着：大哥啊，您放心吧，我已经找到伟大的共产党，您的愿望一定会变为现实的。想到此处，张学思擦泪挥笔，给大哥写下几个赫然大字：“您的话我一定办到！”

兄弟俩紧紧抱在一起。

突然，门外传来特务队长刘乙光的声音：“张先生，下棋呀！”边说边破门而入。张学良将军早已收好纸笔：“好啊，画报看腻了，换换脑子。”边说边笑呵呵地迎上前去……

（五）

由上海至北平的列车，开到济南就无法前行了，前面正在打仗。在济南，张学思巧遇东北大学地下党员冯静安，接上了组织关系。几天后，他与东北抗日救亡党团书记刘澜波见了面。

“唔，你跟你大哥长得一模一样啊！”一见面，刘澜波就紧紧握着张学思的手，热情地说：“你们张家出一位抗日的功臣，还出一位共产

党员，可喜可贺呀！”刘澜波告诉张学思，当前党在东北军上层统一战线的方针是：争取团结上层军官参加抗战救亡，使东北军成为抗日力量；争取东北军集中使用，反对蒋介石拆散、瓦解东北军的阴谋；争取恢复张学良将军的自由，坚持团结、抗战到底，反对蒋介石妥协、退让。他认真听取了张学思在溪口探亲的汇报后，指示张学思：“当务之急是争取释放张学良。张将军若能放出来，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民族抗战，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他深情地告诉张学思：“周副主席对你们兄弟二人非常关心，派你去做‘释张’工作就是他的意见。”

“您说的就是周恩来？”张学思激动不已，“请转告周副主席，我一定做好党交给我的工作！”

不久，刘澜波向张学思引见了东北知名进步人士高崇民和黄显声，他俩都热情鼓励和支持张学思做“释张”工作。

当时蒋介石利用东北军内讧，已将东北军各军拆散，调往四面八方。张学思决定跑遍全国，找遍各军军长，吁请他们参加“释张”工作。他首先由济南搭车奔往沧州，找到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将军，向他述说了张学良将军在溪口的嘱托。吴克仁很激动，拍着胸脯表示：“六十七军保证无问题！”张学思请他给蒋介石写信，要求放张学良将军出来领导东北军抗战。吴克仁却犹豫起来。他是“西安事变”后被南京政府由师长提升为军长的，不敢得罪南京政府。他皱眉思索说：“要求恢复副司令的自由可以，但是，要他领导东北军的话不好提，这会引来蒋委员长的疑心，反而对副司令不利。”过了两天，吴克仁把一封措词温和的请蒋介石释放张学良的信交给了张学思。

张学思带着吴克仁的信回到济南，次日，与黄显声同去河间，找到五十三军长万福麟，讲述了溪口之行的经过。万福麟听了张学良的嘱托，唯唯点头称是。他不禁又叹息起来：“汉卿啊汉卿，你在西安时怎么尽听些小孩子的话，也不和我商量，做出如此冒失之举！”

万福麟是张作霖时期的老人，属东北军旧派，曾被张学良列入撤换人员之列。张学思知道他脑筋陈旧，对“西安事变”不满，也不同他争辩，只是请他给蒋介石写封信，要求释放张学良。万福麟表示同意，他说：“我也早有此意，不过以我之愚见，东北军愈老实听蒋先生的话，蒋先生放心了，你兄长就愈有获释的可能；东北军愈闹，蒋先生愈怕，你兄长就愈难出来。”说罢，他用婉转的辞句，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亲笔信。然后，又将张学思由五十三军的见习排长提升为军部上尉参谋。

张学思携信与万福麟的儿子万国宾同往南京，在五十三军驻京办事处下榻。不久，刘澜波也来这里聚会。以后，张学思又找了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以及四十九军军长刘多荃等，他们都表示听从张学良将军的嘱托，并一一写了请蒋介石释放张学良的亲笔信。

9月末，张学思与黄显声到庐山，请东北政界元老、张作霖时期的奉天省财政厅厅长王树翰出山，同去南京政府活动释放张学良。途经安庆时，张学思找到原辽宁省长、现任安徽省主席刘尚清，他照例也写了一封请蒋介石释放张学良的信。

到了南京，张学思请国民参政员莫德惠出面协助。莫德惠是东北元老，张作霖时期任过奉天省省长。由于他积极支持东北易帜，南

京政府也很赏识他。不久前，他到溪口探视过张学良，他说：“汉卿，你太忠厚了！难道你对蒋介石的为人还不知道吗？”一语引起张学良将军的无限悔恨。他想到自己真心拥蒋，却落得如此下场，不禁叹道：“唉，人以德待我，我以德报之，怎奈人又以怨待我也！”

莫德惠感慨地对张学思说：“汉卿为人，的确称得上‘忠厚’二字了！只要能尽微力，使他获释，老夫万死不辞！”张学思请他和王树翰出面，持东北军各军军长及刘尚清等人的亲笔信，呈送蒋介石。莫德惠爽快地答应了：“好，我们明天就去！”

蒋介石听侍从说，莫德惠和王树翰为请求释放张学良而来，还带着东北军各军军长和东北名流的亲笔信，气得他差点砸了喝水的杯子！“娘稀匹！东北小赤佬只知道胡闹，去告诉他们，我不见，不见，就是不见！”

两位东北元老受到凌辱，羞愧而归。张学思虽然也有思想准备，估计蒋介石不会很痛快地接受“释张”的要求，但没料到连莫德惠也不肯见。莫德惠愧疚地把那叠信还给张学思，叹息道：“小四啊，不是我不尽力，而是无能为力呀！你还是去上海，找宋子文先生帮帮忙吧！”

张学思又马不停蹄地赶赴上海。为了大哥获释，那怕把鞋底磨穿！刘澜波也一路随行。张学思通过大姐家的亲属鲍文樾的关系，见到了宋子文先生。宋子文态度坦诚，他告诉张学思：“当初汉卿亲陪蒋先生回南京，我做过担保人，原想汉卿负荆请罪，可以给蒋先生挽回面子，同时南京方面也保证不会为难汉卿。没有想到，蒋先生突然变了卦，弄得汉卿有来无回，有家难归！弄得我也对不起朋友，无颜

见人！”宋子文苦笑着摇摇头，长长地叹了口气说：“为了对得起良心，我决定在上海过隐居的生活，他们不把汉卿放出来，我就不出去做事！”张学思深为宋子文的诚意所感动，恳请他出面，将东北军将领们的信亲呈蒋介石。宋子文表示愿意尽力，如有消息立即通知张学思。

11月，上海沦陷，张学思和刘澜波回到南京。中共领导人博古和李克农接见了张学思，勉励他继续抓紧做好“释张”工作。这时，南京吃紧，国民党政府准备迁都武汉。几天后，张学思与刘澜波、黄显声、万国宾等随五十三军办事处转移到武汉。

一到汉口，张学思就听说张学良已从溪口被押解到衡阳，却未见丝毫释放的迹象。张学思忍耐不住，又去找宋子文打听消息。宋子文安慰他：“此事不能心急，我正在设法办理，你耐心等着听信儿吧。”

又过了一段日子，还是没有动静。张学思决定亲自去衡阳探望大哥，他约万国宾一同去见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请他准行。戴笠曾与人说过，“东北军的将领和公子哥中，只有一人我尚未控制，就是张汉卿的弟弟张学思。”今见张学思主动登门，他立即满脸堆笑，设宴款待。他说蒋先生一直很关心张将军，保证汉卿的安全无问题。但当张学思提出到衡阳探视的请求时，他却以“衡阳战事紧张，常遭日军飞机轰炸”为由，一口拒绝了。

张学思只得再次去找宋子文，不料他的家人说“宋先生已去香港隐居，他说从此以后不理政事了。”张学思的头“嗡”地一声，他明白了，宋子文的一系列活动也失败了！

张学思拿出破釜沉舟的最后大招。他与黄显声一同去找宋美



1956年，张学思受到毛主席接见时情景（右为肖劲光）

龄，提出以他们两人做人质，去换取张学良将军的自由！结果仍然是失败。

关于“释张”活动失败的原因，史学界已做过一些探讨。这里，笔者只想引用张学思在《自传》中的看法：“我感到释张问题，不是我奔走所能办到的。蒋介石有利用抗战消灭异己的方针。他不杀张是为了拢络东北军与一些中上层；不放张是怕出来后带东北军与我党靠近；所以在不杀不放中，以收买利诱，利用抗战瓦解、消灭东北军。‘双十二’前，张学良想急速改革东北军，军、师长多数均拟调换，计

划传出了，事情并未办，下层无力量，军、师长对张多数有离心，这也使蒋有机可乘。”

“释张”希望的破灭，促使张学思坚定了发展敌后抗日武装的决心。这时，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亲切地接见了张学思。

张学思久已敬慕周副主席，然而初次见面，却显得很拘束。后来，他和朋友们谈起这次见面的情景时，还懊悔地说：“我真羡慕澜波，他在周副主席面前随便的很，象学生见老师那样自然；而我却不能，只知道立正、敬礼、挺胸，硬邦邦

的，象士兵见了长官……”

“报告周副主席，我没有完成任务，请求处分！”这是张学思见到周副主席的第一句话。周副主席呵呵笑着，热情地握住张学思的手说：“学思同志，你工作做得很有成绩，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找遍了东北军界和政界的上层人物，为党做了大量的统一战线工作。虽然张学良将军没有如愿获释，但却彻底暴露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在政治上我们是胜利者！”周副主席感慨地说：“张汉卿是抗日的有功之臣，将来定会青史垂名大书特书的。我们共产党人永远不会忘记这位真诚的朋友，中国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这位有功于民族的爱国将领！”

张学思的双眸湿润了。他为大哥获得这样高的评价而激动，为大哥有这样一位良师益友而高兴！

(六)

1949年9月21日，张学思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海军代表的身份，步入了庄严神圣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场，与来自全国各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和各地区、各民族以及海外华侨等600多名代表一起，共议组建新中国的大计。

次日，各单位代表发言。下午，在热烈的掌声中，张学思健步走上讲台。镁光灯在眼前不停地闪着。他看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董必武、陈云等党的杰出领导人，在第一排就座。此时此刻，他感到有无数道熟悉的、殷切的、灼热的目光一起聚集在他的身上，他的胸口一阵猛跳，他想起了远在台湾孤岛的大哥，如果他

能亲眼目睹他久已盼望的新中国的诞生，亲身参加今天这个历史性的盛会，该有多高兴啊！

怀仁堂大厅里，迴响着张学思的坚定自信的声音：“诸位代表，百余年来中国人民及一切爱国志士为着中国的新生，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有的已经光荣牺牲，有的至今仍被残余的反动势力所羁押，如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讲到这里，张学思停顿了一下，这瞬间，引发人们对这两位民族英雄、爱国功臣的无限缅怀。张学思的声音激昂起来：“今天，他们虽然未能亲身参加这个盛典，但是他们已经得到最大的安慰！因为他们为之奋斗的愿望实现了！……”

会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张学思在心里默念着：“大哥，你听见了吗？……”

人民政协开幕的前夕，周恩来同志在中南海亲切地接见了张学思。他提起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无限深情地说：“如果张将军、杨将军今天的话，他们一定会坐在重要的席位上，即使这一次他们不能亲身参加盛会了，但下一次还可能参加，我们会长期永久地保留这两位爱国将军的席位！”

可是，周恩来和张学思都没有料到，就在他们会面之前，1949年9月17日，杨虎城将军一家四人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三个月后，中共中央才得到确实消息，发了唁电。

1961年，台湾当局发表了经歪曲和篡改过的所谓《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张学思看过后，情绪激愤，彻夜难眠。他是了解大哥的，他根本不相信这是大哥的原作，这不符合大哥的所为。但他也不免为

大哥的声誉而有所担忧。

几天后，适逢12月12日，周总理办公室发来请柬，邀请张学思夫妇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周总理亲自主持的“纪念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招待会”。晚上，与张学思夫妇同时应邀出席的还有杨虎城将军之子杨拯民及妻子。周总理亲切地拉着张学思和杨拯民两对夫妇，坐在自己的一左一右。席间，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的评价，对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表达了深切的怀念之情。此情此景，使张学思异常激动，他在给周总理敬酒时竟泣不成声。周总理也动情地流下了热泪，许多人还是头一回看到总理流泪，都深为感动。周总理深情地对大家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二十五年了，杨先生一家四人牺牲了，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使人想起他们不落泪呢？”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高崇民先生激动地即席作诗一首，诗的最后两句是：“座中诸君都健在，一人憔悴在东南。”周总理读罢说：“‘憔悴’二字消极，不符合张学良将军的性格，我看应改写‘一人奋斗在东南’！”大家热烈鼓掌叫好！

张学思是个十分重感情的人，今天的场面，使他过度激动和感伤，未能终席。散席时，周总理还特意到休息室看望了张学思，安慰再三。

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对张氏二兄弟关怀备至，评价甚高。他赞张学良将军是“抗日的千古功臣”，赞张学思是“海军的好参谋长”！

(责任编辑 王 恂)

白山黑水 慰忠魂

——记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

● 荣维木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日本侵略者很快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从此，3000万同胞备受水深火热的煎熬；同时，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抗斗争也由此拉开了序幕。在广阔的东北平原，在苍茫的白山黑水之间，有数十支抗日武装和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战斗，其中，杨靖宇将军领导的抗日联军，成为东北人民抗击日寇的先锋。

杨靖宇出身在河南确山县李湾村一个农民家庭，本名马尚德，参加革命工作后化名杨靖宇。他从小勤奋好学，志向远大。上中学的时候，他最喜爱南宋抗金英雄岳飞的诗词《满江红》，常常表露出要作保卫祖国的“民族新英雄”的抱负。1926年，杨靖宇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杨靖宇为了人民的幸福和民族的解放，开始了他那短暂而闪亮的战斗生涯。

1929年春，中国共产党派杨靖宇到东北开展革命工作。在日本帝国主义控制的抚顺煤矿，他以一个普通矿工的身份深入到劳苦群众中去，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反日罢工，很快打开了斗争局面。但杨靖宇的活动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不久，他即遭到逮捕。敌人对杨靖宇施以酷刑，上老虎凳，灌辣椒水，灌煤油，灌马尿，昼夜折磨，杨靖宇始终不肯屈服。“九·一八事变”后，党组织用两千元钱买通了敌人的一个法官，才把杨靖宇营救出来。

两年多监狱生活的折磨，使杨靖宇的身体十分虚弱。但在东北沦陷后民族灾难当头的时刻，他恨不能立即奔赴抗日疆场，又怎能安心休养身体呢？在杨靖宇的一再要求下，中共满洲省委派他赴南满整顿和发展抗日武装。

1932年11月，杨靖宇来到南满盘石，发起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支队”。从此，这支抗日游击队经常出没在南满盘石、永吉、伊通、双阳、东丰、西丰、桦甸、辉南、通化等地的高山密林中，不断地打击着日寇。杨靖宇的名字和他率领的抗日队伍，在南满地区迅速传开了。

当时在南满，除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还有一些自发的抗日队伍，其中也有响应抗日的“胡子”（土匪），他们却未改土匪的恶习。开始，人们只知道有个日本鬼子悬赏一万块大洋捉拿的杨司令，但杨司令的队伍对老百姓怎样却心里没底儿。

1933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濛江东深山里的一个小屯子突然传出杨司令的队伍要来的消息。人们早被“胡子”抢怕了，听到这个消息都惊慌起来。屯子东头的刘老太太，丈夫两年前被鬼子杀害，家里还剩下两个儿子，惟恐再遇不测，急忙叫儿子躲起来，把家里还值点钱的东西打个包袱藏在门外的秫秸堆里。半夜时分，刘老太太听到屯子里传来一阵狗叫声，连忙把耳朵贴到门缝上，只听门外一阵轻轻脚步，有人搬开了她藏包袱的秫秸，这下可把她急坏了。好不容易等到天亮，她推开门缝悄悄向外张望。噢！秫秸被铺开当了床，上面睡着一排抱着枪的人，包袱却好端端放在门前的地上，从来没见过这么守规矩的兵呢！刘老太太正疑惑着，一个身背长枪的人向她走来，微笑着对她说：“老太太，对不起，昨夜我们到这里，借用了你家的秫秸。”接着又拾起地上的包袱递过去：“这是你家的吧？快收好，看看少东西了吗？”刘老太太愣了一下，用颤抖的双手接过包袱，激动地说：“你们……杨司令……”“是啊！我们就是杨司令的队伍。”拿长枪的人走过来扶着刘老太

太亲切地说道：“我们是穷人的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打日本强盗的队伍。”刘老太太的眼泪簌簌直掉，高兴地向屋里喊着：“快出来吧，孩子们！杨司令给咱们报仇来啦！”一会儿，杨靖宇和一些战士打扫完屯子的街道来到这里。刘老太太一下拉住杨靖宇的手，流着泪说：“杨司令，我可见到青天了！现在我就把两个儿子交给你，让他们跟着你给他爹报仇，给咱们中国人报仇！”就这样，杨靖宇的抗日游击队里又多了两个年轻的战士。

杨靖宇足迹所到之处，撒播下抗日的火种。他不仅向老百姓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还十分注意团结一切抗日力量。

盘石一带有两支东北军余部，一支叫赵旅，一支叫马旅，加在一起有200多人。这两支队伍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既打日本人，也打抗日游击队。因此游击队的一些人主张狠狠教训他们。但杨靖宇认为，他们能够打鬼子，说明他们不是汉奸，为了发展抗日的力量，就应该争取团结他们。

有一次，赵旅和马旅在玻璃河套北板凳沟遭到日伪军的重兵包围，因寡不敌众，从早晨打到中午，几次突围都没有成功，伤亡很大，处境十分危险。杨靖宇得到消息后，立即率领50多名战士赶去救援。他们抄到敌人后面，用步枪、土炮朝敌人袭击，有的儿童团员还点起一串串爆竹，一时间响声大作。敌人被这突然的袭击搞懵了，不知来了多少游击队，连忙掉转身子，乱放了几枪后，丢下几十具尸体，慌忙逃走。战斗结束了，赵旅长紧紧握住杨靖宇的手感慨地说：“真惭愧啊！过去我对不住你们，这一回我算知道谁是朋友了，以后我姓赵的再有三心二意，对不起盘石父老，天理良心不容！”杨靖宇劝慰道：“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提啦！只要我们能紧紧依靠群众，团结起来，枪口一致对外，一定会把日本鬼子打跑！”从那以后，赵旅、马旅两支队伍积极配合杨靖宇作战，多次取得战斗的胜利。其他一些自发的抗日武装也纷纷投奔杨靖宇，表示愿意联合抗日。不到一年，南满抗日游击队就由几十人发展到近万人，正式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

1933年10月，杨靖宇率第一军独立师开赴松花江以南扩大抗日游击区。在黑石过江时，刚刚下过一场雪，江面已结了一层薄冰，渡口没有桥也没有船。杨靖宇来到队伍的前面，用坚定的声音向战士们说：“同志们！为把敌人赶出中国，我们连枪炮都不怕，能叫江水把我们吓住吗？”说完，他把自己的战马让给个子矮小的同志，率先跳进江中，迎着寒风，破冰开道，涉水渡

到了对岸。

江南地区（指松花江以南地域），有个叫邵本良的惯匪头子，“九·一八事变”后投靠日本人，当上了少将“剿匪”总司令，他袭击抗日军队，残害无辜百姓，气焰十分嚣张。为给江南人民除害，杨靖宇过江后立即部署了消灭邵本良的战斗方案。

柳河县三源浦及凉水河子，是邵本良的老窝。一天，邵本良在柳河县城陪日本人吃饭，正当他向鬼子大吹一定要叫杨靖宇知道自己厉害时，突然接到电话，说凉水河子遭到杨靖宇围攻，请求派兵救援，他急忙带着人马赶去。刚走到半路，只见一个喽罗骑马从后面赶来报告：“不好了！柳河被杨靖宇攻下，一个中队的弟兄全报销啦！”邵本良又喝令队伍掉头。可当他赶回柳河时，却不见抗日军队的踪影。这时又传来了消息：凉水河子失守。邵本良一去一回，损兵折将，被抗日军队缴去大批物资，这才知道中了杨靖宇的调虎离山计。气急败坏的邵本良连夜向主子求援，第二天，29000多名日军开始向抗日军队围攻。诡计多端的邵本良还向部下发了一封假信，佯装东部有重兵把守，故意让信落到抗日军队手里。但杨靖宇当即识破他的伎俩，将计就计，也发出一封假信，佯作从西部突围。深夜，邵本良正自以为得计的时候，杨靖宇早已率队伍从他伪称“重兵把守”的东部突围出去了。事后，邵本良哀叹：“我邵本良就够鬼的了，可是杨靖宇比我还鬼。”后来，杨靖宇率部与邵本良多次交锋，始终没让邵本良占到便宜。

1936年，随着东北抗日力量的壮大，中共满州省委决定将人民革命军和其他抗日武装统一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原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编成抗联第一军，后与抗联第二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治委员。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汇入了中国全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杨靖宇号召抗联战士，勇敢地向日寇发动新的进攻，牵制敌人，配合关内抗战。这一年，杨靖宇率领着抗联第一路军，在南满和东满到处袭击日寇，取得了很大战绩。敌人为了剪除心腹之患，调集了更多兵力，向东北抗日联军发动围攻。

1938年春，所谓的“皇军剿匪之花”索旅开到集安，声称要“讨伐”杨靖宇。面对敌人的猖狂进攻，杨靖宇决定诱敌深入，先派魏拯民带一个师攻打蚊子沟伪警察所，吸引索旅，将主力部队埋伏在蚊子沟口待机。这天，杨靖宇派人窃听敌人的电话，得知索旅三十二团果然上当，正向蚊子沟开来，运送给养的汽车已经出发。他立即派人连夜赶到小青沟截击，顺利地缴获了

敌人的汽车，满车的白面饼成了战士们的夜餐。为了继续吸引敌人，杨靖宇有意放走押车的敌人，叫他回去报信。天亮时，索旅的大队人马开到蚊子沟口，杨靖宇一声令下，抗联战士如同神兵天将，突然出现在敌人的面前。经过半小时战斗，索旅三十二团三、四百人全部被消灭。当增援的敌人主力赶来时，杨靖宇早已带着部队转移到集安老岭的深山密林中去了。

1938年10月，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寇开始用重兵对付后方的抗日力量。在东北，敌人除进行军事“讨伐”外，还普遍实行“集家并屯”和“保甲连坐”法，妄图割断抗日联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把抗日联军封锁和困死在深山老林中，这就使东北抗日联军的处境变得十分艰难。为了保存抗日的力量，杨靖宇率领第一路军一部1400余人，在这年冬天，告别了根据地的父老乡亲，进入到长白山密林中。

长白山的深山老林，白雪皑皑，杳无人迹。抗联战士只能打猎为食，以草根、树皮果腹，那一堆堆点燃的篝火，就是他们露宿的营地。在这最艰苦的岁月里，杨靖宇经常教育战士：“世界上有一种永远不知屈服的人，可以抛掉头颅，可以喷洒鲜血，而为了民族解放事业，忠贞不二的意志决不动摇。抗联将士，就是这样的人啊！”

杨靖宇一贯严于律己，环境越是艰苦，就越要与战士同甘共苦。有一次，地方上的同志给杨靖宇做了一件皮大衣，他接过大衣后严肃地说：“少做一件皮大衣，就可以多做几套棉衣，让三四个战士少受冻。官兵应一视同仁，你们为什么特别为我做这件皮大衣呢？”后来，他把皮大衣给了体弱的同志。

还有一次，部队数日未见粒米，警卫员黄生发设法从伐木工人那里讨来一块苞米饼送给杨靖宇吃。杨靖宇说：“不要只给我一个人吃，你把它捣碎煮点汤，让大家来吃。”小黄拗不过，只好照办。通讯员小聂看着司令员塌陷的眼窝和突出的颧骨，心里十分难受。他跑到一条小河旁，用刺刀凿开冰窟窿，抠出5只蛤蟆和十来个刺蛄，用茶缸化点雪水把它们煮熟送给杨靖宇。杨靖宇闻了闻那鲜香的气味，还是舍不得吃。他握住小聂的手说：“小家伙，谢谢你！可现在大家都饿着肚子，还是先给伤病员同志吃吧！”见小聂脸有难色，杨靖宇接过茶缸亲自端到伤病员面前。他看大家谁也不肯吃，大声笑道：“这东西满香哩！一大茶缸我都吃了一半了，这一半大家尝尝鲜。”他不由分说地就把刺蛄和蛤蟆塞到了伤病员们的手上，并深情地说：“同志们快吃，你们吃了，我心里才熨贴，这比我吃大鱼大肉还高兴”。

尽管环境极其艰难，杨靖宇仍然指挥着第一路军

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战斗。1939年冬，第一路军攻打桦甸县木箕河上游敌人的林场，消灭敌警察队240多人。不久，又在敦化南敌人军事重镇大蒲柴河，消灭伪警察200多人。

但这时，敌人又调集了更多的兵力，把第一路军层层包围在濛江县境内。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抗联部队伤亡很大。为了粉碎敌人的围攻，杨靖宇决定把部队化整为零，主力北上突围，自己带领五、六十人东进。

1940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杨靖宇的行踪完全暴露。在敌人昼夜不止的围追下，杨靖宇和他率领的队伍得不到一点休息的机会，牺牲和散失了不少同志。当部队只剩下十几个人的时候，杨靖宇把大家聚拢起来，他冷静而严肃地说：“多活一个人，就多一份革命力量，为了革命，我们要坚持到底。就是死，也不能泄露党的机密，不能向敌人屈服，革命总是会胜利的。”说完，他命令黄生发带着伤员向比较安全的回路上走，自己带着两个战士继续向前。几天后，杨靖宇身边的两个战士也牺牲了。敌人从牺牲的战士身上发现了杨靖宇的一颗印鉴，于是加紧追捕。

2月23日下午，杨靖宇来到濛江县保安村附近的三道崴子，这时他已经五、六天没有吃到一粒粮食了，脸带着冻伤，衣服、鞋子都被荆棘刮破了。不一会儿，跟踪而来的日军“讨伐队”发现了杨靖宇，立即把他包围在一片树林中。

几百名敌人渐渐向杨靖宇逼近，随行的汉奸高声尖叫：“快投降吧！投降就让你当大官！”杨靖宇背靠着一棵大树，冷眼看着敌人，从容地从怀中抽出双枪，对准敌人猛烈地射击。一排敌人应声栽倒，又一排敌人蜂拥而上。一颗子弹打中了杨靖宇的左腕，他就用另一只手继续射击。终于，杨靖宇的子弹打光了，胸中敌弹，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热血。

残暴的侵略者无法理解，杨靖宇在完全断绝粮食的情况下，在冰天雪地里，怎么能这样顽强地战斗。敌人剖开他的遗体，发现胃里连一粒粮食都没有，只有野草、树皮和棉絮。

杨靖宇牺牲时年仅35岁。他的未竟事业后继有人。他所谱写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仍然响彻在东北大地：

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合军，
创造出联合军的第一路军。
乒乓的冲锋杀敌缴械声，
那就是革命胜利的铁证……
英勇的同志们前进呀！
赶走日寇推翻“满洲国”，
这一次的民族革命战争，
要完成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

（责任编辑 凌辰）

报国敢云天职尽

——赵登禹将军事略

●苗润青

北京有条马路，叫作“赵登禹路”，是为了纪念抗日爱国将领赵登禹而命名的。

赵登禹是山东省巨野县人，家境贫寒，没读过书，从小便在家乡务农。他长得身材高大，擅长武术，于1916年投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在一团一营一连当兵。后来，他的本家叔叔赵学礼、本家兄弟赵登榜也都先后投冯玉祥部当兵。连长孙良诚发现赵登禹忠诚可靠，作战勇敢，故而深为赏识。1918年，冯玉祥在湖南常德任镇守使，一次挑选警卫员，孙良诚（时任营长）便把赵登禹推荐给冯玉祥。其间，冯玉祥经常对赵登禹进行爱国爱民教育，并令其学习文化，使赵登禹大有进步。1920年，冯玉祥驻湖北谌家矶时，扩充了一个团，赵登禹回孙良诚部，升为排长。

1921年，冯玉祥率十六混成旅入陕，帮助陕西督军闫相文打败了陈树藩，闫相文便向北洋政府举荐冯玉祥升任师长。北洋政府实权人物曹錕、吴佩孚对冯玉祥向有成见，本欲不准，后经闫相文多次力荐，才在不加饷、不增械等条件下，将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改为陆军第十一师，冯玉祥升任师长，授中将军衔。1922年春，第一次直奉大战爆发。赵登禹在孙良诚团任尖兵排长，攻打奉军炮兵阵地。赵登禹骁勇善战，和大部队一起，攻下奉军阵地，缴获大炮百余门，全胜而归。赵登禹遂升任第一连连长。同年11月，冯玉祥就任陆军检阅使，将部队驻扎在北京南苑，开始了著名的“南苑练兵”。赵登禹作为优秀的下级军官，被选送到“军官教导团”，学习《军人教育》、《军人宝鉴》、《典范令》、《曾胡治兵语录》等军事教材。通过系统学习，赵登禹在文化知识、军事才干等方面均获益非浅。

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冯玉祥对曹錕、吴佩孚的穷兵黩武早已深恶痛绝，便联合胡景翼、孙岳等人，不费一枪一弹，完成了首都革命，将贿选总统曹

錕囚禁在中南海延庆楼，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故宫。随后，将北洋陆军改称为国民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是年，赵登禹升为营长。

1925年秋，第二师师长刘郁芬奉冯玉祥之命，率部赴兰州出任甘肃督办一职。原甘肃督军陆洪涛手下的第一师师长李长青野心极大，意欲消灭刘郁芬部。刘郁芬察觉后，先下手为强，设宴诱捕李长青及李部营长以上的军官。刘郁芬挑选了赵登禹、梁冠英等数十名中下级军官，一律装扮成士兵，埋伏在宴会厅四周。应邀而来的李长青等人刚刚就座，伏兵便冲进大厅。赵登禹首当其冲，扑到李长青身旁，将其擒住。李长青竭力反抗，但赵登禹身高力大，将李长青双手扭到背后，并缴下李长青的手枪。李部其它军官也被梁冠英等人一一制服，束手就擒。三日后，李长青和他的第一旅旅长包玉祥被秘密处死。

1926年夏，甘肃天水镇守使孔繁锦和平凉镇守使张兆钾（均系吴佩孚旧部）得知冯玉祥部在南口大战中失利的消息后，便相继出兵，企图夺取兰州。刘郁芬下令全线出击，顺利歼灭孔繁锦部，并攻下天水城。孙良诚（已被提升为第二师师长，刘郁芬不再兼任师长）率吉鸿昌旅和梁冠英旅攻打张兆钾部，在干草店与张部接触。吉鸿昌负责正面进攻，梁冠英则负责两翼包抄，投入两团兵力袭击张部左右两侧。赵登禹率全营最先冲入敌军阵地，用大刀砍杀敌人。他的本家叔叔赵学礼（时任连长）也挥舞大刀，冲入敌群。他们叔侄二人笃信基督教（冯玉祥素有“基督将军”之称，他的部下大都信仰基督教），常听牧师讲《圣经》。赵登禹生性诙谐，平时戏称赵学礼为“天叔”，赵学礼则称赵登禹为“天侄”。在拼杀中，叔侄二人不离左右，互相照应。倘若分散，赵登禹便一面杀敌一面高喊：“天叔，你在哪里？”赵学礼也高喊：“天侄，我在这里！”气氛轻松诙谐，极

大地鼓舞了士气。叔侄二人齐心协力，杀伤敌人最多。敌军在三面夹击下，向平凉方向溃逃。孙良诚率部追至平凉，张部如惊弓之鸟，弃城而逃。赵登禹战功显赫，遂升为团长。

1926年8月，冯玉祥访苏回国。9月17日，在内蒙古的五原县举行了历史上著名的“五原誓师”，采纳了共产党人的意见，决定出师西安，然后再同北伐军会师郑州。当时确定的方针是“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八个字。

西安当时的驻军是国民军第二军李虎臣的第十师和国民军第三军杨虎城的第三师，共一万多人。李、杨二人被直系军阀刘镇华的五、六万“镇嵩军”围困了8个月之久，西安城内粮食已尽，各种动物都被宰杀，树皮都被剥光，城内饿死的军民多达五万人。冯玉祥兵分十路，挥戈南下，以解西安之围。孙良诚为第一路军司令兼前敌总指挥，是十路援陕大军的前锋部队。他率部取咸阳、渡渭河，直达西安附近的未央宫。待其它各路军陆续抵达后，於11月下旬向刘镇华部发起总攻。刘部无力招架，狼狈逃出潼关，西安之围遂解。战后，赵登禹升为旅长。这时的赵登禹，经过无数次战斗的磨炼，已成为西北军的一员骁将。他从当兵开始，直到升为旅长，始终跟着孙良诚。孙良诚在冯玉祥部有“常胜将军”的美称，他率领的部队也被称为“铁军”，从未打过败仗。除了孙良诚指挥有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赵登禹、吉鸿昌等一大批优秀军官作为中坚力量，在部队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部在各个战场上捷报频传，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节节败退。9月18日，张学良发出通电，宣布与蒋介石联合，挥军大举入关，与蒋介石南北夹击冯玉祥部，整个战局便急转直下。冯玉祥部士气瓦解，人心涣散，吉鸿昌、韩复榘等人纷纷投降了蒋介石。赵登禹坚决不降，跟随冯玉祥退到山西汾阳峪道河。不久，经冯玉祥同意，退到山西境内的张自忠部、赵登禹部、刘汝明部以及留守后方的宋哲元部，由张学良改编为第二十九军，宋哲元任军长，赵登禹在第三十七师任旅长。二十九军的中高级军官，都是冯玉祥的老部下，受冯玉祥教育多年，具有强烈的爱国心。“九·一八事变”后，二十九军将士同仇敌忾，成为一支抗日的武装力量。

1933年初，宋哲元率二十九军援助与日军作战的万福林部。万福林被日军打败，率部从热河退往喜峰口。二十九军迅速占领了喜峰口，阻击追赶而至的日军。3月初，赵登禹旅首先与日军发生激战。日军用飞机、大炮、机枪猛烈轰炸扫射，部队伤亡惨重。但赵登



赵登禹将军

禹率全旅官兵坚守阵地，使日军久攻不下。为了改变被动局面，赵登禹亲率一个团，找当地樵夫或猎手当向导，于夜间偷袭日军。是夜，赵登禹率部摸到驻扎日军的某村庄内，发起突然袭击。日军在睡梦中仓促应战，被杀伤数百名。在激战中，赵登禹腿部受伤，他草草包扎一下，继续率领部队杀敌。直到击溃日军，赵登禹才感到疼痛难忍，不能行走，被士兵抬回驻地。从此，二十九军各部白天坚守阵地，夜间袭扰日军，使日军每到夜晚便惶惶不安。

二十九军在喜峰口苦战数月，蒋介石未供一枪一弹。而日军武器精良，人员每有伤亡，马上得以补充。尽管双方力量十分悬殊，但在二十九军的奋力抵抗下，日军始终不能前进半步。数月后，蒋介石命令二十九军撤离喜峰口，回北京驻防，喜峰口抗战遂告结束。赵登禹在抗战中功绩卓著，升为一三二师师长。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了芦沟桥事变，遭到二十九军吉星文团的抵抗。日军深知二十九军不好对付，便假意与二十九军进行和平谈判，暗中却从东北调来大量精锐部队，意在进攻北京。



二十九军将士在喜峰口抗击日寇

7月29日，日军向驻在北京南苑的赵登禹部发起突然进攻。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赵登禹率全师官兵全力抵抗。日军动用了飞机、大炮，对南苑狂轰滥炸。南苑一带全是开阔地，没有地物可以利用，形势十分不利。赵登禹当机立断，率全师官兵冒死出击，与日军展开近战、肉搏战，使日军的飞机、大炮失去作用。全师将士齐声呐喊，冲向日军，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赵登禹身上多处受伤，仍然奋力杀敌。当与日军拼杀到南苑北面的大红门时，赵登禹不幸阵亡，时年47岁。同时阵亡的还有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千余名将士。冯玉祥听到噩耗，遂作悼诗一首，以寄哀思。

吊佟赵

佟是二十六年的同志
赵是二十三的弟兄。
我们艰难共尝，
我们患难相从。
……
佟善练兵心极细，
赵长杀敌夜袭营。
佟极俭朴，

而信教甚诚；
赵极孝义
而尤能笃行。
二人是一样的志，
二人是一样的勇。
……
后死者奋力抗战，
都奉你们为榜样。
我们全民族已在怒吼，
不怕敌焰如何猖狂。
最后胜利必在我方！
最后胜利必在我方！
……

（责任编辑 孙 申）

『芦沟桥事变』 时的守桥排长李文成

○柯峰 君山



李文成近照

1937年的7月,在北京西南宛平县这座举世闻名的芦沟桥畔,枪炮的轰鸣声震天动地,在滚滚弥漫的硝烟中,二十九军将士集中起全国人民的万丈怒火,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筑就了新的长城,“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从那时起,芦沟桥就成了整个中华民族团结御侮、英勇不屈的象征。每每看到或想起它,哪个炎黄子孙的心海里不激起千重波涛,万丈怒火!

—

1986年10月8日,一封来自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信件,悄然飘进河南省郾陵县张桥乡北小王庄一座普普通通农家小院,落在了一位

看上去极普通极平常的老人手中,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李文成同志:

为迎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加强在国内外进行爱国统一战线的宣传,反映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历史功绩,定于1986年10月21日至23日,在芦沟桥及宛平城拍摄原二十九军老战士重返旧战场的历史文献片《芦沟桥的枪声》(暂名,系爱国统一战线系列片之一),特邀当年“七七事变”亲历者,原二十九军在该地区参与作战的官兵及部分原二十九军将士的亲属参加拍摄,敬请出席,并予支持。

中共中央统战部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随信寄来的还有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著名编导木铁的亲笔信和他编写的两本书，扉页上恭恭敬敬地写道：敬赠抗日老英雄李文成前辈。

未等看完来信，这位名叫李文成的老人早已是老泪纵横了，精美的信笺从他手中飘然落地，儿子青林走过来俯身拾起，搀扶老人慢慢坐下，安慰他说：“爹，你这是咋啦？叫咱去咱就去嘛……”

李文成要进京拍电影的消息不胫而走，乡亲们纷纷奔走相告，到李文成家问长问短。

李文成在村里为人厚道，是个有名的热心人。他虽然身体不好，一只眼睛失明，腿上还留有战争年代的创伤，行走不便，但春耕秋收犁耨锄耙一应农活样样不落人后。村人隐隐记起，“文革”时曾有人别有用心地说李文成“历史不清”，是“老兵痞”、“匪连长”，变着法儿折腾他。大家虽说都为他流过同情的眼泪，但谁也不敢对当时讳莫如深的“历史问题”说短道长。今天，人们在解开心头多年疑团的同时，陡然感到格外的惊讶。真真意想不到啊，当年曾经震惊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芦沟桥事变”，竟然会和眼前这位又矮又瘦、沉默寡言的老人联系起来。他们好奇地围拢在李家小院里，想听老人给讲点什么。但此时的李文成，激动得一个字也说不出，那张饱经风霜、皱纹纵横的脸颊上，流淌着点点泪珠。历史的镜头一幕幕在他眼前折回，恍如昨天……

二

1909年10月15日，李文成出生在小王庄一个贫寒农家，3岁时父亲打麦工累死他乡，9岁时母亲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改嫁。祖父怜儿惜孙，悲伤过度，在一个风雨之夜

也溘然长逝。自此，10岁的李文成与年迈的祖母相依为命，饥一顿、饱一顿地苦熬日子，度过了酸辛苦涩的少年时代。

中原地带自古多灾多难，水旱蝗灾，兵匪官绅，民不聊生。1928年4月的一天，李文成卖了家里仅有的一口小缸和一件破棉袄，到鄢陵县城去交“公粮”，正遇冯玉祥的西北军在此设点招兵。只见老衙门口一根杆子上挑着“招募新兵”的白幛，一旁站着戴红箍圈大顶军帽的士兵，四周挤满了看新鲜的人群。

李文成交完粮，随着人们在老衙门口观看。收兵的一见眼前这个庄稼小伙虽衣不遮体，但相貌堂堂，体格健壮，谈吐憨厚朴实，就一个劲儿地撺掇他说：“跟我们走吧，有吃有穿，大白米、细洋面，一月管饷六块半。再说你在家也混不出个啥头脸。”为了混口饭吃，18岁的李文成心动了，他把牙一咬，顾不得回家和祖母商量，只身弃家入伍了。招兵的发给他16块钱，他只留在身边3块，把其余全部都交给同乡，让他千万捎到家交给祖母，然后含着眼泪跟着队伍踏上远去的征途。

李文成跟着部队出生入死，南征北战，几乎每日每时都和枪声、炮声、嘶杀声作伴。开封、洛阳、西安、兰州、嘉峪关……从中原大地到莽莽秦岭，从西北边塞到北国荒原，几乎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迅速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怒潮。李文成所在西北军二十九军全体将士，在爱国将领宋哲元、冯治安等率领下，坚决举起抗日义旗，提出了“枪口不对内”、“抗战到底，牺牲到底”的响亮口号。为加强抗日宣传教育，进一步提高官兵应战能力，

军部办起了军事训练学校，由何基沣任校长，曾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过的师参谋长李建飞出任学校教导主任。

李文成作为第三营十一连的一名班长，有幸在这所军事学校学习了9个月。此间他废寝忘食，刻苦学习各种文化知识，学习军事技术，接受全新的军事科目训练。李建飞主任多次亲自向学员授课，以他在日本求学时的亲身经历，向大家讲述了日本帝国主义是怎样向国民进行赤裸裸的侵略意识教育，野心勃勃妄图吞并整个中国的……在军事技术课上，他们曾集中练习过大刀武术。李主任讲过，日军只要一打肉搏战、拼刺刀，战术就用“老六刺”：上刺咽喉，中刺前胸，再刺左右两肋，最后刺背命中穴。我们破“老六刺”的对策是“单刀破枪”：先架刀拨枪，顺势左砍，再翻右砍，即一刀先砍左臂，二刀朝下砍小腿，三刀劈头命归阴。

李文成每天早上第一个起床，在微露的晨曦中练习刀法，每天晚上他又是最后一个披着溶溶月光回到营房。经过几个月的体能训练，他的臂力又大有长进。一次校方组织了刀法竞技，李文成虽然身材不高，但却以刀法娴熟、步法有序而博得学员们的一阵阵喝采声……

1933年2月，日本军侵占热河省。接着，又进攻长城要塞，逼近北平、天津，整个华北危在旦夕。二十九军义赴国难，在长城一带严阵以待。战士们义愤填膺，磨拳擦掌，早已按捺不住与日寇决一死战的决心。

1933年3月，正向前推进的日军遭到二十九军的顽强狙击，著名的长城战役打响了。

农历二月初七日，长城喜峰口左翼的猴山在日军炮火的猛烈轰

击下，石片纷飞，硝烟弥漫。上午10时左右，“轰隆”一声巨响，一颗迫击炮弹在十一连连长侯德星身旁爆炸，当即身负重伤，血流如注。勤务班长李文成和一排排长耿希训闻讯赶来，要把侯连长抬下阵地，遭到他的断然拒绝，他用尽生命的最后一丝力气命令道：“耿排长，现在由你代行连长职责，继续指挥战斗……”话音未落，一串机枪子弹雨点般扫射过来，打在李文成身边的石头上，冒起一串火花，一颗弹头从石头上反弹起来，不偏不倚正打在李文成的右手上。他只觉得一阵钻心的疼痛，低头一看，整个右手掌全被鲜血染红了，大拇指从中间劈开，露出白色的骨茬，紧握在手里的手枪把儿也断了……代理连长耿希训见状，命令李文成下去。李文成倔强地摇摇头，撕下绑腿布草草包扎好伤口，又投入了激烈的战斗。

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下，日军的进攻尽管相当凶猛，但最精锐的第八师团依然受到重创。二十九军收复了喜峰口和罗文峪口。李文成在战斗中因表现英勇，而受到团部的通令嘉奖。

三

1937年3月，李文成随二十九军调往宛平，接守芦沟桥防务。

芦沟桥是平汉线上最北端的一个咽喉。日寇占领通州、丰台、南口以后，把芦沟桥和宛平又作为南侵华北的战略目标。日军离芦沟桥最近的据点就设在大瓦窑。日军指挥官司令田代、旅团长合边正三，密授部下士兵寻衅闹事挑起事端，同时在大桥附近组织大规模“军事演习”，肆无忌惮地对中国军队进行威胁和挑衅。

面对强敌，二十九军针锋相对，构成统一防线。其中二一九团

第三营在营长金振中的率领下，接受了石拱桥和铁路桥两侧的防守任务，其中李文成所在的十一连担任正面守卫铁路桥任务。具体部署是：一排排长高志儒率部防守铁路桥东北前沿阵地回龙庙；二排排长李文成率部镇守铁路桥咽喉；三排排长李义臣率部沿阵地作预备队待命。

李文成接到了刚刚下达的布防命令，深感自己责任重大，顾不得吃晚饭，立即召集各班长研究部署火力，带领战士们挖战壕，筑工事。自此一连数月，100多个日日夜夜，他们都是携兵而食，和衣而卧，时刻注视着对方日军的动静。

1937年7月7日那天午夜，芦沟桥附近，炎热的夜空忽然袭来一阵阵寒意，刚才还是群星闪烁的晴天，一会儿便被一团又一团涌来的乌云遮严了。忽然，一阵接一阵恶犬的狂吠声从大瓦窑那边传来，打破了夏夜的寂静。11时30分左右，3名全副武装的日军士兵，鬼头鬼脑地顺着桥头附近的高粱地悄悄逼近芦沟桥，企图作夜袭侦察。我执勤班长李延辉、战士左庚午、张得法等发现后，大声疾呼并迅速冲入高粱地，偷袭的鬼子见势不好，狼狈逃窜了。

正在桥头查岗的排长李文成详细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后，预料到事态有可能进一步恶化，立即命令战士们做好应战准备。果然，当夜日军即出动大批人马向大桥逼近，并通过外交途径与我方官员谈判交涉，节外生枝地说我方扣压日军巡逻兵一名，并扬言要强行过河寻人。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我方的坚决拒绝。

黎明前4时左右，日军以3个连的兵力突然逼近我方回龙庙阵地，仍以找人为借口强行过桥。协助十一连防务的十连排长沈中明

出面拦阻。双方持枪扛膀、怒目相视，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只见一日本军官挥动手中枪支，“啪啪”两声枪声响过，沈排长胸口流出一股殷红的鲜血，“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日军首先开枪击伤我方指挥员，激起了战士们的万丈怒火，立即向营部汇报了情况。营长金振中下达还击的命令，李文成和战友们手中的长枪、短枪、机关枪、迫击炮、手榴弹都一起向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迸射出了愤怒的火焰，憋了多年的民族恨和血泪仇一下子爆发了出来。在这复仇的猛烈炮火中，疯狂进攻的日军士兵纷纷中弹倒地。李文成和他的战友们同仇敌忾，在不到半天时间内连续击退了日军的3次进攻。

枪炮的轰鸣声持续不断，战斗打得十分激烈。狡猾的日军见对大桥屡攻难克，伤亡惨重，就转变战术，调用大炮轰击我守桥阵地。李文成潜伏在战壕里，胸口紧紧贴着地面，只觉得震耳欲聋的炮弹轰鸣声一阵紧似一阵，眼前火光闪闪，弹片横飞，刺鼻的硝烟呛得人嗓子眼里象撒了辣椒面似的难受。他发现离他不远的五班班长杨尚清头部被弹片、砂石击中，六班班长常发财背部被炮弹击伤，遍体血流不止，还有不少战士也相继中弹身亡……

8日上午11时，日军认为炮击已经奏效，便接连打了几颗烟幕弹，战场上空顿时烟雾弥漫，能见度极低。大约由一个班日军组成的敢死队，借助烟雾象疯狗一样冲上了大桥。

排长李文成刚才亲眼目睹了被日军炮弹击中而阵亡的战友，直恨得咬牙切齿。这时他见日军冲上阵地，振臂大喊一声：“杀……”纵身跃出战壕，带领战士们抡起大刀

向鬼子砍去。这是一场扣人心弦的肉搏战。只见3名鬼子端着刺刀向李文成扑来。李文成镇定自若，大吼一声，手中的大刀带着呼呼地风声来了个左右开弓。随着两声惨叫，一个鬼子的脑瓜被削去半拉，另一个鬼子的胳膊被砍掉一截，两个鬼子几乎同时栽倒在地。第三个鬼子哇哇怪叫着，用刺刀恶狠狠地向李文成的咽喉刺来，李文成向下一蹲，鬼子的刺刀在空中一抖，又唰地刺向李文成的裆下。说时迟那时快，李文成猛退两步，从腰里拔出手枪向这个鬼子连连射击，这家伙站立不稳，摔倒在地上……我方发挥大刀优势，横砍竖劈，日军这班敢死队溃不成军，死伤过半，剩下几个见势不妙，狼狽逃回。

7月8日下午，日寇再次改变战术。他们先攻大桥两侧，不左即右，企图以此来分解我方守桥兵力。我们在认真研究分析了敌情后，采用了左右应战，固守大桥的战术，全体官兵团结战斗，顽强拼搏，寸土不让，誓与大桥共存亡。日军见久攻不下，又伤亡惨重，不由气极败坏，又一次对我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

16时前后，营长金振中来到前沿阵地，手执望远镜查看敌情，突然，一发冷炮在他身边炸响。一团硝烟散开，金营长倒在一片殷红的血泊里，已经昏迷不醒。李文成发现后，立即和几个战士一起把他拖下战场，用担架火速送到长辛店师部战地医院。

经过医务人员的全力抢救，金营长终于苏醒过来。当他吃力地睁开双眼，发现了站在身边的李文成。他忍着伤痛说：“李排长，你回去代我向耿副营长传话，芦沟桥是我们祖国的生命线，也是我们第三营全体官兵的生命，我们要誓死捍卫它，只能坚守不能妥协，针锋相

对寸土不让……”看着金营长的满身血迹，李文成流着热泪颌首听命。他带着营长的嘱托，立即返回了硝烟未散的战场。

7月9日晨，日军因在战斗中并未取得“赫赫战果”，便又使出和谈的伎俩。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通知中方代表说：“失踪日兵业已寻到，此事可以和平解决。”待刚刚达成的停战协议传到我军阵地时，日军却悍然撕毁。驻丰台的日军大队长一木青直，指挥其炮兵向芦沟桥、宛平城轰击两小时后，亲率步兵、坦克向我军桥头阵地猛扑，被我军顽强击退。11日上午8时，日军联队长牟田亲临前线指挥，他先以强大炮火把城、桥炸得砖石乱飞，浓烟滚滚，接着用加倍的兵力，在战车掩护下向回龙庙阵地猛扑。一排长高志儒率部再次与敌肉搏，终因敌众我寡，未能击退来犯之敌，桥头东阵地——包括回龙庙在内，被敌人占领。

面对日军突如其来的攻击，我军也作了新的布防。夜幕降临，由营部组织的敢死队150人左右，分为5组，在茫茫夜色掩护下悄悄接近敌军阵地。在两侧高地重机枪连的火力掩护下，鬼子兵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刺刀已闪着寒光刺进他们的胸口。我军充分发挥近战威力，用大刀片、刺刀、手榴弹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战斗进行到夜11时左右，近百名鬼子兵全部被消灭，回龙庙桥头阵地重新回到我军手中。

三个星期后，日方在停战前提下，要求中方将对手三十七师调往冀南，所遗防务由一三二师赵登禹部接替。我方为求得和平，同时也因为守桥部队伤亡过重（李文成排只剩17人）就允其所请进行调防。当部队收拾行装即将离开大桥时，李文成禁不住回过头来，鼻子一

酸，大颗大颗的泪珠滴落在石榴石柱上。他肃立桥头，庄严地对大桥行了一个军礼，在心里默默地说：“再见了，芦沟桥，将来我一定还会回来的！”

四

1937年9月，二十九军三十七师进行整编，改编为七十七军。李文成因作战勇敢被提升为十一连连长。顾不得拂去战刀上的征尘，他又率部相继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外围的南平集和武汉会战外围的于家集等重大战役。武汉失守后，李文成又随所在部队调往湖北荆门、大别山等地。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日军惨无人道地向中国军队施放毒气，李文成为掩护战友，一只眼睛不幸中毒，后经多方医疗无效失明。

1940年5月，日军以重兵进攻枣阳、宜昌地区。李文成所在部队奉命进入凤龙河，参加襄河对日会战。

一个阴云沉沉的上午，天空中飘洒着一缕缕晶莹透明的雨丝，崎岖的山路象抹了一层油似的又粘又滑。李文成从营部开完战前动员会议回来，招呼几名排长和副官，冒着濛濛细雨登上山顶，边走边察看地形，向他们一一布置任务。他的精力过于集中，忘记了脚下的山路又险又滑，突然，猝不及防，失足落下悬崖，整个身子箭一般顺着陡立的崖壁向下滑去，战友们的身影和惊呼声离他越来越远……在那一瞬间，他觉着自己这回算彻底完了。在他的潜意识里，军人应当血染沙场马革裹尸，而自己竟死于意外的失足，这实在是愧于军人的本色……

李文成没有死，他是万幸的，半山腰上一棵枝繁叶茂的孤树托住了他。那时，他已经昏迷过去，左

五



李文成和本文作者柯峰（左）君山（右）合影

小腿摔断，膝盖以下皮肤全部被划破。胯骨脱位，鲜血把整个军装都浸透了……

在医院住了一年多，李文成因身上多处负伤、健康状况欠佳，被调到团部当上副官，到后方募兵、军训，做后勤工作。

1945年8月，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部队传开：经过中国人民八年艰苦抗战，日本侵略者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李文成在兴奋之余，蓦然想到了遥远的家乡，想到了含辛茹苦的老祖母是不是还活

着？17个春夏秋冬，在思念中是那么漫长，是啊，是该回去看看了。于是，他向营长请了假，决定回家探望一下年迈的祖母。

1945年9月底，李文成迈着疲惫不堪的脚步，终于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河南老家。当他带着满身的征尘和战争的创伤一头扑进久违的家门，他才知道，当年老祖母在他当兵走后，思念成疾，加之天灾人祸，衣不遮体饭不果腹，早已不在人世了。

李文成在家度过了3个月孤苦的乡村生活。1946年春节过后，金振中团长接连来信，催促李文成迅速归队，无奈此时李文成腿伤复发未愈，行走不便，再回部队过军旅生活已不可能了。

一眨眼两年时间过去了，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国民党统治的覆灭，土地改革、剿匪反霸运动逐步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展开。1947年赵庄乡成立农会，大伙儿公推李文成当了赵庄乡小王庄农会会长。他为人厚道，办事公允，颇受乡亲的赞誉。

李文成从来没有向别人提起过自己那一段非凡的经历，也不想借此炫耀自己或者用它来换取什么好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国难当头、强敌入侵的非常年代里，他只不过尽了一个中国人应尽的一份职责，更何况还有那么多的亲密战友已经血染沙场为国捐躯，他能够得以生还也就死而无憾了，何谈什么荣耀和回报呢？他只想把自己那段历史深深地埋在心底，和父老乡亲们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平平静静地过完自己的余生。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尽管在“文革”的风暴中，他竟遭到批斗和毒打，忍受着精神上 and 肉体上的折磨，但对往事的回忆却给他以无限的慰藉。

六

1985年8月，北京芦沟桥文物保管所所长郭景兴同志为收集史料，来到河南省固始县金振家中。通过金家的介绍，才知道了当年芦沟桥守桥排长李文成的一些具体情况，遂向有关部门作了汇报，并邀请李文成到北京做客。

他作为当年的守桥排长，是为

数不多的至今仍健在的“芦沟桥事变”的亲历者之一。

1986年10月23日下午,艳阳高照,暖意融融。在北京59301部队招待所宽敞明亮的会议大厅里,为拍摄历史文献纪录片《芦沟桥的枪声》,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组织召开的原二十九军将士团聚茶话会正在这里进行。李文成在儿子李青林的陪同下也来到会场,他和日夜思念的战友们终于重逢了。大家紧紧的握手、拥抱,一张张坚毅刚强、满是风霜皱纹的脸颊上流淌着悲喜交加的眼泪。

在这里,中央统战部秘书长胡德平同志心情也非常激动地说:“各位前辈的光荣历史确实名垂千古。现在,很多前辈已经年老了,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有些应该落实的政策还没有落实,我们应该向大家检讨……”

在新影厂摄影师缓缓转动的镜头前,李文成的双脚终于又一次

站在了芦沟桥头,看着眼前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大桥,历史的镜头又一幕幕在他眼前闪回,战友们叱咤风云的身影又一个个在他眼前迭现,当他颤抖的双手又一次抚摸着桥上的一砖一石时,眼泪象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滚而下,又一次打湿了衣襟……

李文成在北京逗留了数日,儿子青林带着他游览了名胜古迹,在天安门广场、颐和园、八达岭等地摄影留念。新影厂编导木铁同志(原名张光天,著名佩剑将军张克侠之子,抗美援朝时曾任随军记者),告诉李文成:“我已给河南省委统战部写了信,具体向他们反映了您的情况,今后,一切会逐步好起来的。”

数日后,李文成父子离京返乡。当他们路过郑州时,中共河南省委统战部有关领导同志热情接待了他们,详细询问了李文成的家庭生活情况,并提出了落实政策、

生活补助等一系列问题。

祖国用母亲般宽阔的胸怀,再次拥抱了自己铁骨铮铮的儿女。1987年初,78岁的李文成被增选为鄢陵县政协委员。

消息在村里传开,人们都用敬佩的目光注视着这位老人。在全国上下认真加强对青少年一代进行“两史一情”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村学校、乡团委请李文成去为孩子们作报告,根据他口述整理的文史回忆录《芦沟桥事变亲历记》、《八年抗战中我所经历的几次战斗》等相继在有关报刊上发表。李文成以自己耄耋之年的余辉,向世人昭示着一代英杰的顽强性格。

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不管是到过或没有到过芦沟桥的人,都不会忘记1937年7月那个血雨腥风的日子,都不会忘记那些为祖国为民族流淌过热血的守桥英雄们!

(责任编辑 王 恂)

采千刊佳作 汇文苑精华

请订阅《期刊锦绣》大型文摘月刊

当地邮局正在订阅 邮发代号:82—619

《期刊锦绣》由中国期刊协会主办,国家新闻出版署主管。较之已经出版的文摘类刊物,它的含量更大、内容更丰富、印制更精美,具有更强的知识性、趣味性、资料性与可读性。

《期刊锦绣》由北京市报刊发行局向全国发行,每月10日在北京出版,每期16万字,定价3.60元。如在邮局漏订,请汇款:北京东城区沙滩北街2号(100727)《期刊锦绣》杂志社郭玉华,邮费免收。

杨虎城 在 欧美 宣传抗日

●袁武振 梁月兰



出国前身着上将礼服的杨虎城

(1937年6月摄于上海)

1937年6月至11月，杨虎城在蒋介石逼迫之下前往欧美“考察军事”，但他的抗日意志并未因此而丝毫减弱。作为杰出的爱国将领，他无时无刻不盼望着走上抗日的沙场；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他在海外竭力进行抗日和反法西斯的宣传。他在如何争取抗战胜利问题上所提出的持久的人民抗战的主张，反映了他在“西安事变”之后思想上的飞跃，使他的爱国形象更为高大。

一、被迫“辞职出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在扣留张学良的同时，又开始对杨虎城步步紧逼。

1937年3月初，蒋介石通过宋子文、顾祝同向杨虎城授意，要杨主动去见蒋，以便“恢复感情”。杨虎城于3月18日到达杭州后，蒋介石即向他“摊牌”。他问杨：“经

此次事变，你在这样环境中继续任职，感觉有什么不便的地方没有？”杨虎城还没来得及回答，蒋又抢着说：“在事变中各方面是有对抗情绪的，他们对你的印象一时转不过来，你继续任职在感情上会有些不便。你不如先行欧美参观一个时期，然后回来任职。”据杨事后所谈，对蒋介石的这一手他是预料到的。

杨虎城回到西安后，蒋介石又于4月16日致电新任陕西行营主任顾祝同，要杨“不应提出任何条件”，立即“辞职出洋”，否则“一提条件，则无复可言矣”。在蒋介石的威逼下，杨虎城于4月27日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及十七路军总指挥职务。蒋介石即于30日以中央军委委员长名义复电“照准”，并催促杨虎城立即至上海办理出国手续。就在这时，陕西各方面要人和杨的

部下纷纷挽留。正在西安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周恩来，也通过种种途径要求蒋介石推迟杨的行程，但蒋不予回答。

5月27日上午，杨虎城离开西安前往上海。这天一大早，成千上万的十七路军官兵、各界爱国人士、各学校师生及广大市民，或列队或自发前往西安机场为杨送行。11时，杨虎城到达机场，人们激昂的感情达到顶点，鼓掌声、口号声、乐器声响彻云霄，其气氛之悲壮使人热泪夺眶。这样盛大的送别仪式在西安是空前的，表现了陕西军民对杨虎城的爱戴和对蒋介石的抗议。杨虎城被这种真诚的场面深深地感动了，不断地挥手向人们致意、告别。谁又能想到，这竟是他与父老乡亲们的诀别，从此他再也未能踏上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

6月16日，国民党中央军委下达指令：“兹派杨虎城为欧美考

察军事专员”。29日正午，杨虎城乘美国大来公司“胡佛总统号”邮轮离开上海，开始他的欧美之行，同行的有夫人谢葆贞、次子杨拯中（7岁）、秘书亢心裁、参谋樊雨农、仲跻翰及国民政府外交部特派员王麟阁，共6人。杨虎城对在码头上欢送他的各界人士发表谈话说，此行名义上考察军事，实际将兼考察农林、经济建设；行程美国，尔后英、法、德、意、丹麦等国；时间政府定为一年，但恐怕不够，大致会延长；盼他日归来，能见国家愈益强固。

汽笛一声长鸣，轮船开动了。杨虎城手扶栏杆，心情沉重地向人民挥手告别。遥看着送别的人远去，他仍不忍转向船艙。

二、要求回国抗战

杨虎城的此次欧美之行，自1937年6月29日离开上海开始，到同年11月26日返抵香港九龙为止，历时近5个月，环绕地球一周，历经11个国家，计有日本（过境）、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瑞士、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和卢森堡（后两国过境）。蒋介石虽然把杨虎城赶下了台并流放国外，但他的这种迫害并没有丝毫减弱杨虎城的抗日意志。

7月8日，杨虎城在船上听到“芦沟桥事变”爆发的消息后，立即致电宋子文询问事变真相。10日，船抵夏威夷，杨虎城在中国总领事馆得知“芦沟桥事变”真相。他在日记中写道：“华北事变，今日得知其详，国事如斯，余亦无意逍遥国外矣。”次日，他又收到宋子文来电：“芦沟桥战事停而复作，敌并由关外调来大队，我方已准备作战。”杨虎城得知此消息后亦喜亦忧，喜的是南京政府终于决心同日本开战，他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

努力以及为此付出的牺牲没有成为徒劳；忧的是自己身为军人不能报国于沙场，却被迫徜徉于欧美的山水之间。他即刻向国内发出三封电报，一致宋子文：“日寇进迫，国将不国，恶耗传来，五中痛愤。第一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乞转陈委座。”一致旧部孙蔚如：“途中闻河北事变，不胜痛愤。现在实情如何，盼详复旧金山中国领事馆。”一致王炳南：“余自旧金山返国抗敌，希转告各友好。”王炳南时为中共中央与杨虎城之间的联络员，杨虎城给他的电报实则意在致电中共中央。

7月14日，船抵旧金山，杨虎城又对当地华侨救国会发表书面谈话，再次表达了自己返国抗日的迫切愿望：“我是一个革命军人，一个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信徒，参加革命已逾25年。我完全看透日本帝国主义一贯侵华的来历和动向。保卫国土是军人的职责，我一直要求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这次‘芦沟桥事变’是危及中华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我怎能置身事外，流连忘返？即拟兼程回国，请求任务，执行战斗，为国效死！”杨虎城不断地焦急着抗日的战况，他郑重嘱咐随员注意收听无线电广播，每至一处必须购买当日出版的报纸，以了解华北抗战形势的发展。在同海外侨胞的晤谈中，他也必然问到国内抗战的情势。

但是，宋子文的回电却使他大为失望。宋电的大意是，以目前情势观之，请稍缓返回。这就明确表示了蒋介石并不希望杨此时回国抗日的意图。急于回国参战的杨虎城，感到宋子文可能没把他为参加抗战而回国的意志表达清楚，又于7月16日直接致电蒋介石，请求准予中止军事考察，返回抗敌。同时

他还分别致电宋子文、于右任、徐永昌、邵力子等，请他们从旁协助。紧接着，杨又给孙蔚如、邓宝珊和冯钦哉拍电，望他们电请中央率部北上抗日。可是不久，宋子文复电杨暂留美国或先赴欧洲，俟中日宣战后再由中央电召回国。蒋介石的答复则更为简单，要杨继续考察。

三、争取国际援助

杨虎城回国抗日的壮志未酬，遂决定利用此次出国为抗日效力。他首先致力于争取对中国抗战的国际援助，为结成国际反法西斯阵线而奔走。

杨虎城每到一地，就极力宣传中国抗日战争的意义，呼吁英美政府认识中国抗战同世界和平的关系，力争各国政府和反法西斯团体给予中国抗战以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同时，他还接见大批华侨抗日团体，向他们介绍国内抗战形势，要求华侨协助争取各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援。

7月14日，杨虎城刚抵美国旧金山，就应当地华侨抗日会的邀请发表书面谈话，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侵略政策、法西斯暴行，破坏了世界和平，妨害各国的安全，也将为文明世界所不能容忍的。”他呼吁美国“履行为了公平和正义所制订的条约的条款，以保证太平洋沿岸各国的和平。”23日，他又应邀到旧金山市广播电台，就中国抗日问题进行了半个小时的广播演讲。从28日起，杨虎城在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停留数日，并与华侨团体广泛交换对抗日问题的看法和意见。他的这些活动经美国报纸和一些华侨报纸的报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8月4日，杨虎城乘法轮“诺曼底”号离开美国，横渡大西洋前往巴黎。杨之所以如此匆匆离美而

急于赴法，是因为巴黎是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活动的中心，许多国家的反法西斯领袖都在巴黎，许多世界性反法西斯大会也常在这里召开。加上巴黎有中国共产党人吴玉章负责的《救国时报》，他们可以帮助安排好杨虎城在法国及欧洲的活动。虽然杨已知蒋介石对他在国外宣传抗日的言论表示不满，但他仍然不懈地利用各种场合扩大抗日宣传的影响。在巴黎居住的40天里，杨虎城会见了察哈尔抗日名将方振武，参加了旅法、旅欧各华侨爱国团体和法国反战反法西斯团体举办的各种集会，如巴黎各界侨胞抗日大会、巴黎华侨商人抵制仇货大会、世界青年保卫和平大会、旅欧中国抗日联合会的代表会、旅德抗日后援会代表团的茶话会、法国参战华工总会的座谈会及法国人民第一次和平大会等等。

8月11日，杨虎城由伦敦到达巴黎，中国驻法大使馆和法国及欧洲华侨团体、《救国时报》社代表共计100多人，前往车站迎接。15日，巴黎各界侨胞在服尔特大厅举行抗日救国大会，欢迎杨虎城，到会者有500多人，抗日情绪极为高涨。杨虎城在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对日抗战》长篇演讲。他强调指出，“只有抗战才能生存”，“唯有抗战才会得到我国民族的解放”。杨虎城认为，取得国际援助的前提是要投入抗战，“唯有在抗战中才能得到国际人士的同情及援助”，“由过去的经验知道要改变国际的环境，如不抗战是无法转变的。”杨虎城最后引用孙中山先生“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嘱，论述联合反法西斯力量之必要，强调在争取国际援助方面，“侨胞责任，至为重大”。

除了动员侨胞支援祖国抗战

外，杨虎城还直接向法国和欧洲人民进行抗日宣传。当时，世界青年保卫和平大会在巴黎召开，杨虎城应邀出席并作了长时间的讲演，指出：“今天，无论在欧洲，还是在远东，和平都受到了威胁”；“反对战争贩子，为保卫和平而斗争，这对所有有正义感的人们都是一个义务，大家应努力尽到这一义务。”8月24日，杨又应巴黎世界博览会之请，对法国人民作了10分钟的广播演讲，强调中国抗战关系世界和平，希望法国人民给中国以积极支援。9月25日，法国人民第一次和平代表大会在巴黎举行，出席大会的法国各界、各党派和世界各国代表共达2000多人。杨虎城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这次盛会，并抓住这个极好机会，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国抗战，并吁请援助，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特别强调日本侵华和中国抗战与世界和平的关系，指出：“日本的野心极大，实不仅为中国之敌，而且是世界和平之敌”；“中国反对侵略胜利，将是远东和平的最好保障，也将是欧洲

和平的最好保障。”杨虎城最后呼吁：“中国人民盼望法国人民不仅能给我们以精神上的帮助，而且能在团结国联各会员国的基础上给我们以物质上的帮助。”此外，杨还于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在英国进行了一系列抗日宣传活动。

四、考察西班牙人民抗战经验

10月12日至24日的西班牙之行，是杨虎城在欧洲的又一重要活动。

1936年，西班牙几个资产阶级政党组成的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并由左派共和党人组成政府，共产党也获得了公开活动的机会。但德、意法西斯却支持弗朗哥发动叛乱，并于1936年8月入侵西班牙，进行武装干涉。这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反对，有5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组成“国际纵队”，和西班牙人民共同战斗。中共中央毛泽东也于1937年5月15日发出《致西班牙人民书》，表示支



1937年8月，杨虎城（右一）在法国巴黎留影



1937年10月中旬，杨虎城（中）与西班牙人民阵线将领合影

持。杨虎城重视西班牙之行的背景正是如此。当时世界上只有西班牙和中国进行着反法西斯战争，杨虎城并未按照蒋介石的指令着力考察资产阶级的军事，却急切地从巴黎亲赴西班牙，支持他们抵抗德、意法西斯侵略的斗争，并实地考察那里人民抗战的各种经验。他到马德里前线打了枪，以表示对保卫马德里的支持；并把用中、西两国文字写成的“同为民族独立民主和平而斗争”的锦旗，献给西班牙英勇战士；还拜会了援助西班牙抗战的国际义勇军总参谋长留德维格。

除此之外，杨虎城还利用各种场合发表支持西班牙人民抗战的言论。10月14日，杨虎城在瓦伦西欢迎会上的讲演中指出：“现在全世界已经在法西斯铁蹄之下发生了两处战争，一处是西班牙，一处是中国”，“我们同受法西斯侵略的这两个国家，不仅有共同的敌人，而且还有共同的目的，因此，这两个国家为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而斗争的战士，就更要密切联合起来，共同打倒唯一仇敌——法西斯。”10月18日，他在马德里前线

发表向英、美的广播讲话，严厉批评了英、美政府对德、意法西斯侵略西班牙和日本侵略中国所奉行的“袖手旁观”政策，指出这实际上是一种纵容侵略的政策，呼吁英、美采取积极的态度，对法西斯国家实行经济、政治和社会舆论各方面的制裁。

在西班牙的参观访问，使杨虎城对各党派、各阶级打破成见，组成人民阵线，抵抗侵略的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同时对于结成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更感迫切。这期间，他根据自己的观感，为《救国时报》撰写了一篇题为《西班牙人民阵线的阶段》的文章。针对国内蒋介石实行片面抗战路线，不肯开放人民抗日运动的态度，杨在文章中集中分析介绍了西班牙人民取得重大胜利的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人民阵线的巩固，“西班牙的人民政府是建立于广大民众的基础之上，这种基础就是人民战线。他们是不分阶层、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性别，都是争先恐后地团结在人民战线的旗帜之下，无论是共产党、社会党、共和党或无政

府主义者，他们都是手携手地在前线上把热血流在一起。”第二是民众的革命化，“成立后的人民政府能给民众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的自由，所以民众就能自由发挥其能力；又因为人民政府虽处于物质上极感困难的环境之下而能相当改善民众的生活，所以民众就更能拥护政府。”第三是政治工作的加紧，“时时激励民众，使民众能与军队合作，能同处危城而镇静如恒”，注意“提高军人的政治知识与文化水准，前线上的战士所以能万众一心，视死如归，这多半是要归功于政治训练。”第四是军队忠于人民政府，军民的密切合作和官兵的亲密无间。杨虎城后来在归国途中抵西贡时指出：“总而言之，我们的反日统一战线和西班牙的人民战线有某些不同，但反侵略的实质一样，所以西班牙的抗战经验是值得研究的。”

五、宣传持久的人民抗战思想

杨虎城刚刚出国，抗日战争就全面爆发了。这时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已经不是要不要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抗战并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

国民党统治集团此时仍然被“唯武器论”束缚着。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以中国武器不如日本为由，鼓吹中国“战必败”、“再战必亡”的亡国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英、美的干预与援助上，甚至幻想苏联参战，持速胜论的观点。而杨虎城虽然身在国外，却结合中国抗战的具体情况和多年的战争经验，进行了科学的思考，积极主张持久抗战。

1937年8月15日，杨虎城刚到巴黎，就在各界侨胞的欢迎会上

明确指出：“在战略方面，我们只希望中日战争能持久、延长。我们要忍耐、沉静。只有长期的抗战，胜利才是属于我们的。”这次讲话距“七七事变”仅一个多月，杨把“持久——必胜”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提出来，这是难能可贵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杨虎城在巴黎、马德里，在归国途中经过新加坡、西贡和香港的多次演讲中，不断深化、发展和宣传“持久——必胜”的战略思想。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抗战的基础是人民群众。杨虎城认为，“我国此次抗日，系全民战争”，“我们的自卫斗争的基础是广大中国群众”，因此只有“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

(二) 要坚决抗战到底。杨虎城

指出：“这次抗战，是中华民族生死关头，……万一政府动摇，全国人民势必要坚决抗战到底”，“只要还有一个人，这场斗争将继续下去”。

(三) 对日抗战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我们。杨虎城认为，“中国对日抗战乃一长期的艰苦的战争，中国人民以为非持久战不能达到民众解放的目的”；“如能持久到底，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四) 持久抗战的基础是人民的民主。杨虎城根据西班牙人民战线给人民以民主，因而唤起人民反法西斯热情的经验，提出了“非民主不能持久抗战”和“决定一切的是人民的意志”的重要论断，从而把持久抗战和实行民主二者正确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抗战 10 个月后，毛泽东发表

不朽之作《论持久战》，提出了持久抗战和人民战争的理论。杨虎城在欧美关于持久的人民抗战的论述与毛泽东这一理论不谋而合，这不仅表明杨对祖国和人民的赤胆忠心，也反映出他所具有的政治卓见。杨虎城在欧美的言行，再次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深入人心，说明在民族危难深重的关键时刻，一个真正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将领，必然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殊途同归。

在遍访欧美之后，杨虎城认为“目前国内抗战之全面展开，实不能再作海外逗留”。遂于 1937 年 10 月 28 日，毅然由法国马赛乘轮船回国参加抗战。谁知这位抗日英雄回国之后却身陷囹圄，以致在被蒋介石监禁 12 年后惨遭杀害。

(责任编辑 焕 然)

偏瘫及半身不遂患者的福音

“灯盏花素片”和“偏瘫复原丸”与“偏瘫治疗仪”，主治脑血栓疾病所致的瘫痪、半身不遂、面部神经麻痹、语言不清、手足拘挛、小便失禁等，疗效显著，每个疗程两盒 66 元。偏瘫复原丸 10 个 38 元，偏瘫治疗仪每台 95 元，直交两用每台 115 元。联系人：崇秋正

白癜风药显神灵 恢复美容治好病

“白癫灵”和“消白灵酊”药，是当前国内外根除各种类型白癜风最佳良药。每日抹 2 次，7 天见效，病期长的半年可以痊愈。白癫灵每瓶 28 元，消白灵酊每瓶 48 元。联系人：黄春灵

不孕症患者的福音——泰山牌种玉散

种玉散是采用名贵中药研制的新型药品，对男性死精子、精子缺少、精索曲张等所致不孕症；女性子宫内膜炎、输卵管炎及结核性输卵管不通无排卵性不孕症，均有效。服用三周即可怀孕。药费 118 元，有详细说明书。联系人：阎黄玉

骨质增生的克星——回春骨刺膏

“回春骨刺膏”是用祖传秘方研制的新药。对颈椎、胸椎、腰椎、膝关节、肘关节跟骨等部位的骨质增生，疗效显著，10 天为一疗程，药费 78 元，3 至 5 个疗程可痊愈。联系人：邱春生

根除结核之神药——消核膏

“消核膏”是治疗各种结核病的特效药，轻者一个月（一疗程），用药 1500 克，85 元。重者三个月可根除，不复发。联系人：黄秋核

以上产品请在医生指导下服用。常年供货，无效退款。免费邮寄。邮局汇款请寄：河北省石家庄市光明医药器械经销站（中山西路西里街 65 号）。电话：(0311) 3034140 邮编：050051

长沙大火及其引发的一场笔墨官司

● 辛 平

抗日战争初期的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长沙成了当时军政人员汇集之地。随着日军的进逼,蒋介石制定了“焦土抗战”政策。他给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去电:“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还亲临长沙具体部署。由于当局的这种指导思想,国民党军官惊恐万状,当日军尚远离长沙230多里时,即有军官指挥士兵于11月12日半夜放火,烧了三天三夜,全城百分之八、九十的房屋被烧毁,留在城内的人百分之二、三十被烧死或烧伤。此事,郭沫若在他写的《洪波曲》第十五章中作了记述,并对张治中有所指责。张治中认为某些事实与实际不符,给郭沫若写信并撰写回忆录,进行辩解。由此,两位名人之间引发了一场笔墨官司。

郭沫若与张治中的笔墨官司

郭沫若于1948年在香港写成《洪波曲》,1958年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再次发表这篇著作的第十五章是记述长沙大火的。张治中看到后非常生气,认为这是有意歪曲事实,进行个人攻击。他不愿缄默,要阐明事实真相,但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最初,他想把这个问题直接报告周恩来总理,但又想到这种做法是不是会使郭沫若认为这是“告御状”?他觉得,还是把影响缩小在最小的范围里为好。于是,张治中在1959年1月7日,给郭沫若写了第一封信:

沫若先生:

您已入党,在您是再度做了光荣的共产党员,我首先向您表示诚挚的祝贺。

最近,我在《人民文学》1958年12月号看到您写的《洪波曲》(小标题:抗日战争回忆录)。其中第十五章关于长沙大火的描述说:“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千人的大功德。他们想建立一次奇勋,摹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

“……他完全是贪图功名,按照预定计划行事。他把陈诚蒙着了,12日的当晚甚至扣留了陈诚的交通车。他把周公(指周恩来——编写者注)蒙着了,竟几

乎使周公葬身火窟。他满以为敌人在进军,这样他便可以一人居功而名标青史,结果是一将名未成而万骨枯!

“……您这种对我残酷无情的描述是与当时事实完全不符合的。不知您真是不知实情还是对我别有成见呢?”

张治中在信中追溯了1940年成立由郭沫若任主任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及后来撤销这个委员会的经过,并把撤销文化工作委员会的责任包揽下来。他在信中说:

您的《洪波曲》是1948年在香港写的,当时您对我余恨未消的心情我是能理解的,但在1958年再次在北京《人民文学》发表时是不是就应该有所不同了?现在您对我如果能够高抬贵手,笔下留情,不但对您无损,而且足以表示您的共产主义高贵品质和雅量,而在我则感激不尽了。

“至于您是不是应该在《人民文学》上作一更正,又如印单行本时是不是应该删改,这就听您的善意斟酌了。我是不敢提这个要求的。”

郭沫若收到张治中的信后,于1月19日写了复信。

文白先生:

您的长信(指1月7日的信)收到。《洪波曲》中有得罪处,很抱歉。请您注意那里面的一句话:“他们的计划是得到那位当局的批准的”,那就是说,主要应由蒋介石负责,而你们是执行命令罢了。谢谢您把当时蒋的指令告诉了我,证明我的猜测没有错。您不幸是在蒋下边和潘公展共事,我说:“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千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想建立一次奇勋……”并不是专指您一人。

“《洪波曲》准备出单行本,也将收入《沫若选集》,我想把您的长信作为附录,想来以可得到您的同意。请您赐复。”

“我是毫无芥蒂的,以往的历史并不是您我之间个人的问题。同样我也希望您原谅。”

1月14日,张治中再次复郭沫若信,在信中继续指出《洪波曲》中的失实之处,并着重指出:

第一、……您的猜测还是错了。为什么？因为，如果是我拟的计划而蒋加以批准，这就变成我主动而蒋被动了。而事实上是蒋主动而我被动，这显然有实质上的差别。因为我根本没办什么‘计划’由蒋‘批准’的，您那解释，逻辑上似乎是说不过去的。

第二、……当时潘公展到职才一个月，他在大火前一天就和各厅厅长、省府人员撤到沅陵去了，此事他根本不知道。

您的大作《洪波曲》将印单行本，并收入《沫若选集》，想把给您的长信作为附录，我当然同意。

您说，‘我是毫无芥蒂的，以往的历史并不是您我之间个人的问题。同样我也希望您原谅。’太好了，这是您的雅量，应对您表示崇高的敬意。”

不久，郭沫若再次复信：

文白先生：

我11日曾在上海一行，今晚回家。读到了您14日的复信，我非常高兴。承您同意把您的长信作为附录，并蒙您进一步指出我的一些错误，谨向您表示感谢。您的信实在是宝贵的史料。

专复顺致

敬礼

郭沫若

1959年1月18日

张治中和郭沫若经过书信往返，交换了意见，解开了心中的疙瘩。后来，郭沫若见到张治中，紧紧地握着张的手说：“真对不起，请恕罪！”两人终于达成了谅解。

不久，这件事被周恩来总理知道了。并请国家机关党务领导同志、中央统战工作领导同志先后告诉张治中：“郭这样写是不合适的，我们要他改正。不过你的信上措词也还厉害了些！”这两位领导还就郭沫若要将张治中的信作为附录发表谈了看法，认为以不作附录而在文章中直接改正为好。张治中对这样做非常满意，同时诚恳地接受了批评。

那么长沙大火真相究竟怎样？笔者最近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及回忆文章，了解了整个事件的始末。大体情况是：

蒋介石制定“焦土政策”

据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文中记载：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长沙成了当时军政人员汇集之所。11月上旬，国民党的机构大都撤离长沙，国民党的文武百官，带着老婆孩子，箱囊藉物，落荒而逃，远走川黔。长沙城中

一片混乱，谣言纷传，人心惶惶。正在这时，蒋介石匆忙从南京来到长沙。

当天晚上有一个大的会议。这次会议，自开始到结束，都是蒋一个人说话。蒋对交通界的人说：“这些火车和火车头退到西南，空车就把铁路占满了，那怎么办？”负责交通工作的还没有回答，蒋介石接着说：“还思索什么，都烧掉了就是啦，倒上煤油，所有的车就都烧掉完啦！”蒋又问：“敌人来了你们长沙怎么办？”张治中（湖南省主席）还没有回答，蒋即说：“还有什么可思索的，都用火烧掉了，我们不能住，也不能叫敌人来住。”蒋又说：“不论粮食器材，凡不能带走的东西都用水烧掉了，这是大家不可忘记的事。”这个会开了两个钟头，蒋介石不断地说怎么放火，怎么放火。会完了，大家在一起吃饭，楼下摆了很多桌。吃饭的时候，我对蒋介石说：“放火烧东西，是表示抗战的决心，”可要顾到反攻的时候把敌人打跑了，我们也没法子住。蒋说：“这也是很要紧的……”

据张治中之弟，当时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长沙分校教育科长兼教导团团长的张文心回忆：“当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对此曾提出异议，认为焚城阻敌，不是好的办法。因为这样做，对人民，对政府将带来极为惨重的损失，但以蒋介石的专横，不容他人有任何异议，只好奉命行事。”

张治中也在回忆录中写道：

“11月12日上午9时许，我正集合军管区兵役干部训练班学员点名训话，适接林主任蔚文（林蔚，字蔚文，当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副主任）电话，第一件事，即传谕说：‘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旋即接到蒋委员长文传参电，文曰：‘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传参。’”

以上诸人回忆材料说明，长沙大火确系蒋介石亲自策划与部署的。

日军未到，长沙已成一片火海

张治中在致郭沫若的第一封信中曾谈到自己当时的心情。他说：

“当时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不安。一年来的工作，使我对湖南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怎忍使长沙市人民的财产付之一炬？所以思潮起伏，矛盾苦闷，不执行是不行的，蒋当时是最高统帅，我是省主席，理应服从命令。同时，当时正是武汉撤退不久，外间正流传一种焦土抗战的宣传，许多人都认为武汉没有实行焦土

抗战，徒然资敌，议论纷纷。您当时主管宣传，对这种情形是必然知道的吧！所以我只好照办。”

张治中在回忆录中追忆了事件的经过：

“当时我即召集警备司令鄧悌，保安处长徐权，指示办法，并指定警备司令部负责筹备，由保安处协助。

“到下午四时，鄧悌、徐权回来，拿出一焚城准备纲要。鄧的意见，要长沙市社训副总队长王伟能当正指挥，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为副指挥。当时我以为王伟能是军训教官，恐不方便，所以改用警备队第二团团长徐昆为正指挥，王伟能、许权为副指挥，并且说：‘须在我军自汨罗撤退后，再命令开始行动。’但我和鄧、徐二人商定，下命令还不能，要等候到命令后，先放空袭警报，使人民逃避，等到再放紧急警报时，即开始行动。当时余并命明日须根据纲要，做好细则，送来核定。

“将近两点，我就寝。不久，刚入睡，副官王建成来叩门报告：‘城内很多响声，已经起火，’我立即披衣起来，看到三四处都在起火。这时电灯尚未熄灭，再过不久，约在三点钟后，火势更大，到处电话都打不通了。到四时许，鄧司令来报告，各处起火，电话已断，文局长（公安局局长文重孚）找不着。究竟放火者何人？看样子似为一大规模有组织的行动，外面人都传说火是由警察局开始烧起的。”

张文心在题为《长沙大火真相》一文中写道：

“十二日夜半，长沙城内有几处起火。时值秘书王某在省府院内散步（当时省政府尚有秘书、科长多人住在里面），看到外面起火，最初以为是一般火警，不甚注意。后来看到火头不止一处，乃入室转告同人。由于他们之间有人风闻长沙可能实行‘焦土政策’，但内情如何，不够了解。于是便打电话到鄧悌住所。接话副官说：‘司令已经睡了。’他们说：‘有要紧事情，一定要鄧司令接电话。’副官说：‘不管什么事情，明天再说。’便把电话挂了。”

当时任长沙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的沈印心，也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当晚我睡不久，警卫鄧瑞村走到床前喊我，并说市内起火，这时警钟响声零乱，我急忙爬起并摇电话，但已不通。派人走后门去找消防队，消防队人员和车子都没找着。我感到奇怪，于是上楼呼喊石参谋长，询问是否已下命令放火。石说：‘没有。’于是，我们一起登楼观望，这时城内已有几处起火，钟声更加紧迫零乱。我们赶忙下楼，叫司机开一吉普车，急驶到八角亭口，只见三个士兵，全副武装，有的手持十字镐，站在街心，有的则点汽油放火。我们问：‘谁要你们这样做？’他们

说：‘是团长的命令。’我们又问：‘哪个团长？’答：‘徐团长。’我指着石国基对他们说：‘这是司令部的参谋长，你们排长在哪里？’答：‘不晓得。’我们又到司令部门口，也是同样情景。我们从东牌楼、南正街到南门口，沿途均已放火，但没有碰到一个低级军官。我们站在南门口，发现天心阁附近也起火了，便回头进城。走到中华药局门口，只见两个士兵在敲打大门，几个士兵抬起汽油向大门泼去，我和石国基大声制止不住，只得由原路往回走。石国基决定坐吉普车去见张治中，我下车走向司令部。这时特务连几十人站在司令部门口，鱼塘街的火已烧到司令部后门。我要谭连长和陈排长带队伍到大西门河边等候待命。我一个人跑步走药王街、三太街到高井街司令公馆喊鄧悌，报告了起火情况，并问司令是不是下了放火命令。鄧说：‘没有。’他还说：‘怎么搞的？’‘拐了，拐了。’鄧说要去见张治中……”

据1938年11月21日重庆《新华日报》记载，为了制止有人再继续放火，张治中马上下了一道手令，令鄧悌、徐权严拿放火者，准予就地处决。并组织人力灭火。即使如此，大火还是烧了三天三夜，烧毁全城百分之八、九十的房屋，约计5.6万余栋。长沙原有四十二、三万人口，8万余住户，火前转移、疏散、逃离了十分之九以上，起火时，留在市内的约有3万余人。7处后方医院的轻重伤兵还有三、四千人，通讯机关后方办事处和其他准备最后退出的公务人员，至少有两千人，这些人在大火中幸免于难的有十之七、八。另据后来发放救济金的当事人回忆，当时约有9万人领取救济金。

长沙是被烧了，而日军在新墙河以北便停止了进攻。新墙距汨罗有35公里，而汨罗距长沙80公里，故前线距长沙远在115公里之外。当时长沙一直与前线保持着联系，汨罗守军一直回答没有发现敌踪，一切都很平静。所以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警备司令鄧悌只对焚城的工作作了布置，除此，未再下达过任何命令；火起时，亦均在睡梦之中。

蒋介石亲临现场追查责任

为什么在没有任何命令情况下，长沙守军便纷纷举火焚城，这与国民党内的恐日症是分不开的。日军在一年之内连下数城，特别是南京大屠杀的阴影一直笼罩在人们的心头。一方面是军警都怕城破陷敌，惶惶不安；另一方面是谣言四起，不辨真假。就在12日晚间，战线才发展到新墙河，市内竟有人将“新墙河”误传万新河，也有人说敌人浅水兵舰可能在几小时内开到长

沙，结果加重了恐怖的气氛。故此，一方起火，八方继之。

蒋介石在南岳接到长沙大火的报告后，于14日亲临长沙视察。当天夜晚，张治中向蒋介石汇报了长沙的情况，并呈递了《长沙火变——日记》的书面材料，坦然地承认了自己“思虑不周、监督不严、用人不当的过失，请求严予处分，以为失职者戒。”

张治中在回忆录中写道：“蒋当时并没有答复我的请求。他在长沙留驻几日，把事态查明，处理办法决定以后，行前，召集了当时留在长沙的几位同志，就本案作了一番恺切的训示。我记得他曾这样说：‘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是属于那一个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这种错误的造成，不能不认为是我们的失败。我们以后怎样使用干部，怎样训练干部，怎样沉着应变，从这一次事件上都可以得着明确的教训。’

‘现在处置的办法已决定，目前最要紧的事是赶紧善后，收拾人心。文白还应该继续负责，表现革命军人服从命令完成责任的精神。至于处分问题，当待中央核议’。”

张文心回忆说：“蒋在长沙的几天中，对纵火有关人员曾组织军事法庭会审。审判长钱大钧，审判员是蒋锄欧、张跃辰，军法官是阎景瑜、王柔远，旁听席还有俞飞鹏等。审判地点在蓉园何健公馆。湖南省会警备司令鄧悌、保安（应为警备——编写者注）团团张徐昆、长沙市警察局局长文重孚等三人，依照军法会审，均判处死刑。

“判处鄧悌他们三人的死刑有这样一个过程。原军法会审的判决并非死刑。据说最初是以‘纵火’的罪名判处徐昆15年徒刑，文重孚10年徒刑，鄧悌5年徒刑。审判长钱大钧亲自将判决草案送给蒋介石，待批执行。蒋认为烧城是预定计划，‘纵火罪’不适用，便将判决书置于案头，未加批示。第二天清晨，适有空袭警报，蒋至郊外躲警报，约张治中同去。张的随从副官王建成对张文心说，当时他和蒋介石的一个随员坐在驾驶室。汽车经过天心阁时，蒋介石看到天心阁和伤兵医院均被烧毁，面孔上现出了一股杀气。警报解除后，蒋介石回寓所，毫不犹豫地（好象在躲警报时心中已有了打算）拿起笔来，就在判决书上直批。在鄧悌的判决草案上批道：‘鄧悌身负长沙警备之责，疏忽怠惰，玩忽职守，殃及民众，着即枪毙。’在文重孚的判决草案上批道：‘文重孚身为警察局长，不奉命令，率警逃遁，着即枪毙。’在徐昆的判决草案上批道：‘徐昆玩忽职守，着即枪毙。’于是军事法庭又按蒋的批示重拟判决书，

并将‘纵火罪’改为‘辱职殃民罪’。”

三颗人头说明了什么问题

11月20日上午10时，鄧悌等3人被押赴侯家塘下山刑场，依法执行枪决。当时监刑之一为第九战区军法执行监的法官张某。张法官曾将当时的情况告诉了当时任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的蔡杞材。

据蔡杞材回忆，“张法官对我说：‘三个人临刑时的表态，以鄧悌最沉默。法庭宣布鄧等死刑时，询问鄧有何遗言，鄧终不开口，不作任何回答；绑赴刑场时，鄧也始终不吭气。唯有文重孚一到法庭，听到宣布其死刑，就破口大骂张治中，什么丑话都骂尽，绑赴刑场还沿途大骂张不停，直至枪决。’徐昆表情如何，则记不清了。”

据有关资料分析，鄧悌之所以终不开口，是因为他实在是没有什么可说的，放火烧长沙的任务是他布置的，放火的又是他的部下，尽管他从没有下过放火的命令，但他至少有约束部下不严、组织指挥不力，致成严重后果的重大过失。鄧悌为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1935年出任驻德使馆武官，回国后，任侍从室六组组长，为蒋介石的得意门生之一。曾有不少人向蒋介石求情，如胡宗南等。

张治中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道：“鄧悌原是不应死的！应死的或者是省会警备司令这一个职务，就是死于‘直接责任’这四个字。对于他的责任和处分问题，我曾经两次向蒋申述我的意见，求为减轻。但是我的请求没有能变更森严的裁定。大错铸成，力余（鄧悌的字）死矣！”

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沈印心，在长沙大火后于常德见到司令部参谋胡君望，胡对沈说：“鄧司令的确没有下放火命令，是徐权处长口头命令，徐昆预行演习。混蛋徐昆召集全团讲话，不晓得怎样下命令的。”故当时有“鄧悌是替徐权而死”的说法。说到底，鄧悌是为蒋介石去死的，因为“君让臣死，臣不能不死”。更何况，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平息民愤，也必须有人要扮演承担直接角色的角色，鄧悌无可推卸地扮演了这一角色。同时，蒋介石虽然牺牲了一个亲信，却也树立了自己的威信。

至于文重孚则是死有余辜。文重孚本没有参加火烧长沙的行动。按理说，不该轮到他去死。然而，文重孚和他领导的警察局负有长沙治安之责。但是12日中午，他便命令他的部下做好了撤离长沙的准备。张治中在给蒋介石的书面报告《长沙火变一日记》中如实记录

了当天所发生的一切情况，其中有关文重孚的就有4条：

“同日上午12日时许，陈司令长官辞修（编者注：即陈诚）来晤，说：长沙市警察岗位都没有了。我很诧异，当时亲自打电话问警察局长文重孚，他说：“只把不重要的地方撤去，重要地方还有岗位。”

“下午约7时，副官从外面来报告我说：‘街上无一岗位，有人看见警察已整队开出去。’当时我更诧异，乃又亲自打电话与文局长，质问他为什么将警察带走？又为什么将岗位撤去？他回答说：‘警察只集合在几个地方，并没有走。’岗位问题，他仍同上午回答的话一样。

“下午10点一刻，我应广播电台的邀请，为总理诞辰纪念作广播演讲，沿途看到无论重要不重要地方，皆无警察岗位。我到广播电台后，即令副官王建成打电话与文局长，限他两小时内恢复全体岗位，并叫他来与我一同上街去巡查。这电话是文局长亲自接的。

“将到12点时，我叫副官打电话请文局长来，预备一同上街巡查，但警察局电话已断，无人来接，且到处找不着。在这时又接到副官报告说：‘街上警察局，均从门上用竹板钉起’，即在我寓所后面的警察局，门亦封闭。”

在长沙处于非常时期，本应加强治安，结果负责治安者却跑得无影无踪，此一反常现象加速了流言的传播，致使市内一时谣言蜂起，更增添了几分恐怖的色彩。

彩。大火发生后，外面人都传说火是由警察局开始烧起的。文重孚虽然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行，但张治中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一，他发现文重孚的问题是在上午12时，本该抽出一点时间巡视一下，以便及时解决，但他未这样做，到晚10点一刻，亲自见到“无论重要不重要地方，皆无警察岗位”的严重状况，他仅让副官给文局长打了一个电话。等到夜12点，再让副官打电话时，“警察局电话已断”，以致铸成大错。作为省政府主席，尽管日理万机，何轻何重总该分得清楚。第二，既然已经发现文重孚的问题，正处在非常时期，可以及时撤换，重新部署，这也便是张治中事后可谓的“用人不当”之责。第三，火烧长沙的任务本应有警察局参加，加强治安管理，但张治中却将警察置之局外，使其忽视了肩负的重大责任。文重孚罪有应得，张治中也不能辞其咎。

徐昆是焚城指挥，在没有接到任何命令的情况下就放火焚城，当然是长沙大火事件的直接肇事者，杀之都不足以平民愤。

郭沫若在《洪波曲》第十五章说：“关于长沙大火的责任应该由蒋介石来负，连‘三个人头’（编者注：指枪毙的三个人）认真说都是冤枉了的。”

笔者认为从上述事实来看，“三个人头”，除鄧悌还可探讨外，其他两人是一点也不冤枉。

（责任编辑 林 耀）



历史的铁证—— 台湾制“康熙通宝”

● 张志煌



笔者有一枚古币，正面楷书“康熙通宝”，背铸满汉文“台”。该币为清圣祖玄烨在康熙年间（1662—1722年）由台湾府钱局铸的流通币。三百多年过去了，这枚钱币仍是金光灿灿，惹人喜爱（见拓片）。

1644年，清顺治帝登基，设两个中央直属钱局——工部宝源局和户部宝泉局造币。以后，随着清军的军事占领，新设钱局在全国各地陆续成立，铸造发行货币。到康熙年间共有22个钱局。各地方钱局造币的背文均为左满文右汉字钱局名，以示对钱币质量负责，亦和中央直属钱局区别。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无数出土文物已

证实这一点。唐宋时，福建沿海居民大批迁徙去台，促进了台湾与大陆的交流，南宋时台湾正式隶属福建晋江县管辖。明朝末年，农民纷纷起义，朝廷无暇顾及宝岛，荷兰人于1624年入侵。1662年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这块3.6万平方公里的岛屿重新回到中国。清康熙二十二年（1682年），郑成功的孙子归顺清王朝，次年，清政府设置台湾府。为了促进台湾经济发展，巩固中国东大门，清政府于康熙二十七年设立台湾钱局，铸制背面有满汉文“台”、“康熙通宝”字样的钱币，为市场流通币。

（责任编辑 赵友慈）

天下第一『血』

芷江修建抗战胜利受降城纪实

●杨顺东 姚奇

矗立在湖南芷江城东七里桥处的“受降纪念坊”，“血”字造型，显得格外雄伟庄严、威武不屈。这一造型，并非设计者随意而作。人类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要数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二战”中最残酷的要数中国战区。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实行“三光”政策，我中华民族奋起抗战，最终以2100万人的血打赢了这场残酷的战争。受降坊就是为纪念这一伟大胜利而建的，也是华夏大地唯一纪念抗战胜利的建筑物。故此，她在国人心中是一座亘古不倒的民族丰碑。许多当年参加过抗战的志士仁人来到这里，触景生情，追忆往昔，感慨不已；多少后辈子孙到此参观，激情满怀，自豪无比，立下振兴民族之志；即使异邦朋友游览圣地，亦是赞叹不已，钦佩之至。

震惊世界的壮举

全国有70多个大中城市，2000多个县，抗战胜利受降城缘何独建在湘西边陲的芷江？只因为……

芷江是通往西南诸省的孔道，素有“滇黔门户，全楚咽喉”之称。历代封建王朝，先后曾在此设置总督、巡抚、卫、镇等重要军事机构。抗战爆发，芷江境内驻军云集，各种军队及军事机构多达220个，大到国民政府的陆军总部、方面军司令部及军政部、军令部所属单位，小到高炮连队、防空哨卡。从兵种看，有陆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及宪兵等多个兵种。既有中国的军

队，也有盟国苏联、美国、英国的空军，美空军最多时达6000多人。战云密布，举目兵营。尤其是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征调湘西11个县10万民工修建起来的占地4000多亩的远东第二大盟军机场，更是神秘莫测。进驻机场的各种战斗机、轰炸机、侦察机、运输机多达300—400架，几乎每5分钟起降1架，有时甚至象一排排流弹出膛，随着指挥官的挥手，几十、上百架战机同时射向天穹，担负着对日本本土及沦陷区的华北、华中日军驻地的战略轰炸，切断日军后勤补给，封锁长江、湘江和京广铁路运输线，阻止日军进攻西南等重要任务。随着抗战的进程，芷江地理位置不断升格，终成为中日最后大决战的焦点。

1945年4月15日，日军集中了16万精锐兵力，发动了“芷江攻略战”，旨在夺取芷江，直逼重庆。蒋介石深知芷江之份量，不敢有丝毫造次，调集了8个军20余万人迎敌，“誓与芷江共存亡”。为确保此战胜利，何应钦亲自坐镇指挥。并把正在云南集结休整的远征军3万人全部空运到芷江。在地下游击队、农民自卫队、共产党领导的部分武装和中美空军的通力配合下，大决战历时2月之久，日军尚未打过雪峰山（芷江东面的一道天然屏障），就全军覆没，成为侵华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此后，日军再也无力发动新的进攻。

1945年8月14日，从芷江机场起飞的中国飞行员沈昌德前往宝庆（当时的日军据点），进行了一次战地侦察。第二天8月15日，便传来了日本投降的大好消息。8月21日，侵华日军的投降使者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等从南京乘飞机降落于芷江机场，并在机场东缘的七里桥处，中日双方举行了震惊



1945年8月21日，日本降使今井武夫一行，步入芷江受降会场

世界的“受降会谈”。在此，日方交出了在华兵力部署图，接受了我有关战区日军投降详细规定的备忘录，宣告了侵华日军的最后失败。

谁曾料到，这一座偏僻山区的小城竟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如此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因争夺芷江基地而展开的湘西会战，是中国陆军和侵华日军地面部队在抗战中的最后决战；而沈昌德驾机从芷江起飞出击宝庆，又结束了八年抗战期间中国空军对日空战的胜利历史；更为巧妙的是，日军三个月前想要夷平芷江基地，而三个月后，却又来芷江投降，使芷江一举成为闻名世界的受降城。

流产的大纪念

南京政府拟在芷江修建一座受降城，并拟将芷江周边的31个县市建一个和平省，省会定在芷江。可惜……

中华民族是一个苦难的民族。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蒙受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奇耻大辱，一次次向侵略者屈膝投降、割地赔款。只有这一次，残酷而伟大的抗日战争，我们是胜利者，敌人向我们屈膝投降。为纪念芷江受降这一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国民党政府拟在芷江修建一座受降城，并准备将芷江周边贵州、四川、湖南、湖北四省划出龙山、永顺、沅陵、凤凰、麻阳、怀化、溆浦、黔阳、泸溪、会同、乾城、永绥、保靖、古文、城步、镇远、松桃、铜仁、江口、岑巩、玉屏、清溪、天柱、锦屏、黎平、秀山等31个县市，新建一个和平省，省会定在芷江，省府已派员实地勘察，并作了详细规划。蒋介石、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孙科、居正等国民党要员，也为修建受降城送来了亲笔题词题联，并以“克敌受降”、“受降行大典”、“名城首受降”，来体现这次芷江受降。

留在芷江县政府的那份《芷江受降城设计方案》，一直完整地保存在芷江档案馆，虽然经过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纸色发黄，但字迹仍清晰如昨。这份受降城设计方案，把受降城建设分为城市建设与公共事业建设两部分，规模宏大，内容较为完整详细。具体规划是：在中日双方举行受降会谈的地点，修建5400方丈的受降公园，公园内修建受降纪念馆、抗战纪念馆、抗战胜利纪念坊以及修建一所抗战军人遗孤学校。同时，在计划修建并已勘测了湘黔铁道火车站的对面，建一座高大宏伟的空军殉难英雄像。将城区进行扩建，使之达到70平方公里，在城区中，划出商业区、工业区和居民区，并将全城的城市居民增加10万到15万人。经过认真预算，以上城市建设和公共事业建设，共需经费286亿零200万元。

从形式到内容，当时国民党政府准备在这个受降名城来个轰轰烈烈的大纪念，然而，时因蒋介石忙于内战，军费浩大，南京政府仅仅下拨285万元（法币），加上层层克扣，真正到县政府手里，还不到应拨的千分之一。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于是轰轰烈烈的受降“大纪念”流产了。

受降坊的矗立

县长杨化育挥泪扒城墙，修建受降坊，人们称之为“天下第一‘血’”，给后人……

1946年10月，时任芷江县长的杨化育满腹高兴，特请了高质量施工队伍，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单等南京政府拨款到位。不想乐极生悲。就在他极度兴奋之时，收到了南京政府拨来的“专款”。顿时，他

呆若木鸡，整个眼圈都湿了。他自言自语地说：“这点钱，莫说建园建城，就连建一个凯旋门也还差一半！”他当即召集县府官员开会，噙着眼泪说：“新建和平省的希望没了，修建受降城也不现实了，但我们应该明白：一个在八年苦战中争取最后胜利的受降城市，如果不搞些永久性的纪念建设，是我们的失职，我们将愧对抗战中长眠九泉之下的2100万同胞，愧对我们的子孙后代。我提议，扒城墙砖也要建一座受降纪念坊，不知大家意下如何？”与会官员均赞同杨化育的提议。一周后，杨化育亲自指挥民工扒了城东门的城墙砖，在城东七里桥的日本投降会谈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受降纪念坊。因它象征着中国2100万牺牲者的血，故人们称之为“天下第一‘血’。”说也怪，牌坊建成之后，根基终年渗出股水，找不出什么原因。后来据讲解员介绍：这是抗日牺牲者的血，她告诫所有热爱和平的人，不要忘记那段悲惨的历史。

当年杨化育修建的受降坊，高8.5米，宽10.6米，厚1.2米，间洞高3.5米，青砖砌成，嵌有紫色大理石。整体造型呈“血”字。纪念坊的四柱和拱门上，均刻有国民党要员的题词。

背面中门上端还镌刻有记述侵华日军投降之历史背景的铭文：

我国崛起东亚，巍然五千年矣！立国精神，原在大同。睦邻柔远，扶弱继绝，斯为帜志。清季甲午以还，东邻日本，肆其贪野心，强摘我台湾、琉球，而东北数省亦覆。假变姓见告：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肇衅，我最高统帅国府主席蒋公曾宣示：“和平未到绝望，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忍让为国，于兹可覩，然敌未悔祸，倭逞其兵，以三月即

可亡我。我为所迫，遂起全面抗战，顾敌修志欲争霸环球，微仅在我一国已也，既美英苏各友邦与我同盟。德意瓦解，敌又以湘西之战失利，本土为美弹所震，乃袒服请降。

时中华民国三十四年

杨化育的挥泪义举，终给后人留下了一座丰碑。谁能料到，这座民族丰碑在“文革”时，被一群戴红袖标的“造反派”当作“反动毒垒”炸为平地。

炎黄子孙的夙愿

时隔半个世纪，芷江人民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修建受降城，引起了国内外的震动，于是……

1982年8月15日，日本举国上下大规模祭祀在华阵亡将士，并修建了一座阵亡将士纪念碑。邓小平获悉后，立即向有关部门指示：日本修建侵略之碑，我们要修反侵略之碑。

1983年5月，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在芷江原址复修这座民族丰碑，是年11月破土动工，1985年8月落成。同年9月3日，举行了隆重的复修落成大典。参加过与日最后大决战的原国民党十一师师长杨伯涛（现全国政协委员），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大典，并热情致词。

从纪念坊往前步行约50米的受降堂，亦是按原貌复修的。里面仍然按受降会谈时的格局布置，正面墙上挂着孙中山先生的画像，画像前陈列着当年用过的桌、椅等原物，并标出各代表所坐的位置。会场左侧，还设置了芷江受降会谈史料陈列室。室内陈列着各种电文、备忘录、照片和报刊的文章，真实地记录了当年受降会谈的全过程。

为再现历史，昭示后人，促进祖国统一，1992年11月，芷江县委、县政府决定：在芷江七里桥修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馆暨受降园，并分步扩建为受降城。这一决定，很快得到中央、省、地等各级政府和部门的支持，并做出具体部署。



1945年8月23日，日本降使今井武夫在一号备忘录上签字

1993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许多代表和委员联名提出议案,要求重视芷江受降城的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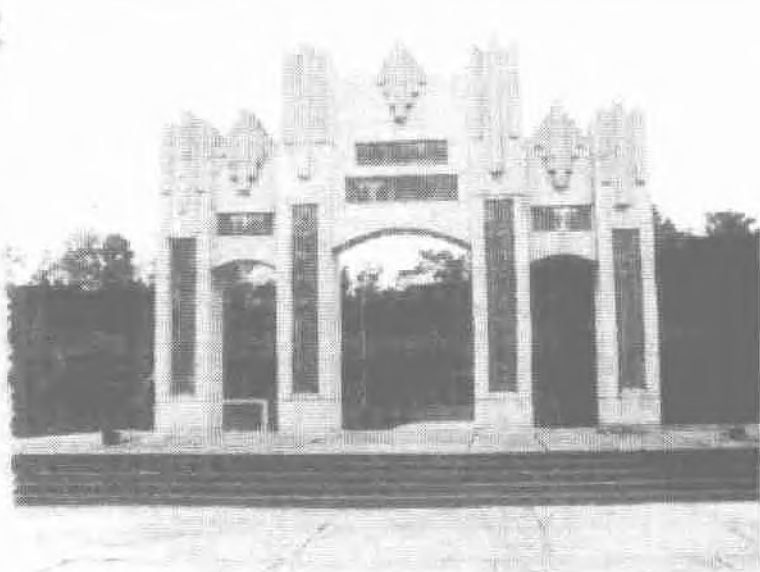
1993年7月19日,湖南省委、省政府正式下文批复:“同意修建芷江受降城”,并由省财政补助经费40万元。8月14日,全国政协办公厅也正式复函芷江,称“这是一件有利教育国人和后代勿忘历史,奋发图强,高扬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旗帜的大事,意义十分深远。”怀化地委,行署表示要进一步加强领导,以确保受降城首期工程在抗战胜利50周年纪念日前完工。

8月21日,就在日军投降代表来芷江的这一天,芷江隆重举行了庆祝抗战胜利48周年暨修建受降城奠基典礼。中央、省、地的各级政府部门和领导及海内外知名人士,送来了题词、贺电、贺信。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李沛瑶,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书法家赵朴初等也分别题词、题字。

这次受降城的修建,参考了1946年制定的《芷江受降城设计草案》,同时,在芷江现有的城区基础上进行扩建和改建。新制定的受降城修建方案主要有三大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中国对日军的受降纪念部分。主体为受降园,受降园内设受降纪念区,抗日战争战役展示区,花卉碑林区,抗战文物陈列馆,中美空军在芷江活动陈列室以及抗战胜利纪念碑等。

第二部分:是具有纪念性的建筑部分。主要有围绕芷江城修建三座受降牌楼,两座象征胜利的“V”型雕塑,修建大型侗乡风雨桥,并在桥的两头,再现当年“和平永奠”的场面,还部分恢复当年芷江城的城墙和城门,铸“庆五千年未有之胜利,开亿万世永久之和平”等当



天下第一“血”,抗战胜利受降纪念坊

年对日受降时使用的标语。

第三部分:是游乐部分。主要建造部分陆地游乐设施,对芷江现有的妈祖庙、文庙、奎文阁等古建筑,进一步维修,并修建水上乐园、明山森林公园等娱乐场所。

修建受降城,是每个炎黄子孙的夙愿。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芷江人民修建受降城,此举在国内外引起强烈震动:广州空军部队捐赠苏式比斯战斗机一架;湖南省军区捐赠抗战时多国部队军用武器43件;居住在美国参加过芷江受降的原湖南省主席王东原,欣闻芷江修建受降城,夜不能寐,当即捐来200美元;现居美国的原修芷江机场的中国航空委员会总工程师黄彰任、林泽林,现居台湾的原行政院民政司司长刘修如,以及台湾谢质高、张枝鲜等要员,热情来信盛赞此举是“振兴大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夏公权大使和一批有声望的抗战将领,拟明年来芷江参加五十大庆;华府国际合作会主席,“二战”时“飞虎将军”陈纳德遗孀陈香梅

女士,先后8次来函芷江,玉成此事,1994年5月19日,她不顾七旬高龄,飞越太平洋,从美国专程来芷江,乐意担任修建受降城顾问,并带头捐款20万元;老八路后代杨勋教授,从报上得知消息后,立即捐出个人积蓄1000元;病危中的原国民党抗战将领杨伯涛得知此消息,老泪滚滚,给芷江写信说:“……我衷心拥护,我的月薪及补贴总共400多元,愿节衣缩食,捐款1000元”;芷江荷花池小学一名11岁的小学生,听说要修建受降城,立即把自己60元压岁钱全部捐出……

顺民心者事成。芷江受降城建设进展顺利,至1994年8月底止,已筹资260多万元;省政府批准受降城征地75.89亩,已征46亩,搬迁村民22户;首期工程正在紧张施工。

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受降城将以一个伟大的历史巨人,屹立在中国的芷江,向全世界所有热爱和平的人们招手致意!

(责任编辑 凌辰)

薪金 250 元。周恩来自己也献了 240 元，这是他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一个月的工资。担任国民参政员的另 6 名中共领导人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也都献出当月薪金 250 元。

献金运动，得到各党派、各阶层同声一致响应。中共中央委员会，委托驻武汉代表团，从 6 月份党费支出 1000 元献上。根据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参谋长叶剑英的指示，中共长江局秘书长李克农代为献金 1000 元，这是八路军在“七·七”抗战周年纪念日素食省下来的菜金。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副部长黄琪翔，以政治部全体名义献金 1000 元。武汉市警察局捐献了大刀、跑鞋、收发报机、望远镜，供前线将士打击日寇。粤汉铁路抗敌后援会，献



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积极组织社会力量，参与发动献金救国运动。图为武汉儿童在宣传献金救国

金 16000 元。复兴、裕华、申新、大成 4 家纱厂捐献 10 万元。汉口各店主为所有店员献出了一个月的工资。全市各房东提出一个月的房租，送往献金台。武汉三镇 10 余个剧团的 2000 余名演职员，举行“慰问出征军人家属、受伤官兵献金公演”，并捐出当日全部薪金，世界、光明、明星三大戏院，把 6 日、8 日的演出收入悉数捐献。

各献金台前，男女老幼、工农学商争相登台献金，脸上带着自豪的神色。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的陈诚，深有感慨地对记者说：“贫苦老百姓献金最踊跃。”

事实正是这样。参加献金的人中，百分之八十是平民，且涌现了许多感动人心、催人泪下的情景。

一位叫傅部周的从北平流亡来的老人，平时靠贩卖长生堂的无极丹维持生计，一连三次登上献金台，献出了一天所得 1 角 9 分。4 位年逾古稀的老太太，拄着拐杖结伴而来，各将 2 角钱递给服务员，说这是她们今天节约下来的生活费。流亡女青年席德兰，献上钱 2 元、毛巾 2 条、牙刷 2 把、肥皂 1 块、青布一束，慰劳袋、慰问信各一，噙着眼泪说：“切盼前线将士勇敢杀敌，赶走日本鬼子，让我早一日回到家乡。”以卖唱为生的瞎子艺人张少卿，听到城内献金的新闻后，抱着三弦琴，由小徒弟领着，步行 40 里，献出了路上卖唱所得的 5 元钱。难民王邦贵，登台哭诉了一家 10 口 9 人惨死在日寇刀下的血泪深仇，并捐献银币 2 枚，说：“两个小钱派不了什么用场，只能表一份爱国心意。”有

一个小男孩把一大包金属币送上献金台，纸包上歪歪扭扭地写着：愿这国币 5 元，制成子弹 50，颗颗打中日本鬼子的狠毒心肝。

8 日午时，电闪雷鸣，下起了倾盆大雨，通往献金台的路上，依然人流不绝，真可谓风雨难阻献金热诚。时武汉会战已拉开战幕，敌机不断侵袭，防空警报频频，这更增强了民众对日寇的仇恨，一俟警报解除，人们钻出防空洞，加快脚步奔向献金台。

侨居世界各地的华人，通过电台广播、报章得悉武汉“七·七”献金运动消息后，纷纷寄来捐款。日本反战女作家池田幸子，去江汉关献金台，献金 200 元。一位头缠白布的印度朋友，挤上献金台，恭恭敬敬献上 1 元钱。在法国巡捕房服务的几名苏俄职员，联合捐献 30 元。朝鲜战时青年服务团，也作了慷慨捐助。

献金运动原定 3 天，应各界要求，延长 2 日，至 7 月 11 日，武汉“七·七”献金运动圆满结束，共得捐款 100 万元以上，献金人数逾 50 万。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且体现了中国人民热爱祖国、反抗侵略的伟大力量！

（责任编辑 丁 来）

以戏攻心

● 宫洁民

在“司令赛牛毛”的抗战初期，河北省雄县米家务有个联庄会，对外简称“北联庄”，在大清河北来说，是当地闻名的地主武装。

1938年8月中旬，我冀中四军分区“国防剧社”奉命到米家务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戏攻心，使这个联庄会顺利接受我军改编。

这项特殊任务是冀中四军分区政委王平亲自向剧社社长高德润下达的。王平政委概括地分析当时的形势说：“人民自卫军虽然处于发展的黄金年代，但也出现了不少杂牌部队，有的甚至混进了土匪武装。根据北方局和聂荣臻同志的指示，为了扭转混乱局面，当前主要任务是改编杂色武装，改编方式以政治争取为主。这次派剧社到米家务，主要是向联庄会宣传统一战线，为争取改编这支地主武装创造条件。”

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李特向全体演员介绍了“北联庄”的政治情况。这个联庄会从1937年“七·七”事变后就开始建立，庄员都是雄县北部昝岗、米家务一带的富户。总指挥叫张润川，曾经是张学良的老部下。张润川为人耿直、豪爽，民族意识较浓，在河北雄县是个很有名气的人物。据说，他和张学良私交甚厚，他不满蒋介石的黑暗统治，看不惯国民党内部的尔虞我诈，于是在“西安事变”前夕就解甲归田了。抗战开始，他对共产党、八路军能不能打败日本，抱观望态度；对日寇侵华，又恨又怕。他组织起联庄会，打出的旗号是：保家护院，谁来打谁。但又派出100多名庄员到天津受日本军训。这个联庄最富，枪支最多，有些土匪武装，都看中了这块肥肉，想把这个联庄掠过去。第一个打主意的是任丘县土匪头子高顺成。他仗仗人多势重，1938年春的一个拂晓，带着他的老婆“白双枪”（绰号）和大队人马，向米家务发起突然袭击，可是，“北联庄”防守甚严，结果高顺成的队伍被打了个稀里哗啦。没过多久，博野的民军司令张荫梧又耀武扬威地派兵攻打，同样是大败而归。从此，庄员们更是气大腰粗，说什么

“铁打的北联庄，攻不下的米家务。”

高德润社长心里明白：这任务是艰巨的。尽管分区首长为防止不测，特派大队长刘亦珂带三十大队事先隐蔽在青纱帐里作掩护，但要达到不发一枪一弹就把这支武装改编的目的，还要靠剧社的努力。经过思想动员，剧社连夜赶排了活报剧《枪毙高顺成》。选了一个好天，大伙背上幕布、道具和汽灯，唱着社歌“戏剧是我们的刀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用戏剧唤醒群众，用舞台开展救亡”，出发了。

经过70多里的长途行军，当天下午4点多钟，赶到米家务西北角一个场院上。遵照军区首长指示，为了不惊动老乡，就地露营。

米家务这个地方，因为打了两次仗，所以不光是联庄会，就是老乡也十分警惕。这次，忽然来了这么多人，而且穿着军装，有男有女，还有小孩，在那里又拉又唱，引起了全村人的注目。不一会，一个庄稼人打扮的半大老头，挑着水桶走来问话。他一听说是剧社，就高兴地问：“是演文明戏吗？能不能在我们村里唱一台？”“可以。我们到那里都可以唱。”“你们唱一台戏要多少钱？”“我们不要钱。”一听说不要钱，那人点点头，挑起空水桶，头也不回急急忙忙地回村去了。

大伙正谈笑着，又过来一个背粪筐的老头，照样又问了一遍。最后他问高社长：“这么多人，你们吃饭怎么办？”“我们在哪里唱戏，哪里管饭，还要管搭戏台。”高社长这么一说，背粪筐的老头愣了神，眼珠一转，又问：“请问，你们究竟是哪一部分，司令是谁？”“我们是八路军，是冀中军区指挥下的四军分区，司令员是孟庆山……”“啊！孟庆山……”一听说孟庆山的队伍，那老头放心了，他说：“等我回去商量商量。”说完，背着粪筐回了村。

在太阳偏西的时候，联庄会派人在大场西北角搭好戏台；随后，又派人给剧社送饭。

米家务是个七、八百户的大村。联庄会光带枪的会

员就有5000多人,加上左右村镇的男男女女,演出那天晚上,看戏的聚集了1万多人。演出的剧目,有话剧《高粱》和《保卫宛平》,活报剧《枪毙高顺成》,加上唱歌、舞蹈和大鼓书,整整演了3个多小时。

节目开始,会场秩序还不太好,唱到《松花江上》,台下就鸦雀无声了。话剧《高粱》中的老夫妻俩,由殷平、杨威主演。由于杨威(电影《五更寒》中饰政委)演技高超,观众一直没有看出他是男扮女装。在《保卫宛平》中扮演连长的程革,扮相威武英俊,气质感人。他出场后短短几句台词儿,就把芦沟桥“七·七”抗战的气势激昂慷慨地表现出来。《汉奸的报应》由殷平演唱。他发挥了民间艺人的专长,嗓音亮,韵味浓,演得幽默风趣,观众一再要求返场。尤其是活报剧《枪毙高顺成》,剧情曲折,矛盾冲突激烈。高顺成拦路抢劫、强奸民女、坑害百姓、破坏统一战线的罪行,一桩桩一件件被揭露出来。还没演到高潮,就激起庄员们思想上的强烈共鸣,一个个磨拳擦掌,齐声怒吼:“土匪头子不要脸!”“枪毙高顺成!”

演出闭幕后,观众把舞台围了个风雨不透,要求第二天继续演出。庄员们更是激动,老乡们都搬着凳子回家了,他们还坐在原地不动,开始是交头接耳,后来是大声议论,中心是讨论统一战线问题:联庄这杆大旗究竟能打多久?长此下去,能不能站得住脚?将来归谁指挥?弄不好会不会让土匪武装给吃掉?联庄总指挥张润川派人到后台询问,第二天是不是还演?高社长答复说,可以再演。

第二天演出前,联庄会带枪的庄员整队入场。他们要求剧社教唱歌曲,一些演员马上站到队伍里分头教唱。东边唱起:“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西边唱:“炮火连天响,战号频吹,决战在今朝……”嘹亮的歌声,振奋人心。老乡们也情不自禁地学唱起来。

这天的演出又加进了一些新的剧目。开锣戏是哑剧《蚕食》,压轴话剧是《最后一计》。这后一出是表现八路军民族气节的话剧。高德润社长扮演八路军参谋长。正在化妆时,一个持枪的传令兵到后台说,联庄总指挥要见见团长。说着,一个细高条、留着小黑胡子的人进来,自称联庄总指挥张润川。他彬彬有礼地问:“哪位是团长?”高德润说:“我就是。”这时,张润川掏出一张名片,鞠了个九十度的大躬说:“社长大人,我有个请求,能不能在开幕之前,允许我说几句话。”“张总指挥讲话,完全可以。”这时,张润川从口袋掏出讲

稿,递给高社长:“请团长审查一下。”“用不着审查。”高社长爽快地说:“咱们都是中国人,只要一心一意打鬼子,你放心讲好了!”一看高社长的态度,张润川喜形于色,连声道谢,健步走上台去,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今天我要向诸位说几句话。谁都清楚,咱们成立联庄会是为了保家护院。可是昨天看了国防剧团一台戏,对我本人教育很大,我们想的是保家护院,喊的是谁来打谁,可实际上我们已派人去天津受日本军训,这样一来,不就成了汉奸?这个罪全在我身上,我张润川错了。众位想想,假如没有抗战,中国就要亡国,我们都要作亡国奴,怎么能保住家乡!所以,今后应该象戏里说的那个道理一样,全国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一块打日本,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力出力……”说到这里,张润川提高嗓门,激昂慷慨地说:“众位乡亲都知道,过去我在东北军跟随张学良将军的年月,深感两军相杀给黎民百姓造成的苦难。我们都是黄帝子孙,古语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今后,我若有三心二意,死在千军万马营!”接着,张润川又领着呼口号。他一喊,全场呼应,掌声经久不息。高社长接着讲话,充分肯定张润川的表态,又根据明以利害、晓以大义的原则,阐述了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话虽简单,但句句说到庄员们的心坎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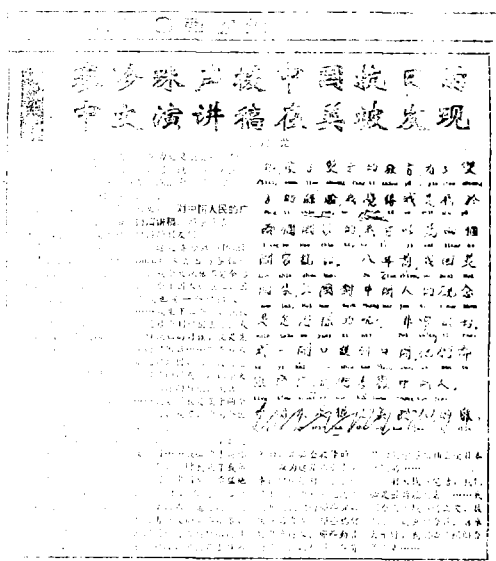
第二天演出后,张润川派人连夜去天津叫回受日本军训的庄员,同时派代表与国防剧社接洽,要求一见孟庆山司令员。高社长客气地答复代表:“见见可以。烦托你转达给张总指挥,因为这一带的老乡对八路军没有认识,我们生怕惊动老乡,所以武装部队没有进驻。张总指挥要见,我派人联系,明天可以来。”当天晚上,高社长派人找到三十大队,告诉刘玉珂大队长,说部队可以进村了。次日上午,刘玉珂率领大队开进米家务,并随高社长去张润川家拜访。张润川在正房会客厅招待。他坦率地说:“看了贵团两台戏,使我顿开茅塞。我行伍出身,不懂艺术,实在钦佩!”还当即表示,愿意接受八路军改编。他忏悔地说:“过去自认为是保护家乡,实际上是走了一条错路,险些走到民族敌人方面去。我张润川糊涂了。”高社长一再鼓励他,说:“抗日不分先后,张总指挥愿意接受改编就欢迎!”

后经刘玉珂大队长请示分区首长,安排了司令员孟庆山与张润川的会面。从此“北联庄”纳入四军分区建制,编进新成立的三支队,再后又编入了贺龙将军领导的一二〇师。

(责任编辑 王 恂)

藏匿在赛珍珠名著中的间谍秘密

● 马牧英



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文学名著《大地》问世后，震动整个国际文坛，深受赞誉。然而，日军间谍却盗用这部珍贵著作的词句变为密码，策划着一樁诡密的侵略阴谋……

赛珍珠出生于美国，可她刚出生3个月就随父母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她在中国生活了23年，对淮阴有着特别的“故乡”之情。赛珍珠的父亲辛德士迈克，1887年到淮阴，是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的传教士之一。他们以淮阴这座古城作为传教的中心，在清江老坝口鸡笼巷开设西医义诊门诊部及教会的慈善机构，为地方穷苦的病患者治病。赛珍珠天资聪慧，幼时深受父亲教益，学会一口流利的华语，并能熟练地书写汉文，稍大即转送上海教会学校读书。17岁返美，在西弗吉尼亚大学攻读，毕业后遂即来到中国。在清江浦，她目睹四郊农村的情况，并以中国农村为社会背景，采访搜集大量题材，於南京写出名作《大地》，这部作品在1932年获“普立兹奖”，1958年又获诺贝尔文学奖。

赛珍珠是伟大的和平战士。她极端愤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在美国她积极发表演说，表达自己对中国的爱，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憎恨……“我觉得我是属于两个国家的，我可以为两个国家说话。八年前，我回美国来，美国对中国人的观念是怎么样的呢？非常的好，我一开口就说到中国，他们都点头说：我们喜欢中国人……”“……日本进攻中国，美国人觉得与久宿野心的日本相对敌，中国是支持不久的，是必会投降的。

但我以为是不会有事，中国不会屈服于日本。因为我不能想象到我们认识到的那些健壮实在的农民，那些稳健的中产商人，那些勤苦的劳工，以及那些奋勇热心的学界领袖会向日本降服的……”（演讲汉语文稿，于1993年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威士林学院图书馆被发现）。1942年，宋美龄为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她飞赴美国，在各大城市发表演讲，呼吁人们从多方面给中国以支持。这时，年近50岁的赛珍珠，视中国为第二祖国，不仅自己主动慷慨解囊，动员至亲好友募捐，还积极配合，用英、汉语在美国各地城市发表演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她对日寇侵华暴行的切齿愤恨，对中美人民长期友好的热切期望，溢于言表。

赛珍珠的《大地》问世后，曾被牵连进一起重大的间谍案件，这是她始料不及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后，重庆便每天遭受日机多架次的轮番狂轰滥炸，损失极为惨重。可令人费解的是密布在重庆四周的高射炮部队，迎敌的炮声到处轰响，敌人的飞机却没有被击落过。无线电监听侦收的电讯密码越来越频繁，这无疑是在进行间谍活动。这样，破译潜伏重庆敌台的电讯密码，就刻不容缓。有关方面通过驻美使馆的秘密联系，聘请闻名世界的破译巨匠、美国密码之父赫伯特·C·亚德利来华，传授无线电通讯破译技术，年薪1万美元。亚德利经过艰苦努力，终于查出日、汪间谍“独臂大盗”，发现线索后，亚德利穷追不舍，反复研译，终于发现“独臂大盗”使用的密码是“无限不重复式”，即使用过的密码决不再用。并得出结论，这种密码是书籍密码，底本是一部英文长篇小说。它的前100页中有连续三页的第一个词，分别是：ney·light·gynin（或groin）。为了迅速找到这本英文长篇小说，亚德利请他结识的中国女友（也是“独臂大盗”的女友）徐贞小姐

相助。徐贞出于爱国热忱，不避险恶，决然应允。二人设计至“独臂大盗”家中拜访，经过一番艰险的周折，终于由徐贞从“独臂大盗”的书房中弄清其使用的书籍密码的底本，是美国著名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的长篇小说《大地》。该书的第17、18、19页上的第一个词，果然是亚德利分析推导的那个词。亚德利回去后，当即设法找来一本《大地》，连夜组织人员，终于破译了“独臂大盗”的密电，所有日谍潜伏活动均被掌握，参加这个超级间谍网的成员也全部落网。原来，“独臂大盗”是川军高射炮部队的一名军官，此人虽出身土匪，但会说流利的英语。他用尽方法，勾结蒋介石的德国籍顾问赫尔·韦纳，组成了一个间谍网，便将高射炮部队最高射程1.2万英尺用密码告知日本特务机关。因此，日机进入重庆上空后，在1.2万英尺以上飞行，独来独往，狂轰滥炸，给重庆带来巨大灾难，重庆高射炮火力却对之无可奈何。重庆虽然抄收“独臂大盗”发出大量神秘密码，但由于无法破译，故始终无法采取技术手段和有效对策。

破译这样微妙的无线电通讯密码，在国际特工史上实属罕见。“独臂大盗”的落网，使日、汪十分震惊、愤怒。亚德利在这项破译工作上，取得如此辉煌的成果，受到蒋介石亲自召见和嘉勉。徐贞因协助亚德利侦查书籍密码底本，被日、汪间谍和密探盯梢，伺机对她进行致命的报复。徐贞百般无奈，于是决定奔赴香港，在去机场途中渡江时，终被蓄意制造的舢板翻沉事故淹死在嘉陵江滔滔的大浪中。1940年7月，亚德利回到美国，美国为了保密，没有透露讯息。至1942年，亚德利在他的回忆录中才公布此事的情节经过。

（责任编辑 孙 申）

本 社 启 事

近来陆续收到几位读者来信，反映在当地邮局订不到《炎黄春秋》。特敬告各地读者，如在当地邮局订阅有困难，可直接向本社发行部邮购，每月一期，单价3.20元，全年38.40元，免收邮费。另本刊1993年合订本已全部售完，请勿再汇款来。1994年合订本尚有存书，每套44元，免费挂号邮寄，欲购从速。本社地址：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邮编：100802 电话：6076801 联系人：杜习。

冤案十载民告官 天人相助得平反

河北三河县白庄村农民上访案纪实

● 曾业松

提要：这是发生在京东三河县一桩人命关天的上访案。白庄村农民因抵制乡政府违法占地，受到地、县个别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压制，造成一人死亡，五人被捕，三人坐监。农民群众不畏权势，下跪天安门，上访中南海，喊冤不止。京城律师、记者侠胆义肠，冲破重重障碍，四处奔走为民请命。最高人民法院、中办、国办信访局等八大部门齐心协力，排除层层干扰，责成省、地纠正错案。持续十年的冤案终于得到昭雪。

本案情节曲折，催人泪下。本文作者以其亲历亲闻实录了这桩涉及面较大的复杂案件。相信它会伸张正义，呼唤法治，并引发人们深刻的思考。

上篇 冤案始末

1987年6月1日，天阴沉沉的。这天下午，三河县人民法院审理西定府乡白庄村上访农民李秀芬等5人扰乱社会秩序和非法拘禁一案就要结束了，天突然开始下起小雨。这也许纯属巧合吧，但是在场旁听和围观的人们却把它与案件联系在一块：“真冤哪，老天爷都落泪了。”

这桩案件冤在哪里？

1984年秋，西定府乡扩建砖厂，未经审批，擅自占用白庄东村121亩地。按各队平摊，应占东村一队31亩，实际占了84亩，多占53亩。土地是农民祖祖辈辈养家糊口的命根子，农民荣殿宏、白希明等人为了维护他们的切身利益，从1985年开始到省政府和地区上访。

在此期间，乡政府未经群众讨论，竟又采取欺骗手段上报占地申请。荣、白等人更加不满，连续跑到北京找中办、国办信访局和农业部反映问题。

三河县迫于中央有关部门的压力，出面与农民协商。议定多占的耕地，每亩地每年补偿200元，7月1日前和年底前各付一半。

但是，7月1日到了，乡政府没有如期付款。国庆节已经临近，补偿费一分也未付给农民。为此，荣殿宏等人找到当时乡党委书记杨宝生，提出不给补偿费，就坚持要回原来的地。纠纷再起，乡砖厂因农民要地种两次停产。

问题再次反映到县里，县委及政法委主要领导决定，从公检法和信访部分抽调7人组成工作组，前往西定府乡，并就如何解决问题定下基调：乡政府拖欠补地款是违约行为，要向群众检查；农民停砖厂则是违法行为，要向群众宣传法制；为首的是犯罪行为，要“整治”，不能“放过”，要给大一点压力。

工作组进村，正值农忙季节，许多群众不愿到场接受讯问。工作组负责人便开出治安传票，把一队30多名农民传到乡里审讯。有的还遭到揪打。

10月15日下午3时，荣殿宏从北京上访回家，一看三个儿子被传，匆匆赶到5里路外的乡政府。工作组一负责人把他领进一间屋里单独“谈话”。“谈话”后，荣殿宏就躺倒了。见到儿子便说：“他们整人太狠了。”约5点多钟，工作组说荣走路不稳，喘气不止，找来乡卫生院院长张福刚为他检查，张大夫观察一个多小时，体温、血压、瞳孔均属正常。晚上1点多钟，荣被抬进另一间空屋，看护人发现荣手冰凉，处于昏迷状态，又赶紧找来张大夫，张大夫护送荣去县医院。结果荣殿宏死于途中。

2 荣死以后，矛盾逐步激化。土地问题未结，又添了一条人命。

荣死的第二天早晨，县里通知家属荣殿宏已死，并向村里党员宣布，荣“喝农药自杀”。当家属来到县医院要看人时，工作组不让。家属怀疑荣殿宏是工作组毒打致死，又见他们不让见尸体，更觉得这里有鬼。荣殿宏为维护31户农民利益而死，村里人无不悲痛。大家一个心思，一定要把状子告到底，讨个公道，以慰死者。



1995年1月，受害农民平反后，把死者荣殿宏遗体从廊坊抬回白庄村安葬。图为李秀芬（中）全家在荣殿宏灵柩前合影

事后100天，即1986年1月24日，由省公检法三家联合解剖尸体，结论为“死者生前服有机磷农药中毒死亡”。1月28日，法医在公安人员保护下来到白庄村小学，当法医向农民宣布结果时，诸如毒物的来源，何时、何地、为何中毒却始终说不清楚。农民不服，以致纠缠到第二天下午，法医将化验单交给农民，才得以离开。此后，荣殿宏之妻李秀芬、儿子荣宝仁，以及本队农民白希明、吴云贵等频繁上访。寒风凛冽，他们跑在中南海门前，请求中央领导过问；烈日当头，他们静坐天安门广场，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声援。

1986年8月，人死已过10个月。中办、国办信访局、农业部、国家土地管理局等部门本着对人民负责的精神，耐心接待农民近百次的上访，多次督促河北省认真处理。河北省有关部门虽然一再表示由当地政府解决，不给中央添麻烦，但问题依然久拖不决。农民们无法再等待下去，8月11日，20多名农民再次赴京上访。县委县政府害怕事情闹大，赶忙派人拦截，并用车接他们到县委县政府。一天又一天，县里总是拿不出处理意见，农民在县委礼堂一住就是18天。

18天中，农民听从安排，耐心等待，基本上没有过火行为。县里先对农民说，已派人到中央和省里汇报了，后又说派人到地区汇报了。到了第14天，县委书记

记刘瑞丰宣布4条处理意见：土地问题，农民要地退地，要钱补钱；死者家属按照干部、职工善后规定，一次补助4300元；对占地、办案过程中负有责任的人员分别给予撤职、警告等处分。可是对荣殿宏的死因解释仍使农民非常失望。

荣殿宏的暴死对妻子李秀芬说是祸从天降，精神上的强烈刺激，经济上的巨大压力，两个女儿今后的生活出路等等早已使她悲痛万分。现在丈夫死因不明不白：如果说是服毒身亡，毒品从何而来？又用什么容器携带？何时服的毒？服了多大的量？何时出现症状？何时发生死亡？如果是自己服毒？又是出于什么动机？是不是受到外界的压力或其他人的威胁恐吓？既然服用了大量的敌敌畏，为什么药性能在长达8个钟头之久的时间里不发作？为什么乡卫生院长在诊断观察一个多钟头排除了敌敌畏中毒的可能之后，再次出现这种症状？再有，死者身上的伤到底是怎样形成的？联想到自己的男人是死在工作组的非法传唤之中，而至今没有一个让人服气的说法，李秀芬精神完全失常了。她恨透了那些不负责任、草菅人命的“父母官”，没有别的方式可以发泄，只有一骂了之。然而，她绝没有想到又一个厄运、又一个冤案再次降临到她的头上。

1986年8月28日，廊坊地委书记、专员等好几位

领导都来到三河,同时动用两个中队的武警。他们所谈的意见,还是县委那几条。农民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希望,纷纷上车,准备回村,再继续上告。也就在这个时候,三河县公安局长指挥把李秀芬和她的二儿子荣宝仁以及农民白希民、吴云贵等人铐走了。时隔不久,从未参与上访活动的荣殿宏的小儿子荣宝明,被诬为有人命案,也在北京被抓。

5名农民被抓以后,三河县有关部门指控他们犯了非法拘禁罪和扰乱社会秩序罪。他们一方面向中央和省有关部门汇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另一方面诱供逼供,收集农民罪证。对农民一会声称:你们把什么什么交出来,你们咬住谁,就把你们放了。一会儿又威胁说:你们把荣殿宏尸体(当时在廊坊冷冻,直到1995年1月平反才抬回三河县)埋了,如不同意把尸体埋掉,就判你十年八年,没准判死刑。这使得家属和农民们更加气愤,更加怀疑死亡原因,不但不予理睬,不愿接受尸体,相反倾尽家资向社会呼救。

9个月过去了,三河县及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原以为拖一拖、压一压,农民服了了事。结果农民们并没有半点屈服,而在新闻界、法律界却引起普遍关注。《农民日报》、《法制日报》等几家报纸派出记者专题查访。高级律师杨炳芝(北京市慧丰律师事务所)、李梦福(中国法大律师事务所)等6名律师,免费承接此案,准备为农民义务辩护。

显然,三河县这桩案件已使有关部门十分狼狈,再不开庭将更加被动。在这种情况下,地、县两级有关部门负责人不得不进行新的一番策划。1987年5月28日,三河县法院终于受命开庭审理。

三河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是怎样写的呢?

“被告人李秀芬、白希明、荣宝仁、吴云贵、荣宝明在县委机关院内聚众闹事,给县委施加压力,以实现个人的无理要求,多次围攻、辱骂县委领导同志,致使县委的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在本村小学校院内,因对法医的鉴定不满,非法剥夺法医的人身自由达三十多小时。其行为触犯了我国《刑法》第158条、143条之规定,已构成扰乱社会秩序罪和非法拘禁罪。”

那么,再请听一听被告律师的辩护吧:

“天安门是国家的象征,用农民话说是国家的橱窗和脸蛋,中南海是中央首长工作的地方,农民在这些圣地下跪喊冤,警卫战士们不但没有任何强制措施,反而热情送他们去办公厅向有关领导反映问题。为什么农民被请到自己的县里来就犯了‘扰乱社会秩序罪’呢?”

“对于李秀芬辱骂县委领导,我们不认为是值得称

道的,相反,我们认为李秀芬等人这样做恰好达不到她们最初的目的,反而给工作带来了被动和困难,李秀芬等人长时间这样做是与国家有关法律相违背的,但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她的特殊身份和所受到的沉重打击,再想一想她没有文化,不懂得上访的有关规定,不懂得国家有关法律,考虑到当时她本人的精神状态,考虑到她并没有故意要扰乱县委工作,她的行为除辱骂个别领导外尚未给社会造成严重后果,考虑到政府有关部门在这问题的处理上确有错误,我们认为李秀芬等人的行为尚未构成犯罪,以扰乱社会秩序罪进行起诉是站不住脚的。”

“关于非法拘禁罪可以说简直是荒唐。作为有公安干警20余人保护的法医,李秀芬是怎样拘禁的呢?她自己尚需要人照料,怎么有能力去拘禁有众多公安干警保护的法医呢?如果当时确实是非法拘禁的话,在场的众多干警为什么不予制止,这岂不是玩忽职守吗?”

法庭在听审三天后进行了两天的辩论,旁听者不时为律师们有理有据有力的无罪辩护报以热烈掌声。人们满以为5名农民冤情大白于天下,得以昭雪了,白庄村的土地纠纷和人命案该终结了。谁知,1987年7月20日,三河县法院竟对律师无罪辩护的正确意见根本不予采纳,判处李秀芬、白希明有期徒刑二年,荣宝仁有期徒刑一年。

被告人不服,当即上诉。被告律师继续担任辩护人。但当律师又通知二审法院,准备在约定的时间前往廊坊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交换意见、送交辩护词时,中级法院已经下了终审判决,维护原判,匆忙终审此案。律师的辩护权利也一并被剥夺了。

被告向中级法院的上诉被驳回以后,被告农民一方面通过律师依照法律程序向有关部门申诉,另一方面通过种种途径,向中纪委、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办、国办信访局、公安部等领导机关呈送申诉状。

最高人民法院按照法律程序,要求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其结果还是维持原判。

下篇 平反风云

农民无辜受害,担任本案辩护律师的杨炳芝、李梦福、江兴国、陆志敏、孙维智和政法大学退休干部潘怀先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们没有收农民一分钱,而为此案子调查取证,召开新闻发布会等,却花掉上万元。至于他们牺牲了多少时间,花费了多少心血更是难以说清楚。他们深知农

民冤屈，也深感案情复杂，地方官官相护，打赢官司困难重重，几乎没有希望。然而，他们毕竟是法律的忠诚卫士，坚信法律终究会征服权势，作为律师有责任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保护农民的利益不受侵犯。在环环相连的当权者面前，律师们都有一个打赢官司的坚定信念：绝不气馁，绝不退却，绝不半途而废。1987年7月，他们带着满腔的愤慨，发表严正声明，披露廊坊中级法院违反《刑事诉讼法》，剥夺被告人和律师合法权益的行为，强烈要求重新审理此案。

农民不白之冤，律师侠义之举，打动了京城记者。为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在中央十三大期间，记者专访省委主要领导，希望督促查处。记者也曾多次到地、县、乡采访，尽管受到有关部门领导一再限制：不让见该村农民，不让见在押被告，不让看案犯卷宗，但记者毫不畏缩，不住招待所，不吃招待饭，不要人陪，不要派车，千方百计查清事实，先后写出两篇内参，呼吁中央有关部门直接查处纠正此案。

律师、记者的呼声，受到中央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乔石、任建新等同志以及中央八大部门负责人都先后做出查处的批示。

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党组会议，决定组成专案小组，调卷审理。1988年10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提出4条处理意见，明确指出：李秀芬、白希明等被告为了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在与掌握权力的当事一方的抗争中，曾有过激言行。但起因、责任完全在县乡的某些领导人，他们一再违法处置，使矛盾激化。不应归咎被告人，更不应以犯罪对待，应撤销原判，宣告无罪，并做善后工作。同时指出，乡砖厂占地违背国家有关土地的法规，县委处理不执行政策法律，不实事求是妥善解决，反而动用专政机关，致死亡一人。对这样严重的后果不承担责任，却对白希明等人处以罪罚，显系不公。应由河北省高级法院如实向省汇报，对占地、死人及有关领导和责任人员重新进行处理。

1989年6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举行第408次会议，讨论李秀芬、白希明等人申诉案，认为李秀芬、白希明等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应当宣告无罪。并于7月24日致函河北省高级法院，要求省高级法院与有关部门联系，切实商妥解决善后问题的办法后，再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改判。此后，最高人民法院还派专人前往省高级法院做工作，督促落实。

1989年7月31日，中办、国办信访局为了督促河北省执行最高人民法院的改判意见，又专门给原省委书记邢崇智、原省长岳岐峰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对白希明等人上访案，廊坊中级法院经二审，维持原判。

省高级法院复查后，也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审理此案后，认为这是一起错案，因为原判及复查对占地及其处理忽视了违背国家土地政策的依据，对荣殿宏死亡责任遗漏了重要事实。白希明等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而上访是合法合理的，上访过程中曾有过激言行，但主要是由于县、乡某些领导人不执行有关政策和法律，动用专政机关，压制群众，激化矛盾所引起的，责任不应归咎于上访人，更不应以犯罪对待。应对上访人撤销原判，宣告无罪。

最高人民法院、中办、国办信访局，对李秀芬、白希明等人上访案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明确地要求河北省执行改判决定。但时隔4年，到1993年，省里还没执行。被告虽已到期释放，但仍然背着罪名，负有责任的人没有得到任何追究；一位同情农民的政法干部却受到不应有的牵连。

所以如此，按照地方司法部门一些同志的说法，这个案子省地县三级党政领导参与，法院很难做通工作。显然，我们的法制力量太脆弱了，以党以政代法在这里已严重到何种地步！而按照地方个别干部话说，这个案子纯粹是律师、记者在折腾。言下之意，律师、记者多管闲事。至于农民冤不冤，在他们看来并不重要，中央三令五申要求改判，他们就是顶着不办，谁能奈我何？

受害农民出狱后的几年中，记者每年都去访问受害农民，每次见面，心都颤抖。李秀芬、白秀明等农民10年上访，花去费用少说五、六万元。被抓以后，土地几近荒芜，减少收入不下10万元。几户农民家底耗尽，成了村里数得着的困难户。李秀芬一家的境况更令人心酸。李秀芬60多岁关在狱中，染病在身，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和照顾，身体非常虚弱，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女儿因为公安人数次夜闯民宅，逼交农民录下的法医对话磁带，吓得精神失常。儿子荣宝仁服刑，妻子怀孕生产无人照顾，孩子死了，媳妇一场大出血，也几乎丧命……。上万元的医疗费用造成负债累累不说，一次次精神摧残使人不堪忍受。一次，记者问及李秀芬家中情况，李老太太潸然泪下。当问到她有何要求时，她的儿子说，老太太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盼望着政府早日给她平反。一天不平反，她死也不瞑目。最高人民法院做了改判决定，几年都执行不下去。农民等啊、盼啊，究竟还要等到何时？盼到何时？记者为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促使有关部门为受害者平反昭雪，心中深感愧疚。

社会舆论反映人心所向。1993年夏秋之际，《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报刊纷纷发表记者所写的内参，再次反映农民的呼声，要求省、地司法机关执行最高人

民法院的决定，维护法律尊严。

1993年秋天，记者前往河北省高级法院，梁军副院长接待记者，详细说明了该院为此案平反工作所做的努力。

1994年春节前夕，白庄村农民终于看到了云开日出这一天。廊坊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任副院长来到三河县，登门向受害农民赔礼道歉，当场宣读改判决定：被告人白希明、李秀芬、荣宝仁、吴云贵、荣宝明无罪。

农民接到了判决书，热泪盈眶，对党和政府千恩万谢。不料，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农民手中判决书仅是一纸空文。当年压制农民的“父母官”不但官运亨通，连一句抱歉的话都没有。对农民遭受的重大经济损失，有关部门也没有一点补偿的意思。农民找有关部门不是吃闭门羹，就是受冷落。农民真寒心啊，难道此案就这么了结了？

中国毕竟是一个法制正在走向完备的国度，毕竟还有许许多多“青天大人”在为人民主持正义。

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东北华北组，中办、国办信访局接待处、联络处等单位，多次接待受害农民，再次肩挑道义，不断督促平反善后落实工作。

律师、记者善始善终，继续走访有关部门，晓之大义，交涉赔偿事宜，同时安抚受害农民，稍安勿躁。多

年来目睹此案甚至与此案有关的乡村干部，也实在看不下去，主动出面，一趟又一趟跑到廊坊和三河县，劝说现任领导给农民一个交待。

1995年春节前夕，由于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干预，县有关部门总算同意赔偿，虽然赔偿的金额不足4万元，与农民实际损失相差甚远，但农民们并未计较。他们明白，平反冤案每一步进展都是阻力重重，能有今天这样的结果已实属不易。那些压制农民的权势者，在法律和正义面前难辞其咎，并受到舆论的强烈谴责。农民们讨回了公道，战胜了权势，其社会价值绝非几万元钱所能相比。

白庄村官司打赢了，四乡八镇奔走相告，一时间来看望受害家属的人络绎不绝，每天不下上百人，该村农民盛情招待，连续三晚放电影以示庆贺。

十年冤案，一朝平反，受害农民恩怨分明。为表达他们对中央有关部门和律师、记者的感激之情，特做4面锦旗，送到北京。

他们热情称颂最高人民法院“维护法律尊严，还农民以公道”，称颂中办、国办信访局“人民信访为人民”。

他们热情赞誉律师“护法护民，刚直不阿”，赞誉记者“为民立言，与民同心”。

(责任编辑 王 恂)

欢迎为《炎黄春秋》杂志踊跃投稿

《炎黄春秋》杂志是以周谷城为会长、萧克为执行会长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是历史纪实为主的综合性月刊。本刊坚持以展示炎黄文化成果，讴歌中华历代英杰，回顾民族发展历程，描绘神州人文风貌，讴歌改革开放大潮，宣扬海外华人爱国奉献精神为主旨。高举爱国主义大旗，遵循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倡讲实话，讲真话，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力求真实地反映其本来面貌。防止主观性和片面性，不任意褒贬，不容无中生有地虚构。

本刊创刊三年半以来，以其思想性、真实性、知识性、可读性和史料价值，深受广大读者所喜爱，来信来稿不断增多，许多佳作被国内外数十家报刊转载。为了更好地办好刊物，提高质量，拓宽刊物内容，欢迎学者、作家及热爱本刊的作者和读者，根据刊物的宗旨、内容和风格，踊跃投稿。现提出以下几点要求：

一、为保证内容的真实性，要深入采访，反复核实，掌握可靠的、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如根据有关资料加以整理，请注明资料来源和参考书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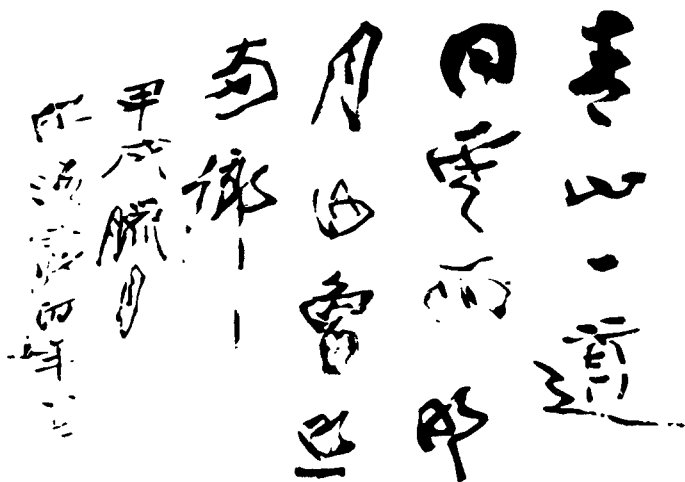
二、文字力求简明、通畅。来稿一般不要超过15000字，欢迎二三千字的短稿。最好配有清晰的图片（彩色、黑白均可），并写清说明。

三、文字要规范，不要潦草。特别是人名、地名、年月、数字、引文、古文、生僻字、外文等，一定要写清楚。

四、请自留底稿。来稿如不采用，一般不退。如必须退回，请予注明。

五、请勿一稿两投或多投。如发现其它报刊已经采用，本刊恕不再付稿酬。

炎黄子孙盼统一 明月何曾照两乡



——书法家吴玉如题赠张大千条幅

●王湜华

1982年8月11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发表了吴玉如先生于8月8日去世的消息，而并没有用讣告的形式，标题却是《老人归道山，希望留人间》，副题为《著名书法家吴玉如生前书写一条幅赠张大千，盼祖国统一》，并在文章的右方刊载了这条幅。这确实体现了吴玉如先生晚年的一个重大而未能了却的心愿。

吴老是周总理中学时代的亲密同学，他是多么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见到两岸的统一，让分隔了数十年的两岸亲友得以团聚啊！遂于同年4月24日挥笔写下这一条幅。直到他病重住院的最后一刻，在病榻上听到《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的广播，因耳背，他还数次叫家人把收音机贴在他耳边，反反复复地聆听这一消息，每听一遍，都要频频点头，面上露出一丝欣慰之情。这是他老人家临终前喜获的最佳消息。祖国统一大业又向前迈出重大的一步，使他感到由衷的高兴。

就在同年5月5日的《参考消息》上，发表一则短的电文：“中央社台北四月二十四日电：蒋总统经国先生，今天上午于总统府，以中正勋章一座，亲自颁授绘国画大师张爱（大千）先生。今天正逢大千先生八十晋四华诞。”就在大千先生生日受勋之同时，大陆上他的老友吴玉如先生虽不知此事，却正在深深思念着他，表达盼望祖国统一的激情而遥寄条幅。这岂不是巧极之巧合！《张大千传》与《张大千年谱》两书中都对此事有专门章节记载。这又一次体现出，统一大业是两岸人民无时无刻不在企盼着的头等大事啊！

郑敏先生将这幅珍贵的墨宝裱好后，大千先生的大弟子、画虎高手胡爽齋先生一见，感慨之情难抑，便

挥笔在条幅之下题写“有幸得见吴玉如先生特赠恩师张大千先生墨宝神品。一九八三年癸亥十月于啸风堂，爽贫拜观。”此后，书法家纷纷挥毫，题写于条幅之四周。著名的画马专家尹瘦石题云：“遥念故人，情思亲切。一九八四年一月瘦石。”著名书法家王遐举先生写道：“两岸共迎春，相思情更亲。一九八四年之春，遐举。”当时已89岁高龄的肖劳先生，特地作了一首骚体诗，题于眉端：“炎黄子孙兮，振兴中华。声闻远播兮，在天之涯。见书思人兮，醉墨横斜。珍此遗迹兮，粉壁笼纱。甲子（1984）仲夏题吴迂叟遗墨，八九叟肖劳。”著名画家卢光照则在肖老题诗下又题道：“统一乃全国人民之意愿，玉如先生之情更切，书法道劲有味，余钦之。甲子卢光照。”著名书画家庄言用肯定的口气在卢光照题词之下写道：“炎黄子孙定能如愿。乙丑年（1985）庄言。”著名画家董寿平则题了条款在左侧：“乙丑夏日董寿平拜观。”此时条幅上所余空隙已无多。1989年秋，著名画家范曾在庄言题词左侧的小空当里又题了“玉如先生书，虬龙苍松可以拟之。己巳（1989）秋日十翼范曾”。同年冬，赵朴老见到这条幅，亦为之兴奋激动，提笔便在肖劳题诗之左，写上了“挥臂高呼，至性至情之笔。己巳仲冬，后学赵朴初拜观。”吴门大弟子、著名书法家、书法教育家欧阳中石在笔者题记之左，激动地写道：“甲戌（1994）之春，郑敏先生持先师绝笔来过，得瞻遗墨，的是人书俱老，品学毕见，亲莫如也，敬莫如也。不肖及门再拜敬奉如上，中石。”

至此，条幅上下已全题满，只好另立一大册页。

1994年12月11日，天津李鹤老在册页上用篆书写了鲁迅诗一句：“相逢一笑泯恩仇”，并写了长跋云：“一九四二年为先师玉如吴公筹展於（天津）永安饭店，邀古玩商之有卓识者十余人共为赏评。云山阁之曹伯舫质言曰：‘三百年无此大手笔。’歛皆众然无异声。厥后郭沫若先生见公楹贴，惊叹曰：‘此书置明人作品中，殆难轩輊。’公逝世五年，弟子等缅怀於利顺德，余展示公所书‘炎黄子孙盼统一，遥寄张大千’之刻石拓本，刘光启师弟谓：‘此书可与东坡雁行。’光启现为国家级鑑家，曾奉派旅美，代为鑑别所藏我国文物，所言当不诬。”

李鹤老题写之后，吴玉老的长公子小如先生题诗一首：“惨缘年华终皓首，宜春馨逸顿秋声。一衣带水宁险阻，两岸同胞奕世情。甲戌冬，小如。”二公子同宾先生题道：“东望台澎紫骨肉，南飞倦鸟亦知还。甲戌仲冬，吴同宾书於天津。”著名古文字专家、著名书画篆刻家康殷先生，题写了五个钟鼎文大字“两岸一家



春”，并以行草作了释文，下款为“乙亥正月，大康”。欧阳中石虽在原件之下已题过，在此册页上又再题曰：“青山隔岸云天外，碧海同心指顾间。甲戌冬，中石拜题。”著名画家范曾也再次题了册页，文为“云鹤游天”四个大字，以盛赞吴玉老书法之超凡脱俗，如直冲云霄之鹏鹄，翱翔于云天之上。上款题“郑敏方家”，下款为“乙亥范曾。”张大千及门弟子已87岁高龄的何海霞老先生，一见原件与册页，更是心潮起伏，先在的原件右侧题了“拜观吴老玉如遗墨，知与先师大千先生神交久矣。今人物往矣，不禁慨然。后学何海霞敬书。”又在册页上题了一开，文曰：“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照两乡！甲戌腊月，何海霞时年八七。”又为册页题了封签曰：“两岸一体，千秋同乐。何海霞题。”著名书法家李铎在册页上题道：“炎黄子孙明大道，隔天疆土盼全瓯。甲戌冬李铎题。”又在原条幅何海霞题词之下题曰：“今日有幸拜观玉如大师神笔，乃三生之幸也。甲戌冬李铎谨题。”年轻书法家张宝彤在册页上题道：“人生亦有祖，谁非炎黄孙？鸟归思故林，落叶恋根本。郑敏先生撰句。甲戌岁末，宝彤奉抄。”

吴玉老离开我们已有13个年头，大千先生也已谢世12年了。为了实现二老的遗愿，望两岸的各界人士再进一步作出努力，携手迎来两岸一家春。

（责任编辑 煥 然）

奉系军阀并未禁演《凤还巢》

——电视剧《梅兰芳》观后

●葛献挺



梅兰芳演《凤还巢》

纪念梅兰芳先生诞辰100周年高潮刚刚过去，电视剧《梅兰芳》适时播出，颇有意义。该剧把与梅兰芳相关的许多历史人物，如冯耿光、齐如山、吴震修、李世芳、言慧珠等搬进电视，对后人了解梅先生的为人与艺术生涯，并更深刻地了解那个时代，均极有益处。

梅兰芳一生经历，丰富多姿，曲折婉转，某些方面又颇具传奇色彩。梅先生的历史，从一定意义讲，

就是民国史的一个重要侧面。因此，对于一些与梅先生有关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描写，应该力求客观、严谨、公正和准确，既不能沿袭“左”的旧说，也不要以讹传讹。民国历史近在咫尺，为时不远，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描写，如果失实，既对不起前人，也会有误后生。

京剧《凤还巢》“被刘哲禁演”问题，60余年来，诸说不一。现就

电视剧《梅兰芳》关于“《凤还巢》被教育总长张哲禁演”的情节处理，谈谈当年“禁演”传说的历史背景。顺便说一下，《梅兰芳》一剧中的张哲，是虚构的，北洋政府历届内阁教育总长，并无张哲其人，所影射的乃是刘哲。

近十几年来，凡是在纪念梅先生的活动中，涉及《凤还巢》一戏时，节目主持人也往往发议论说：“《凤还巢》曾被奉系军阀教育总长

刘哲禁演”，其所根据，多为口传。关于刘哲禁演《凤还巢》的文字记载，大约有3种：

一，1994年出版的《梅兰芳年谱》，在1928年条下说：“4月6日，在北京中和戏院首演《凤还巢》。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因《凤还巢》剧名与“奉还巢”谐音，竟由教育总长刘哲以‘有伤风化’的莫须有罪名禁演。”

二，1986年再版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三集，在“承华社在开明剧场”栏内，注释说：“1928年正月，编演了全本《宇宙锋》，春夏之交又编演了《凤还巢》，从这时起，在开明、中和两处轮流演出，《凤还巢》就是在中和首次上演的。当时正是张作霖当大元帅时期，奉系人物因“奉”“凤”同音，忌讳这出戏，当时的教育总长刘哲，曾托人带话最好不演《凤还巢》。”

三，1928年5月2日《北洋画报》在《据说……》标题下说：“梅兰芳新排之《凤还巢》，教育总长刘哲认为有伤风化，有实行取缔说”。但一周之后，也就是《凤还巢》首演一个月零三天后，《北洋画报》于9日，刊出朱弦写的《凤还巢问题》一文，这篇专访性质的文章说：“近传教育部对于梅兰芳新排之《凤还巢》认为有伤风化，拟加取缔，但非事实。《凤还巢》一剧，在昆曲名《丑配》，在秦腔名《循环序》，梅易之为乱弹，命名之由，因剧情中程雪娥之婚姻，几经变幻，仍如其故。原拟名为《换巢鸾凤》，复因并未尝换巢，乃易今名，此剧来历如此。”

《凤还巢》初演时，教育总长刘哲曾前往中和戏院观摩。看戏时，刘哲曾经询问一同看戏的教育部某司司长：“这出新戏经过我们审查吗？”某司长回答：“未经我们审查”。刘哲便对某司长说：“那咱们

可把原本要来看看。”某司长同时兼任该部“通俗教育会”会长，回到部里，便以“通俗教育会”名义致函梅兰芳索取剧本。但“通俗教育会”的公函，误投到中和戏院，正赶上梅兰芳在开明戏院演出，公函在中和戏院一压就是10天，“通俗教育会”误认为中和戏院和“承华社”故意抗命不报，便以原函登诸报端。一登报，社会上便纷纷传言教育部与梅兰芳发生对抗，进而传言，还将取缔《思凡》和《琴挑》等戏。

梅兰芳见报后，四处查询，始在中和戏院查到此函，梅便回信给“通俗教育会”说明经过，并表示歉意，然后说明自己在“承华社”之地位仅系一名艺员，该社事务另有专人负责，同时催促“承华社”将《凤还巢》剧本送审。教育部收到剧本，仅三日便将剧本退回，对丑女雪雁（慈瑞全扮演）一角台词略加修正，此事便告结束。之所以引起风波，《北洋画报》说：“因报纸披露此事，日本某评论家即抓为题目，加以评论，‘教育会’又致函某日本评论家，与之辩正，遂致俨成问题。”

《北洋画报》所指日本某评论家，即日本人辻听花又名辻剑堂，此人在北京有“中国通”之称，与北京梨园行许多人都有交往。当时日本人在北京办有《顺天时报》，中国政府无权过问，辻听花常在《顺天时报》发表有关中国戏曲的文章。当“通俗教育会”与辻听花辨正“审查”与“取缔”之别时，《北洋画报》说：“有人问梅，梅说‘此戏慈先生的丑小姐，跟《风筝误》差不多，没有什么。’‘通俗教育会’改得也好，盖所谓有伤风化，殆慈瑞全打诨太过，梅所饰为贞女雪娥，谈不到有伤风化也。”

《凤还巢》4月6日首演，5月

9日《北洋画报》就发表《凤还巢问题》一文，其用意是在辟谣，以正视听。《北洋画报》的经济资助人是奉系的张学良将军，画报主持人冯武越，是梅兰芳好友冯耿光的令侄。因此，该文的权威性和可靠性是无可质疑的。再，梅兰芳是名人，《凤还巢》是名剧，鉴于梅先生的声望和影响，北洋政府历届内阁，对梅均优礼有加，奉系军阀亦不例外。奉系的许多军政要人，都和社会上的“梅党”有交情，有些人如周大文等本身就是“梅党”，就连恶名远扬的张宗昌进京，也以能拜访梅兰芳先生为荣。“奉”“凤”谐音是事实，奉军在北京军纪太坏也是事实，有人希望奉军退回关外，也反映了当时北京的市民心理。刘哲是文人，出长教部，他怀疑《凤还巢》暗含影射均有可能，但明令禁演，则确无其事。60余年以来，“刘哲禁演”《凤还巢》的罪名，说到底，也只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电视剧《梅兰芳》也把《凤还巢》事件处理成禁演，不过将历史上的刘哲，虚构成“张哲”，看来是蛇足之笔，因为刘哲既未禁演，何来“张哲禁演”呢？

综上述，《梅兰芳年谱》说：“刘哲以莫须有罪名禁演”；《舞台生活四十年》说：“刘哲托人带话，最好不演”；电视剧《梅兰芳》则虚构成“教育总长张哲禁演”，实际还是影射刘哲禁演。《北洋画报》5月2日发表题为《据说》一文后，5月9日又在《凤还巢问题》一文中，明白无误地指出：“有取缔的传说，但非事实”。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奉系军阀，无论是张作霖，还是刘哲，均不曾禁演过京剧《凤还巢》。

（责任编辑 孙 申）

思故人兮沉心曲

——学者吴晓铃谈往录

●郑晋王恂

惊闻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吴晓铃老先生于2月7日病逝，终年81岁。笔者全家至感悲痛，于元宵节赶往八宝山向吴老遗体告别。哀思绵绵，往事悠悠。

在吴老卧病在床之际，笔者曾给他寄赠《炎黄春秋》杂志，他非常爱看，并在病榻上给笔者写信：“今天（1994年10月15日）收到见赠之《炎黄春秋》1994年第7、8、9三期，当夜快读一过，至感兴味，但未足过瘾！如有1994年7月号以前之各期，无论多少或残破，均盼能见寄，为感！”“又，令堂前赠之北昆老艺人剧照，独缺侯益隆，不知尚能找到一、二幅否？”

吴老索要的《炎黄春秋》各期刊本，笔者已按期寄上。唯独北方昆曲名净侯益隆的剧照，笔者已选好3幅，第一次洗印不清，第二次又托友精印，但未及送到吴老手中，先生已溘然长逝。而这封信竟成吴老的绝笔！

吴老是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在中国古典文学、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语言学、梵文及印度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在中国古代戏曲和小说的研究方面，成就尤为突出。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著述颇丰。曾多次应邀赴日本、印度、美国、加拿大、法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访问和讲学，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贡献。1989年，获法国巴黎大学荣誉哲学博士学位；1990年，获印度国际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在吴老生前，笔者曾多次专程拜访。当时吴老虽然做过多次手术，但依然精神健旺，谈笑风生。他追忆当年：“三十年代，我在燕京大学学过两年医学，和当今著名医学专家吴阶平是同班。1935年到1937年，我到北京大学改学文学。毕业后，我又回到燕京大学，在文学系当助教。那时，我和令尊王西微先生同住在蔚秀园，我们经常见面。令尊是戏曲大家吴梅的四大弟子之一，我又研究戏曲，遂成知己。‘珍珠港事变’后，我

远走昆明，到了西南联大。后来，听说你们全家到了解放区。北平解放后，你们家住在绒线胡同的时候，我时常去看望你们二老。……”

孙猴和芭蕉

在闲谈中，吴老问起：“那还是三十年代的事吧。令尊经常邀请北方的著名昆曲艺人在家聚会，还拍了很多戏装像，这是很宝贵的资料。我记得，郝振基在《偷桃·盗丹》里扮孙悟空，与众不同，头上戴的是毡帽头。”

“是戴毡帽头，现在还保存着这些照片，等我洗几张送给您。”

“那时候，你们住在哪儿？”

“石驸马大街。”

“你们家的院子里是不是还种着芭蕉？”

“种了两棵芭蕉。所以，我父亲在庭院门廊上写了一块匾：‘两蕉亭’。”

“我记得，芭蕉树上结了小芭蕉，这在北方非常罕见。《世界日报》上报道过，还登了照片呢。”

“您的记性真好！”

一篇论文和三出戏

吴老当年在北京大学毕业时，写过一篇论文，论证了清初的八出戏，如《时迁盗甲》、《除三害》、《卸甲封侯》等，剧作者是李笠翁。校长胡适看过这篇论文，批了八个字：“此文结论，定可成立”。

从此，吴老与传统戏曲结下不解之缘，潜心研究至今有57年之久。他不仅治学精深，硕果累累，而且还登台演出过。

“那是我从燕京大学到昆明西南联大以后，登过三

次台。

“我演过杨继业，但不是《碰碑》里的杨继业，而是《贺后骂殿》里的杨继业，只在上场和下场时各唱四句散板。

“我也演过赵云，但不是《长坂坡》里的赵云，而是《空城计》里的赵云，只在诸葛亮计退司马懿以后出台亮相。

“我还演过《麒麟阁》，饰秦琼，靠，佩剑，执钢，还与贺方开打。有的观众笑我的打法。可是，罗常培先生看了，说打法对，他是行家呀。”

真想不到，吴老当年竟扮演过武功盖世的秦叔宝。至今，秦琼和尉迟敬德还是守护大门、降魔除妖的门神呢。



吴晓铃（中）与台湾学者魏子云（右）、香港学者梅节（左）（王悔摄）

两根拐杖

在吴老那古色古香的客厅里，摆放着很多珍贵的文物和古籍。其中，有两根拐杖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根是红漆锃亮，上面刻有一百个寿字的拐杖。一问，方知是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生前的爱物。在他刚刚逝世后，侯夫人王雅兰就把这根拐杖赠送给吴老，可见交情深厚。

在侯宝林病危期间，吴老曾到医院病房探望。一生为相声艺术呕心沥血、孜孜探求的侯宝林，此时还向吴老请教：“十二月为什么叫‘腊月’？”“京剧《扒蜡庙》的‘扒蜡’究竟为何物？”吴老当晚回家就认真查阅，并将有关词条抄录下来，寄给侯宝林的女儿侯珍。“扒”指危害农作物的蝗虫之类的害虫；“蜡”和“腊”均指古代年终祭祀诸神。一位是好学不厌，一位是诲人不倦。真个是书山有路勤为径，艺海无涯苦作舟。

另一根是角质圆头的手杖，虽已陈旧，但精雕诗文。一问，方知是京剧艺术大师马连良的遗物，是马夫人陈慧瑛所赠。这又是一件稀世珍宝。

仔细看去，杖上题诗四句：

南诏藤兮楚兕角
裁作杖兮何丰丰
温如玉兮长相握
思故人兮沉心曲

这四句诗正是吴老所作。同窗王世襄用香火精心烫制。

睹物思人，感慨万端。吴老追忆道：“马连良字温如，所以隐在诗中：‘温如玉兮长相握’。他是在‘文

革’中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死于吴晗之前，都是因为《海瑞罢官》……”

“我吴二爷，就是不批邓！”

岂止马连良、吴晗？有多少开国元勋、忠臣良将、文章泰斗、学术名家……在“史无前例”的浩劫之中含冤死去！

即使吴老本人也在劫难逃，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造反派”勒令俞平伯、吴世昌和吴晓铃自己做高帽戴上。

“当时，我心里想，自己一生只作学问，不曾当官，做个乌纱帽戴上不合适，想来想去，唱戏的老生戴方巾，我也做个方巾戴上吧。”

我们都大笑起来。

“俞平伯和吴世昌自己不会做高帽，也不能幸免。俞平伯被戴上清代的红顶花翎帽；曾在英国执教17年的吴世昌，被戴上一顶博士帽。”

“博士帽？真没想到‘文革’帽子店里还‘创造’出博士帽来。”我们的笑已经变成苦笑了。

“‘文革’中还有一件事：江青命令出版经我校点的《关汉卿全集》，被我拒绝了；即使用‘政治任务’来压我，我也没有答应出版。我这个人就是有股倔脾气，偏不买倚势压人的帐！”

“在那个年代，这可是犯下滔天大罪。”我们不无担心地说。

“后来，把我们下放到‘五七’干校，在河南省信

阳地区的息县。先是让我和钱钟书保管工具，‘成绩’是丢了几辆手推车。又让我们烧锅炉，干这个活儿，要早起、晚睡，挑水、封火，十分辛苦。钱钟书不会烧锅炉，只会往锅炉里倒水，由我烧火。钱钟书戏称：你是‘神火将军’，我是‘圣水将军’（这都是《水浒》人物的绰号）。

“后来，又把我调走，看管基建工地，烧锅炉只剩下钱钟书一个人。他把大木头塞进锅炉里，把火拔起来，冒出了烟囱，烧毁了棚子，结果是遭到狠狠的批斗。

“‘反击右倾翻案风’刮来以后，有人动员我‘批邓’。我说：‘我吴二爷，就是不批邓！’因此被停职停薪半年之久。我气愤地说：‘就是到北京站拣破烂，卖废品，我也照样活下去！’‘你停止我的工作，我可以自费出去考察！’”

自费走山西

吴老虽身处逆境，却意志不懈，始终不放弃学术探求，果然自费走山西，考察戏曲史。

从雁北到晋南，他走一处，下火车考察一处。雁门关，是戏曲《南北和》故事发生的地址；宁武关，是戏曲《别母乱箭》故事发生的地址；永济的普救寺，是戏曲《西厢记》故事发生的地址；晋南的洪洞县，是戏曲《苏三起解》故事发生的地址……每考察一处，他都做了详细的记载，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山西农村，戏台很多。仅洪洞县的一个村子，就有二十多个戏台。可见当年戏曲在农村普及的程度和演出的盛况。每遇一处戏台，吴老都丈量面积，绘制成图。从考察中还发现，明代的戏台很小，只能演文戏，不能演武戏；以后才逐渐扩展，演出武戏。

山西之行，满载而归。吴老的精神和作为，使所在单位的同仁刮目相看。领导上给他恢复了职务，补发了工资。

“我用这笔钱买了一台电冰箱。当时，电冰箱很难买，还不像现在这样普及，我是托医学界的同学才买到的。听说，当时邓小平同志还没有电冰箱呢。”

（责任编辑 焱 然）



吴晓铃（中）及夫人石真（左）同本文作者合影。吴老身前倚立的手杖，就是马连良、侯宝林所赠 王纪英摄



丁肇中近影 (杨武敏摄)

丁肇中

的

科学之路

● 桂 峰

“追求客观真理和用实践去检验真理。”

——丁肇中的座右铭

1974年，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丁肇中，在美国的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所，进行了一项大胆的、复杂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实验，他发现了一种人们以前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粒子——J粒子。

当时，新闻界有一个误会：以为J粒子就是“丁粒子”，是丁肇中以姓氏来命名的。其实，这纯属巧合。丁肇中的本意是，想用这个粒子来纪念他们在探索电磁流性质方面，花了10年时间才获得的这项重要新发现。加之物理文献中习

惯用J来表示电磁流，因此，丁肇中便以拉丁字母“J”来命名这个新粒子。

丁肇中的发现，改写了相沿成习数百年的教科书，给亚粒子世界重绘了一幅崭新的图画。

美国发行量很大的《新闻周刊》，为此撰文评介道：“这是基本粒子科学的重大突破，对于近半个世纪以来，物理学家努力寻求解析自然界的基本结构，具有重大的意义和贡献。”

马萨诸塞理工学院院长杰米

韦森，为自己学院的科学家做出了如此重大的贡献而感到自豪。他对新闻界评述道：“丁教授的研究，已为人类开拓了宇宙未知的领域，并使基本粒子物理学迈进了一个新的境界。”

1975年2月14日，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也发来了贺电：“得知你们发现了新的、寿命更重的重粒子，我深感兴趣。在此，我谨代表美国人民，祝贺你和你的同事致力于此项重大发现的努力和贡献。”

由于发现了J粒子,许多物理学家便把“J以前”和“J以后”作为区分历史时代的标志。J粒子发现两年之后,丁肇中便荣获了1976年度的诺贝尔科学奖金,那年他仅40岁。

起 点

1936年2月27日,丁肇中出生在美国密执安州安阿伯镇。他的中学时代在台湾度过。他的数学、物理成绩优异,对历史学也很有兴趣。

1956年8月底,丁肇中只身一人到美国安阿伯市的密执安大学留学。在大学里,他废寝忘食,埋头书斋,图书馆——实验室——食堂——宿舍,是他生活的轨迹。尽管美国大学里课余生活丰富多采,很少看到丁肇中的身影。同学们嘲讽他:塞缪尔(samuel是丁肇中的美国名字)真是怪人,学习顶呱呱,可惜不合群。”

在学习上,丁肇中并不满足于几本教科书以及教师指定的参考书,他决心系统地、深入地搞清整个近代物理学的来龙去脉,及时地、广泛地了解近代物理学的最新成就和发展趋势。他饶有兴趣地研读物理学大师们的经典著作,博览物理学期刊。

尽管丁肇中从台湾到美国时,口袋里只有100美元,而且举目无亲,英语也不太纯熟,但经3年努力之后,他获得了数学及物理学硕士学位。过了两年之后,他又荣获了物理学博士学位。

这时,丁肇中再次面临人生道路上的重大选择:是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呢,还是经商、教学?跟丁肇中一块去美国留学的同学中,有的准备带着文凭回台湾,求个一官半职,也有的打算继承家业做买卖。丁肇中对升官发财没有兴趣,决定

留在美国继续从事物理学研究,把自己的命运同方兴未艾的高能物理研究牢牢地拴在一起。

选 择

翻开物理学史,我们不难发现:物理学的发展犹如长江、黄河之水,后浪推前浪,滚滚东流。

17世纪,英国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抓住了机械运动最本质的规律,建立了万有引力的理论;19世纪,麦克斯韦把零散的电磁现象加以归纳提炼,建立了电磁理论。这两种宏观的、长程的相互作用力,易于被人们观测和认识,但人们又发现这两种理论存在着矛盾。1915年,爱因斯坦提出的广义相对论和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量子力学,弥补了上述两种理论的不足,形成了“量子电动力学”。

随着科学的发展,在微观世界的研究中,又提出了许多新课题:在宇宙线里和高能加速器中,相继发现了一大批“基本粒子”,难以用经典物理学来解释。这些“基本粒子”令人眼花缭乱,难以理出头绪。

在世界各国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人们把原子中的各种粒子分成“轻子”和“强子”两大类。然而“强子”又可以再分割。那么,究竟是什么构成物质的真正“基本粒子”呢?弱相互作用(作用于所有强子、弱子)和强相互作用(仅仅作用于强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两种相互作用同万有引力以及电磁作用四者之间,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1963年,青年科学家盖尔——曼提出“夸克”论。中国大陆的一些高能物理学家在此时期提出了“层子”学说,内容与“夸克”不谋而合。盖尔——曼设想强子是由上、下、奇3种“夸克”的不同组合构成的。

丁肇中通览了物理学发展史后,看清了自己要走的路。对于他来说,近代物理学就象是一个大旋涡,其中心部分就是实验高能物理学。越接近这个旋涡的中心吸引力就越大,丁肇中就越离不开它。

于是,丁肇中带着这些问题,在瑞士、德国、美国反复做实验,悉心研究。

发 现

1972年,丁肇中向布鲁克海文国立实验所提出了寻找新粒子的计划。由于这一实验费用多、难度大,所以,他的计划一出台,便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责难。

“即使丁肇中的实验能够搞起来,也没有什么价值。在丁肇中计划实验能量区域内,新的长寿命的重粒子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是一般教科书上的常识”。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这样断言。

“丁肇中的实验纯属劳民伤财,在他那个实验能量区域内,即使有什么新的粒子出现,也不过是些宽度很大的粒子。”又一位权威的物理学家给他泼冷水。

翻开科学史,研究一下那些给人类以光明和智慧的盗火者们所经历的磨难,你就不得不承认:对于人才来说,逆境往往如同命运之神特意安排的一段里程那样,苛刻地检验着每个立志有所作为的人,检验着他们成才的勇气、信心和素质。

对于来自各方面的非难,丁肇中毫不示弱。他对那些权威们说:“先生,这不是不懂常识的问题,而是要靠事实来回答的问题。什么叫常识?常识就是不经证明而常常引用的知识。一个人不可不懂常识,但是过分迷信常识的科学家,往往就会错过一些重大发现的机会。”

丁肇中坚信自己的预见,决心

向常识挑战。他再三告诉自己的实验组成员：“不要管反对意见是多么不可一世，决不要放弃自己的科学观点，要毫不胆怯地迎接挑战，要始终坚持对我的科学观点的探求。”

事实证明丁肇中的观点是对的。 J 粒子的发现，在当时物理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件意料不到的事，使实验物理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都大为惊异：现有的基本粒子理论中出了一个漏洞，为什么先前没有预料到它的存在呢？此刻，那些曾经嘲讽、攻击过丁肇中的权威们，在事实面前，也只好认输了。

心 声

按照惯例，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获奖者要用本国语言发表演讲。丁肇中是美籍华裔，因此，在授奖典礼上，他必须用美国语言——英语发表演讲，以前的美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无法打破这一惯例。

但丁肇中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后代，只不过是美国的土地上出生而已。他决心实现自己的愿望：让中华之声响彻诺贝尔奖授奖大厅。

于是，他向瑞典皇家科学院请求：在授奖仪式的即席演讲中，先用中文讲，后用英文复述。

当时的美国政府得知此事后，曾竭力阻挠。但丁肇中坚持己见的性格促使他去据理力争，终于获准。

1976年12月10日下午4时许，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内，丁肇中跟其他诺贝尔奖获得者一道，在受奖席上就座。他抬眼望去，只见主席台前，大厅两侧都摆满了鲜花，好象绚丽的彩霞落到了人间；能容纳2000余名观众的大厅内，坐满了外国来宾、瑞典社会

名流；大厅门口，挤满了头戴白帽、手持彩旗的由大学生组成的欢迎队伍。

军乐队奏起了瑞典王室音乐，典礼开始了。

诺贝尔奖基金会主席简要地介绍了丁肇中的贡献后，在庄重、悦耳的王室音乐中，丁肇中精神抖擞地走到讲台中央扩音器前，用流利的汉语讲道：

国王、王后陛下、皇族们，各位朋友：

得到诺贝尔奖，是一个科学家最大的荣誉。我是在旧中国长大的，因此，想借这个机会向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们强调实验工作的重要性。

中国有句古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种落后的思想，对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们有很大的害处。由于这种思想，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学生都倾向于理论的研究，而避免实验工作。

事实上，自然科学理论不能离开实验的基础，特别是物理学更是从实验中产生的。

我希望由于我这次得奖，能够唤起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们的兴趣，而注意实验工作的重要性。

大厅里回荡着丁肇中那浑厚的声音，他是在用汉语作激动人心的演讲。自诺贝尔奖1901年问世以来，在500多位获奖人中，第一次用中国人民的主要语言——汉语在这里发表演讲。台下2000多位来宾，并没有因为听不懂汉语而不满，恰恰相反，大家都在全神贯注地听着，而且对这位杰出的中年物理学家更增加了敬佩之情。

此刻，坐在主席台上的一位白发苍苍的中国老人，禁不住热泪盈眶，他就是丁肇中的父亲丁观海。他是专程从台湾赶来瑞典参加儿子受奖仪式的中国老工程学者。

丁肇中在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如愿以偿地抒发了作为中华民族后代的自豪感。此情此景，令当时的每一个中国人激情澎湃，永生难忘。

这短短200来字的讲演，令人耳目一新，却又言简意赅：它既包含了丁肇中二三十年来对人生、对科学的真知灼见，又包含了他对中华民族、祖国母亲的赤子深情。无怪乎丁肇中话音刚落，全场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奋 斗

200多年前，物理学的伟大鼻祖牛顿说过：“我不知道后人怎样看我，但在我看来，我只是象一个在沙滩上玩耍的男孩，一会儿找到颗特别光滑的卵石，一会儿发现一只异常美丽的贝壳，就这样使自己玩乐消遣；而与此同时，在我眼前的真理的汪洋大海，我尚未认识，尚未发现。”

那还是在诺贝尔奖授奖会的当天晚上，在欢声笑语、灯光辉煌的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都会大厅内，在人们频频举杯和祝贺声中，丁肇中谦逊地说：“ J 粒子也不过是真理大海海滩边一颗光滑的卵石罢了。”他在接受大众的欢呼之际，更体验到了牛顿这段名言的真谛。

是的， J 粒子把丁肇中送上了荣誉的顶峰，但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到了科学事业的至高点。世上还有众多奥秘有待于人们去揭示，还有无数的真理有待于人们去认识，丁肇中认识到自己任重而道远，一个又一个的科学堡垒等待自己去攻克。

近年来，丁肇中率领实验小组，在德国汉堡的电子同步加速器中心的佩特拉正负电子对撞机上做实验，寻找把“夸克”结合在一起的物质——胶子存在的证据；在

瑞士日内瓦“莱普”正负电子对撞机上作实验，寻找第6个“夸克”——“顶夸克”（七）、中间玻色子等新粒子。他还要寻找自然界的4种力（万有引力、电磁力、弱力和强力）之间存在联系的实验证据。他为自己确定了艰巨的道路，并将坚定地走下去。

乡 情

身在大洋彼岸的丁肇中，心中却常惦记中国的亲友和故乡。

1977年8月，十年动乱结束了，中国各条战线都在拨乱反正。我国有关部门准备大力发展高能物理，而这又急需一批实验人才。为此，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邀请丁肇中来华访问。接到来自祖国的邀请，丁肇中立即放下手中紧张的科研工作，启程回国，去为父母之邦的振兴贡献一份力量。

丁教授与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副院长吴有训进行了会谈，具体讨论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问题，决定实现中美科学技术史上的首次大规模合作——由中国科学院选派最有培养前途的青年物理学家参加丁肇中领导的高能物理研究工作。会谈的结果，使丁教授十分兴奋，他激动地说：“我这次来中国参观，看到大家很有干劲，都想把科学技术搞上去。我相信，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搞科研的历史这么久，一定会出人才，会很快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的。”

5个月之后，27位平均年龄不到40岁的中国年轻的物理学工作者，远涉重洋，来到了位于德国汉堡的电子同步加速器研究中心，参加丁肇中教授领导的马克——杰实验小组的科研工作。

这27位中国物理学工作者，大多是从低能物理转过来的“新兵”，对高能物理实验尚未入门，英

语又未过关，可以说，一切都还得从头学起。而且，他们对实验室的紧张工作又不适应：每天要做十几个钟头的实验，既没有午休，又无周日。因为丁肇中领导的这个实验小组，比起其它实验小组要晚一年多时间才开始，因此要求全组人员要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两年的工作量。

丁教授了解到中国物理学工作者的困难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起初，将中国科学家跟外国科学家混编在一起，以便于中国同事更好地学技术、学外语，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再把中国同事抽出来单独分配任务，在真刀真枪的实干中培养他们独立工作的能力。

丁教授现身说法，以自己发现J粒子的过程来教育大家：“我做了10年矢量介子实验，才从上百亿个各种各样的粒子中找到一个J粒子。这就好象在北方地区下了一场倾盆大雨，我从无数雨点中辨认出一个带颜色的雨点那样困难，不能允许有丝毫的松懈和马虎。”

在丁教授的具体指导下，中国物理学工作者牢记祖国的嘱托，面对困难，毫不气馁，更不退缩，咬紧牙关，迎着困难上。为了尽快掌握计算机程序的设计方法，他们甚至连赶路、吃饭时也在思考琢磨问题。夜深人静，外国科学家早已进入了梦乡，而同样紧张工作了一天的中国物理学工作者，拖着疲惫的身体，还在一遍遍地演算、练习着。

功夫不负有心人。多少个不眠之夜过去了，中国科学工作者硬是凭着为科学献身的精神，用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基本上闯过了“语言关”；用两三个月的时间，就会操作每秒钟运转几百万次的大型计算机，能独立工作了。

在中外物理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丁肇中领导的实验小组，

第一批数据就得到了446个强子事例，这一实验结果比其他组几乎多了一倍。

1979年9月，丁肇中来华进行科学讲学和学术交流，在与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三强会谈时，丁教授对中国选派的青年物理学工作者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个人的印象是，中国物理学工作者是勤奋的，富有创造力的，他们在实验的各个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要是没有中国物理学工作者的努力，我们的工作不可能做得象现在这样好。”

这27名中国年轻物理学工作者回国后，已成为我国高能物理研究领域的骨干、带头人。而且，在丁教授的具体指导下，一座大型的高能加速器——正负电子对撞机在北京西北郊建成了。这座由邓小平同志题名奠基的“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正在为我国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服务。

1982年大年初一晚上，丁肇中夫妇应邀来到纽约市银宫酒楼，跟旅美华侨、美籍华人一道欢度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春节。会上，华人协会代表给丁肇中颁发了“最杰出人物”奖状，以表彰他杰出的科技成果荣获了诺贝尔奖，为中国人争得了最高荣誉。

在颁奖会上，丁肇中激动地说道：“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科学探索和发现精神的奖励，这种精神鼓舞我努力去认识物质世界，发现大自然的奥秘。”

2月15日，北京。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了。颐年堂里，中国领导人感谢丁肇中为发展中国的科学事业做出的贡献，希望中外科学家团结协作，广泛开展国际性的科技交流，共同为造福人类作出贡献。

丁教授表示：“我很乐意为中国科学现代化贡献我的一份力量。我热切希望中国年轻一代能迅速成长，能出现一批真正的‘科学巨人’”。

1982年春节过后，丁肇中来到中国合肥，愉快地接受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名誉教授的聘书。随后兴致勃勃地与该校的少年大学生们进行了交谈，以启发他们的思路，开阔他们的视野。他说：

“我一生所学的可以归纳为：准确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一个学科，透彻地理解它，摒弃一般流行见解，坚持自己的科学观点。对自己的成就要有所怀疑，十分仔细地进行验证自己的工作。比如，当我们实验小组发现了新的重粒子（J粒子）之后，我要求实验小组成员对外界绝对保密，必须再次核实这个实验，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越是重大的发现，越是要慎重、周密。于是，我们用了两套截然不同的方法来检验新粒子，两组人员，两种步骤，两组数据……终于得到完全相同的结论后，我才对新闻界发布消息。我认为：只要你肯干，肯自强，一个普通人也可以有伟大的成就。”

丁肇中教授还回答了少年大学生关于“治学方法”的提问。他说：“一般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里，考试成绩很好，可是出了校门去做研究题目，并不是特别超越于其它国家的学生。我想，造成这样后果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学生喜欢背书，喜欢死记。须知从事科研工作以后，背书和死记就没有用了。我认为，一个中学生如果对自然科学有兴趣，就应该彻底了解书本上、课题上所说的东西与课外自然现象之间有什么联系，而不要完全背书，死记公式。须知死记公式、完

全背书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丁教授又来到科大教师中间，与他们进行了座谈。他说：“有些教授喜欢把研究生留上七八年，我认为这样做不好。因为一个学生从任何一个人那里学到的东西都很有限。所以，我让学生在在我这里学习两年就毕业，两年时间已足够了。况且学无止境，学生毕业之后难道就不需要继续学习了吗？”

在与科研人员座谈时，丁教授深有体会地说：“作为一个科学家，最重要的是不断探寻教科书之外的事，对该学科有更深入一层的理解，有能力去独立思考各种物理现象的本质，面对占压倒优势的反对意见，要毫不胆怯地迎接挑战。”

近年来，丁肇中更是热心于祖国高能物理人才的培养，经常回中国讲学，并选拔国内的优秀人员到他的实验组工作。他还被聘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境 界

丁教授是一位非常珍惜时间的人。以前，由于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德国汉堡、瑞士日内瓦都有实验室，而家在美国，他几乎每两星期就要飞越一次大西洋。为了便于适应时差，他每天清晨5点多钟便起床，深夜才就寝。每天的日程都排得很满。正因为如此，他的孩子们抱怨老是见不到爸爸。近年来他转移到日内瓦附近工作。为了不与家人太疏远，已举家搬到瑞士。但这已太迟了。因为小孩都已长大，有自己的事业和学业。爸爸想见他们反而又见不着了。

他对工作历来一丝不苟，从不马马虎虎。他非常讨厌懒散拖拉的作风。在他身边工作，稍有松懈，就会遭到他严肃的批评。有些人开始

对此不大习惯，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绝大多数人都为此而高兴，因为这种战斗作风是科学工作者取得成绩的基本条件之一，更何况他对自己也是同样严格要求的。他常常因工作忙而不能回家。他多少次想去访问祖籍山东省日照市，可是因为工作的需要，一推再推，迄今未能如愿。

丁教授的知识渊博而又精力充沛。他每天要埋头在实验室里十几个小时，但精细而又枯燥的实验并没有弄皱他的面庞，染白他的头发。他说：“我完全靠工作来激发充沛的精力，工作就是我的兴趣，兴趣使我不会疲倦”。他成为著名科学家，仍谦虚好学，不耻下问，这是十分难得的。

他对生活非常热爱。有一次，当记者问他时，他笑嘻嘻地说：“我不是没有嗜好，我最爱吃中国的美食。在欧美常有中国食品，但我从没有吃过象香港和国内那么好的”。

在瑞士日内瓦高能物理加速器那庞大的装置中，丁肇中要模拟地天初开时的一刹那：宇宙爆炸、星际间布满炽热星尘，他要研究此刻的地质结构变化和物质间的相互作用。这一实验的费用由13个国家联合负担。光在这个研究小组里，就有400多位优秀的高能物理学家，还有1000多位工程技术人员。丁肇中要在理想的环境中，将约十亿伏特的电子输入粒子加速器，再和同样高压的反电子相撞。电光石火在一亿分之一秒内撞击，足以产生惊天动地的变化，发出的高温相当于太阳表面温度的几百亿倍，完全是宇宙开始的条件。预料这一实验结果公布后，将是粒子物理学上的又一惊人发现。

（责任编辑 舒元璋）

巾帼大使施燕华

● 宗道一

1994年11月26日，江泽民主席任命外交部前翻译室主任施燕华为驻卢森堡大公爵特命全权大使。刚好两个月以前，施燕华的夫君、前外交部发言人吴建民走马阿姆斯特丹。在新中国驻外大使的长长名单上，夫妻双双属兔的吴建民和施燕华分别排在第531位和第537位。他俩是近150位现任大使中唯一的一对现任“夫妇大使”。

外交情侣

1958年盛夏，勤奋好学的上海姑娘施燕华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她的整个风华正茂的少女时代，是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度过的。1963年初夏，临近毕业时，她又遇上了一个好机会：全国高等院校第一次正式招考研究生，她跃跃欲试，并在两个月后一举冲刺成功！

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寒窗攻读的7年中，施燕华还没有来得及在母校拿到硕士学位，便被派到外交部教育司翻译处“实习”。稍后，她又被借调到团中央，参加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筹备工作。遗憾的是一切筹备就绪，即将出发时，阿尔及利亚国防部长布迈丁联合军方发动政变，即将在此召开的世界青年联欢节遂成泡影。

施燕华没有马上回外交部，继

续留在团中央参加接待外宾工作。感谢上苍赐予这短短而宝贵的数十天，使得施燕华能与同年8月底刚从布达佩斯离任归来的吴建民在团中央邂逅相遇。一个月后，当吴建民被调到外交部时，施燕华也扛着铺盖卷儿来到外交部的教育司翻译处正式报到。这一切就象月下老人在暗中牵线一般，简直是天作之合。人生的历史就这样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施燕华不久就担任了翻译处的团支部副书记，而书记就是吴建民。类似的家境，相同的“地缘”，共同的爱好，使得两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不用表白便很快地走到一起。很快就水到渠成，瓜熟蒂落。1967年2月27日，吴建民、施燕华喜结良缘。

“受伤的鸭子”

在迄今为止的30年外交生涯中，施燕华与翻译室结下了不解之缘：“三进三出”，度过了三分之二的难忘而美好的岁月。她从一个普通译员升迁到一室之长；从清纯少女，步入人生之秋，她在这里成长成熟，走向辉煌。

施燕华到外交部后的第一次翻译工作，是为一次招待外国领导人的盛大宴会翻译菜单。初出茅庐的施燕华来到灯火通明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怀着兴奋的心情欣赏

涉身外交以后的“处女作”——那摆放在宴会桌上的一张张译成英文的精美菜单。施燕华曾为这项简单的工作付出了许多心血与时间，但是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就在宾主入席、宴会正式开始前后，不少来宾在席间交头接耳，窃窃私议，有的甚至发出轻微的笑声。让外国客人发笑的就是施燕华精心炮制的“杰作”——那张菜单！从他们相视而笑的神情中并不难发现，老外的注意力不在玉盘珍馐、美味佳肴，而正是那张菜单！忐忑不安的施燕华随手拿出一张菜单琢磨。不看犹可，一看菜单施燕华就傻眼了，窘得她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原来她把菜单中的一道“罐焖鸭”（brise duck）译成了“受伤的鸭子（braise duck）”。这显然是粗心大意的过错！施燕华呆住了：真没有想到错了一个字母（将“u”打成了“a”），就出了这么大的洋相！脸上火辣辣的施燕华不知所措，她一个劲儿地埋怨自己为什么不仔细一点，多检查几遍。现在后悔也没有用，白纸黑字放在那里。施燕华难过得几乎要掉下眼泪……。

那只“受伤的鸭子”好象发出“呷呷”的叫声，时时在提醒施燕华：外事无巨细，外交无小事！施燕华从此明白：在翻译中，哪怕是点滴疏忽都会造成不良影响，甚至



1967年于北京农展馆前吴建民、施燕华（右）夫妇新婚留影

后果不堪设想。

施燕华就这样在翻译处揭开了30年外交生涯的序幕，开始了她不平常的历程。在漫长的外交生涯里，施燕华曾两度供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历任随员、三等秘书、参赞等职，还曾出任布鲁塞尔中国大使馆、驻欧共体使团的政务参赞。但是，施燕华在逝去的岁月里，从朝霞般绚丽的少女时代到硕果累累的人生之秋，她有20年——相当外交生涯的三分之二的时光在翻译室度过。那些美好的过去可以用“三进三出”翻译室来概括。1965年9月一进翻译室（处），然后到1971年11月离开去了联合国。1975年2月施燕华离任纽约重返翻译室，这一呆就是10年！然后又先后常驻纽约、布鲁塞尔。1990年底离任返国的施燕华第三次来到翻译室，继王弄笙后出任翻译室主任。4年弹指一挥，施燕华被任命为驻卢森堡特命全权大使——这是80年代初期丁雪松出使阿姆斯特丹以来新中国第17位女大使。

给周总理当翻译

施燕华很难忘怀1967年8月25日晚上周恩来与杜波依斯夫人的会见，这也是她译员生涯中第一次为周恩来当翻译。乍听到这一消息，施燕华又激动又紧张。她听许多老同志说过，总理的英语水平很高，如果翻译有误，他就会毫不客气打断翻译，当场予以纠正。但是施燕华听到的几乎都是热情的鼓励。翻译处的一些老同志说：“总理虽然要求严格，但是通情达理，对女译员特别是刚参加工作的女孩很宽容。你要树立信心，尽管放开胆量！”施燕华很快平静下来，自己为自己壮胆。

尽管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但是，当施燕华跨进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的时候，心情蓦地紧张起来，毕竟是第一次给周总理当翻译呀！风度翩翩、神采飞扬的周总理迈着轻捷的步伐进来了。宾主落座，稍事寒暄。屏住气息的施燕华几乎可以听见神态安详、笑容可掬的周总理的呼吸声。施燕华定下心来，微微

抬起头，周总理风度端凝，衣冠整齐，连他老人家刚刚刮过胡须、微微泛青的脸都看得清清楚楚。想到自己竟坐在敬爱的总理的身后，一股暖流不禁涌上心头……

数十分钟的会晤很快结束了，宾主起立合影留念。大汗淋漓的施燕华如释重负，长长地吁一口气。她收拾好东西，知趣地退到一边。“过来！过来！……”周总理大声向施燕华招呼。就这样，26岁的年轻女译员和中国总理、和杜波依斯夫人一起，永远留在了那张现在已经微微泛黄的照片里，也永远留在了自己美好的回忆里。

送走客人后，周总理转过身来亲切地对施燕华说：“你这位小姑娘翻得不错嘛！你是什么地方人啊？”

“祖籍浙江，生在上海。”施燕华有点腼腆，似乎还有点忐忑不安。见过总理好几次了，可是这次是面对面。

“这么说，我们还可以算是半个老乡喽！”周总理笑了起来，“外交部为啥多江浙人啊？”祖籍绍兴、生在淮安的周总理朗声笑了，他自己也是地地道道的江浙人啊！

临别时，周恩来亲切勉励施燕华：“……以后要继续努力！”

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就这样记住了施燕华，一位普通的年轻女译员。没隔多久，周恩来参加几内亚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卡马拉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不少亚非国家的来宾和驻华使节都来参加。中国外交界出类拔萃的首席英语译员冀朝铸担任周总理的英语译员。宴会结束后，周恩来总理叫住了参加翻译工作的施燕华，对冀朝铸说：“这个女孩子翻得不错，挺清楚的，就是调子平了点，不大有起伏，你们好好辅导辅导，帮助帮助……”

日月如梭，一晃8年过去了。施燕华最后一次见到敬爱的周总理是1975年7月1日在北京301医院。那一天，周总理和泰国总理克立·巴莫亲王在这里签署两国政府联合公报，决定自即日起中泰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签字仪式上，施燕华就站在第二排最边上，她俯首凝视着头发花白、苍老衰弱的周总理缓缓戴上老花眼镜，用瘦骨嶙峋微微颤抖的手在两国政府建交联合公报上签下“周恩来”三字，然后与克立·巴莫亲王等泰国贵宾一一握手……。目睹晚年重病的周总理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伤心动人一幕，施燕华的胸中涌动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情感。

签字仪式结束后，心潮起伏的施燕华欲随泰国贵宾悄然退出，但是周总理还是叫住了她：“施燕华，你回来了（指从纽约回来）？什么时候回来的？我还没有跟你握手呢！……”面对年近80高龄，重病缠身的总理温暖嘘寒，心意终难平复的施燕华心情特别激动，连声说：“总理，您好！……”施燕华万万没有想到敬爱的总理早已身患绝症，六个月后就永远阖上了他那双充满智慧的双眼！外宾相继登车，施燕华再也无法与总理多说什么。“总理，请您多保重！……”施燕华匆匆与总理握手道别。临出门前的那一瞬，施燕华看到敬爱的总理，慢慢抬起那只微微弯曲的伤臂，如同雕塑般屹立着。

给邓小平当翻译

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施燕华以译员身份参与了大部分美国要人访华的接待工作。她几乎担任了所有邓小平与美国政要会见的译员。不仅如此，施燕华还多次随邓小平出访，从仰光、加德满

都，到曼谷、马尼拉、吉隆坡，一直到华盛顿、亚特兰大、休斯敦、西雅图，都曾留下她风尘仆仆的足迹。多年的接触和相处，施燕华对邓小平的气度胆略、性格魅力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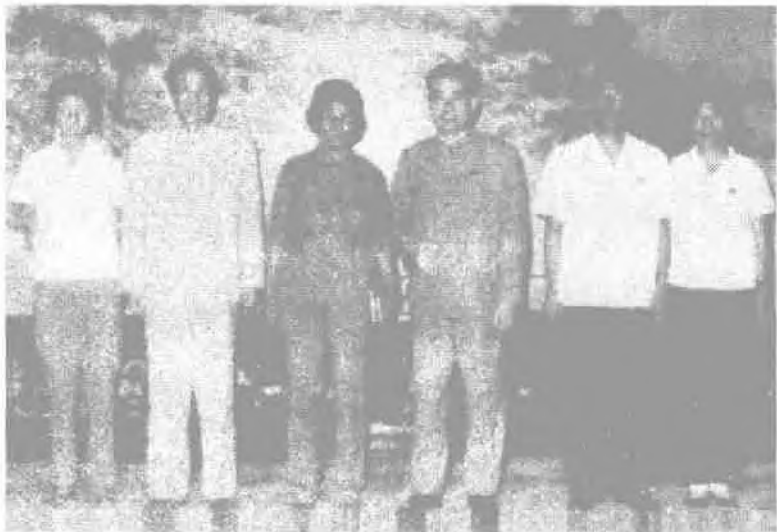
在不少工作人员眼里，邓小平比较严肃，不苟言笑。也许是相处时间长了，施燕华感到邓小平并不如此。虽然他平时习惯于沉思静想，但是平易近人，颇有人情味。在施燕华的记忆里，如果隔一段时间两人重新见面时，邓小平总是会亲切地对施燕华说：“小施，我们有好长时间不见了！”进餐时，邓小平总是把自己那份冰淇淋让给施燕华，他知道女同志多数爱吃甜食。有时，邓小平也会跟施燕华开开玩笑。他曾对怕辣的施燕华幽默地说：“吃些辣子好，不辣不革命噢！”在吃辣椒的问题上，邓小平与毛泽东是“英雄所见略同”。

刚刚粉碎“四人帮”那时，著名喜剧大师王景愚搞了个讽刺喜剧《枫叶红了的时候》，在社会上引起了争议。一次会谈结束后，邓小平随意问道：“小施，《枫叶红了的时候》你看了没有？……”从说话的口气中，邓小平显然还没有看过这个讽刺剧，他只是从侧面听到关于这个剧本的一些议论。“你觉得怎么样？”邓小平继续问道。“现在有些不同意见。”施燕华如实回答。“不要过早下结论，文艺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在施燕华的印象里，邓小平与外国领导人、各界名流的谈话没有一句废话，“在我看来，每一句都很重要，都很有份量，使我们工作人员受到启发，学到不少东西。”施燕华在多次接受笔者采访时深有感慨地说。令施燕华终生难忘的是邓小平与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女士的两次极为精采的谈话。

一头金发、不施粉黛的法拉奇，虽然矮小，其貌不扬，但是采访中她却思维敏捷，谈锋犀利，往往单刀直入，紧逼要害，显示出咄咄逼人、才华横溢的独特个性。三十余年的记者生涯，她的采访经历已成为六七十年代世界诸多的激烈战争的历史见证人，曾获圣文森特新闻奖等一系列殊荣。

一头金发、不施粉黛的法拉奇，虽然矮小，其貌不扬，但是采访中她却思维敏捷，谈锋犀利，往往单刀直入，紧逼要害，显示出咄咄逼人、才华横溢的独特个性。三十余年的记者生涯，她的采访经历已成为六七十年代世界诸多的激烈战争的历史见证人，曾获圣文森特新闻奖等一系列殊荣。



周恩来会见杜波依斯夫人（左三）左一为施燕华，左二为楚图南

1980年8月21日下午,邓小平第一次会见奥琳埃娜·法拉奇。法拉奇果然名不虚传,锋芒凌厉。

“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永远保留下去。……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永远不能抹杀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大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

“为什么周总理一直在台上,一直在掌权?虽然有的时候他也处在很困难的地位,但他又不能纠正当时那些错误?”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是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住了相当一批人。”

“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打多少分?”

“零分以下。”

“你對自己怎么评价?”

“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

不论记者怎样挑刺,邓小平都干脆利落,真诚坦率,不回避问题,没有外交辞令。这使法拉奇非常敬佩,叹为观止。

事后,据施燕华回忆,这位对基辛格博士都不佩服的女强人,由衷地对人言:“我见过那么多的领



邓小平拜会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施燕华(中)作译员

导人,邓小平先生给我的印象最深。他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人,性格很不寻常。我很喜欢邓小平先生。……”法拉奇还说:

“有一次,邓小平问我:‘你对你父亲也这样说话?你父亲会不会给你一记耳光?’我回答说:‘我父亲不敢那么做。如果他真敢打我的话,我就去叫警察。’邓小平听后笑了……”

几个月后,当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访的佩尔蒂尼总理握手时,真挚地说:“你们意大利有一位很伟大的女性,一个很伟大的法拉奇!”

作为英语译员,施燕华不仅对邓小平两次长达6个小时的精辟谈话大长见识,大开眼界,而且也对法拉奇这位文坛女杰的过人才华,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知之甚深,饶有感触。

法拉奇采访结束后,施燕华与她在北京民族饭店二楼一个闷热的房间里整理谈话记录稿。

法拉奇在谈到写作时曾说过,她每写一部书就进入一种疯狂的状态。这种“疯狂”,真让施燕华吃

足了苦头。在整理、校对记录稿的两天里,法拉奇根本不让施燕华有喘息的机会,她废寝忘食。法拉奇发疯般地工作,她象一只上足了发条的钟表,不停地走动……

法拉奇回到纽约后,一直记得施燕华当年对她采访工作的卓有成效的配合。5年后,施燕华再度随吴建民任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不忘旧情的法拉奇,托亲友给施燕华送来一本令世界众多读者爱不释手的《风云人物采访记》。令人感到几分遗憾的是这是意大利文本。“这老太太大概忘了我是搞英语的。……”回首往事的施燕华,不无幽默地自我解嘲。

(责任编辑 舒元璋 丁 未)

康熙 和平统一 台湾



● 陆茂清

在封建帝王中，康熙皇帝不失为雄才大略的英明之主。和平收归台湾，使海内外归于统一，是这位政治家的卓著功绩，值得大书一笔。

力排众议 降旨收复台湾

1662年，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回台湾。也就在这一年，郑成功不幸病逝，由他的儿子郑经继延平郡王位，继续治理台湾，与大陆上的明清政府分庭抗礼。十余年间，尚算政通人和。至1681年，郑经去世，其长子郑克塽监国，诸弟不服，爆发内讧，同室操戈，互相杀伐。最终是大将冯锡范兄弟击杀郑克塽，拥立郑克塽登位称王。然经此次变故，使台湾国力衰竭而人心离散，一些文臣武将以为孤栖岛上前景黯淡，终非长久之计，愁苦彷徨之余，纷纷逃离台湾，或隐居不出，或归顺清廷。郑克塽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困境。

看海峡彼岸，康熙帝用武力征

服江南后，转入文治，奖励农桑，兴修水利，发展经济，安定民生，逐步缓和了满、汉矛盾。削平“三藩”，平息准噶尔叛乱后，中央集权进一步巩固，而收复台湾、统一全国成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且已至时机。康熙于是着手收复台湾准备，他将此事作为三大政事之一，书写宫中楹柱之上，以示重要而亟待办理。加封靖海将军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令打造战船，操练水师；又令福建总督姚启圣筹集粮草，随时准备跨海东征。

朝臣中，以户部尚书梁清标为首一千人，反对进取台湾。理由是台湾孤悬海上，属荒芜不毛之地，得之无所利，不得无所损；又“三藩”初平，宜休养生息，不应再开征战。时恰天空彗星出现，梁清标便以此为藉口，称天现彗星，属不祥之兆，是天不令攻台湾。

康熙帝力排众议：“台湾属国土一方，必应重置大清管辖之下，若不及时回归，恐再为外夷所侵，朕主意已决，必取台湾！”

先克澎湖 郑氏请求归降

清军欲挥师东进的消息传到台湾。郑氏甚为惊恐，召会群臣，商讨对策。朝臣见地几乎一边倒，即台湾一隅之地，将寡兵微财乏，战，必败无疑。据此，有奏请归降清廷；有奏请如琉球、高丽那样，对清廷年年进贡，岁岁来朝，以大国待清朝。郑克塽采纳了后者意见，派专使投书清廷，表示愿称臣入贡，但不受管束。

这显然是企图使台湾脱离中国而独立存在的主张。康熙帝洞察郑氏不良用心，坚持台湾受制于朝廷，断然拒绝了郑的要求。

归降不愿，独立存在又不许，郑克塽无奈何作背水一战，求侥幸取胜。

公元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夏六月，康熙帝降旨进取台湾。施琅统率战船三百，水师精锐二万，由福州下海，扬帆直逼澎湖列岛。

澎湖系台湾屏障，清军欲取台

湾，必先攻占澎湖。郑克塽将可调之兵运往澎湖，令大将刘国轩据守狙击。刘国轩也算用心良苦，沿海塘筑壁垒数十里，在滩头、港口设置重重障碍。

施琅本是郑氏旧将，因意见不合分道扬镳，投奔清廷。此人不只熟习水战，而且尽知台湾、澎湖沿岸水陆地形。阴以“水鬼”排除水中障碍，趁夜幕驾轻舟直进，袭取了虎井、桶盘两小岛，以资前哨据点。

初战告捷，清军士气大振。刘国轩候准大潮汛，以56船分8队在前，80船在后作第二梯队，直扑虎井、桶盘两岛，岛上的清军，则从侧面迂回。鼓角齐鸣，杀声震天，一场攻坚战展开。刘国轩亲冒矢石，横枪挺立船头，带头冲杀，虽面中冷箭鲜血淋漓而不顾。将士倍受鼓舞，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义无反顾。几经争夺，清军终于登岸。郑氏兵本惧清军勇武，士气低落，见前沿已失，不战而退，纷纷溃逃。清军乘胜追击，斩杀、生俘敌军无数，焚毁敌船百余条。

前后经七天战斗，澎湖列岛尽为清军占领。刘国轩回天无力，驾小舟只身逃回台湾。

屏障澎湖已失，又精锐丧尽，郑克塽束手无策，权衡再三，作出明智抉择：顺应时势，归降清廷。遂遣使至施琅军前，请求投诚。

施琅不敢擅作主张，暂且按兵不动，飞马入京，奏请康熙帝定夺。

捐弃前隙 勿以刀刃相加

金銮殿上，百僚毕集，几个满族大臣力主乘胜直捣台湾，灭郑氏九族，以报往日之仇。先前清军进兵江南时，郑成功举兵鼓浪屿抗清，率兵三次北伐，兵锋直逼金陵古城。后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攻取台湾，继续与清廷对峙。“三藩之乱”

时，郑氏又举兵响应袭扰福建沿海城镇。

康熙帝不愧为英明之主，告诫臣下云：“君子以德报怨，不可耿耿于怀于旧隙。台岛兵民同为炎黄子孙，理应咸登衽席，共乐昇平。今彼既愿臣服，何忍再以刀刃相加？”他决定把握这一大好时机，以和平方式使台湾回归，于是颁发了一道恩威兼施的谕旨：“澎湖已克，台湾荡平似秋风之扫落叶，如能诚心归降，则既往不咎，可将前罪尽行赦免，仍加恩安插，务令所得”。

再说郑克塽虽称归降，却又忧心忡忡，盖为郑氏与清廷相互敌对二十余载，结仇深远。又进取台湾的统帅施琅，当年愤而离台后，其父兄子弟，被郑氏悉数处死。故郑氏害怕施琅必报此仇，致毒于郑氏一门。

康熙帝备知细底，行动在先，降旨施琅，郑重告诫：“务以军国大计为重，切勿公报私仇。”

施琅不只英勇善战，且通识大体，传书郑克塽，转达康熙帝的旨意后，表明心迹：吾此举上为朝廷，下为黎民，若能衔璧来归，当谨遵圣意赦之，万勿以为琅为报老父子弟之仇，而行不义之举。

紧接着，施琅下令对被俘郑氏官兵，给常人生活待遇，务使吃饱穿好，受伤的给予治疗，愿回台湾的，悉数放归。意在以实际行动，使郑克塽消除疑虑。

海不扬波 台湾 和平回归

清政府的友善举动，使郑克塽心始稍安。七月十五日，郑克塽派冯锡范送降表至施琅军中，请王师进驻台湾。施琅设盛宴款待，倾心交谈，大见隆重。冯锡范回台复命，报告一切，郑克塽由是疑虑全消。

8月11日，清军从澎湖起程东

进，海上樯帆蔽日，旌旗似云，一派威武景象。兵至台湾鹿耳门，因汛小汛水浅，船不能入。出乎意料，次日潮水骤涨数尺，军民百姓无不惊奇，说当年郑成功收复台湾，也是这般情景，咸称台湾回归乃是天意！

清军舰船缓缓驶进港湾，水下水上鼓乐齐鸣。郑克塽率文武百官，穿戴清朝服饰，恭候岸上，迎接施琅上岸，缴上延平郡王印玺，献上台湾疆域图册。施琅当众重申了康熙帝圣命，并约束所部秋毫无犯。

台湾各族人民欢欣雀跃，扶清朝旗号，壶浆相继于路，以迎王师。

台湾和平收复的捷报飞传北京，时正值中秋佳节，康熙帝不胜欣慰，当即蘸墨挥毫，龙飞蛇走，作《中秋日闻海上捷音》诗一首，记此盛事：

万里扶桑早挂弓，水犀军指岛门空。

来庭岂为修文德，柔远初非黜武功。

牙帐受降秋色外，羽林奏捷月明中。

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

康熙又赋诗表彰施琅：

上将能宣力，奇功本伐谋。

伏波名共美，南纪尽安流。

不日，郑克塽偕家小、僚属至京，康熙帝殿上召见，好言抚慰，嘉勉有加，授郑克塽公爵，隶汉军正红旗；刘国轩、冯锡范等军政要员也都封爵加官，量才录用。又在台湾设置府衙，下置三县，派兵守备。

康熙帝的英明决策及恢宏胸怀，在海不扬波、刀不沾血的情况下，使与大陆各自为政22年的台湾，和平回归祖国怀抱，重又成为中央管辖下的一个行政区。

（责任编辑 赵友慈）

曹操性格琐议

● 何轸光

在我国古代历史人物中，曹操是一位具有复杂性格的人。由于曹操一生的经历极不寻常，这就构成了他的性格的多样性和矛盾性：一是极富个性色彩；二是具有双重式多重的矛盾性格。

曹操的个性色彩有一个发展过程。曹操20岁时有幸被举为孝廉，随后做过几任地方官。他为官持法峻刻，不畏强权，很有一股少年得志、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据史书《曹瞒传》载：他最初出任洛阳北部尉时，“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来竟把灵帝宠臣的叔父也给杀了。在任济南国相时，因“长吏多阿附贵戚，脏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免了8个县官的职）；而使“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三国志·武帝纪》曹操因此触犯了不少权贵。可见其年轻时性格不同凡响。

曹操一生特别具有不惧挫折、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坚强品性。鲁迅曾说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可谓时势造英雄，在他身上得到了再充分不过的体现。曹操临近壮年之际，适逢乱世，董卓作乱，一时群豪并起，互相攻伐，汉室名存实亡。他以弱小之军起事，戎马生涯30余载，势力由小到大、由弱变强，逐渐统一了北方，并建立了比较稳固的曹魏政权，且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曹操凭着他非凡的胆识和才略，削平了众多割据豪强，战绩赫然；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政治军事形势尖锐复杂，合纵连横，风云多变，又使他殚精竭虑，鞍马劳顿，备尝艰险。特别是从建安初年到建安十五年间，他先后灭吕布、败袁术、降张绣、破袁绍等，无一不是在多次较量、反复征伐之后才克敌制胜的。

曹操亲自统兵挥鞭征战的经历，在那个时代是任何人都无法与之匹敌的。其间多次被困、受伤，死里逃生，但他从不因此而沮丧沉沦。最初，曹操举义兵伐董卓，众诸侯名为讨卓，实各怀私心，迟疑不前，唯曹操独率弱小之军进击董卓。汴水一战，曹军败北，曹操身中流矢，差点送了性命。不久，他又在扬州举起战旗，与张绣战，军败负伤，长子遇害；可他不服输，后几经

辗转攻伐，终于获胜。赤壁之战，曹军死伤惨重；可未过数月，曹操又在合肥一带整军备战（上事皆见《三国志·武帝纪》，以下凡出此书之事，简称同上）。

曹操敢于冒险，富有勇武精神，这往往是他以少胜多，出奇制胜，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官渡之战。袁绍是北方也是当时最强大的军阀，领有河北、四州之地，兵多粮足；而曹操以弱对强，且孤军远征，粮草不济，一时难以决胜。在进退维谷的紧急关头，曹操亲率步骑五千，偷袭乌巢成功，一举扭转了战局。这一战实在是一次极大的冒险，曹操不但以少拼多，且前后受敌，稍有差池，曹操就不是曹操了（同上）

曹操是实干家，他治国勤政而清廉。他很同情遭受战乱之苦的人民，很重视安抚百姓，抚恤孤寡，减免租赋，以及兴修水利、为民办学。他长于用人，且赏罚严明，奖励功臣，不吝千金。此类举措在他发布的诸多政令中，多有果断有力、切合实际的表述，表现了一代开国之君所特有的“王者之风”。

曹操晚年，他的性格渐趋老成而持重，然而壮志不减当年，所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当时天下既已成三足鼎立之势，孙权、刘备两大军事势力凭险自守，又结盟抗曹。在这种形势下，他特别注重驻兵屯田，以田养兵。这一政策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都不失为一项有战略眼光的进步措施，为发展生产、巩固曹氏政权起了重要作用。此外，他个人生活俭朴，不恋财物，这也为臣下起了良好的表率作用。他在临终遗令中，唯嘱此两件事而已（同上）。

曹操的双重或多重矛盾性格，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奸”与“忠”。小说《三国演义》把他当反面人物描写，着力写他的“奸”，是个奸雄。史书上也说他“奸”。《三国志·武帝纪》开篇写他“少机警、有权术”；《曹瞒传》写他借粮官之头欺瞒军士，斥他“酷虐变诈”，这都是所谓“奸”。他挟天子以令四海，把持朝政；有人抨击他“托名汉相，实为汉贼”，“欲废汉自



立”(《三国志·周瑜传》)。然而，曹操也有大义凛然、忠直不阿的一面。曹操是封建正统思想的受害者，他公开声称生性不信天命之事。为了排除各方面的谤议，他在《述志令》一文中充分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他要是放弃了权力，将对国家、对家庭带来危险的后果。此文对这种处境和心境写得坦白直率，情真意切：“设使国家无有孤家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在曹操时代无有称帝者，他自己也未称帝，实在是有益于“炎刘”。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忠”吧。事实上，他已骑在了虎背上。他曾因得罪了权贵辞官而归，就因为怕祸及家室，不幸后来还是未免此祸。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如果曹操对献帝唯唯诺诺，诚惶诚恐，恐怕他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奸雄，而只能是狗熊了。

二是“宽”与“忌”。曹操在用人和对待人才的态度上，最能说明他性格的矛盾性。他既爱才，又忌才；既然有礼贤下士之举，又有枉杀贤良之误。曹操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人才众多的时代。曹操用人最为大胆，实行“唯才是举”。据《魏书》记载：他发令号召，不问其德行如何，不分家世门第，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评语

中赞曰：曹操“官方授才，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他的著名诗篇《短歌行》，充分表达了思慕贤才如渴的心情。曹操在当时多方势力争夺人才中获得了很大成功，他幕下的谋臣战将人才济济，层出不穷。相比之下，孙权、刘备等人则往往是青黄不接，后继乏人，人才显得十分空虚。同时，曹操对人才又有“性忌”的一面。曹操杀了少数文人名士、有功之臣。如《三国志·崔琰传》载：“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而琰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曹操刑杀人才，虽说都有一定背景，但和他的“变诈”和“外宽内忌”的秉性不无一定关系。它往往使被害者不堪防范而茫然致祸，因而其中不乏冤案，如杀崔琰、娄圭等。也有“允许犯错误”，提出警告后让其改过可不杀之人，如孔融、许攸等。再如杀杨修，起因和主因是杨修令曹操不能容忍地干预了曹氏兄弟权力之争的“内政”。曹操爱杨修之才，委以主簿之职，随从身后；然而对此不予明示，曹植一旦失宠，杨修就因“颇有才策”而见诛（《三国志·陈思王传》第558页）。曹操对人才“耍两面派”若此，同孙、刘相比，未免有“奸诈险恶”之嫌。

三是“负人”与“负我”。曹操逃难时过吕伯奢家，有杀其一家人之说。《魏书》和《世语》中确有此记载（前者说是“正当防卫”，后者说是错杀）。孙盛《杂记》中更有这样一段文字：“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枪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同上）这些都成了《三国演义》中描写曹操误杀吕伯奢一家九口的“原始材料”。小说让曹操狂躁地喊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其凶残性比董卓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观其一生，曹操远不是这样的疯狂之辈。曹操既然有“负人”之过，又有“负我”之德，二者兼而有之。对于个人恩怨，也是如此。曹操得势以后，手握生杀大权，也并不滥开杀戒，如不杀陈琳。陈琳有负于曹，为袁绍写文章骂他及至祖上，降曹后，曹爱其才而封其官职（《三国志·王粲传》第600页）。毕湛、魏种也有负于曹，被擒获后，曹不咎既往而用之（同上）。陈宫叛曹而投吕布，死心与曹为敌，更是有负于他。陈做了阶下囚，曹不忍杀之，只是由于陈宫实无面目求活而自就刑。陈宫死后，曹操犹善待其母女（《三国志·吕布传》第229页）。再者，曹操对先后投靠过他、并且明知怀有异心的刘备、关羽，也未简单地以“杀”来对待他们。可见曹操之为人，确有豁达大度的一面。

（责任编辑 赵友慈）

炎黄春秋

中国出版集团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集团 炎黄春秋社 创刊于1980年3月



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左),女儿瞿迪伊(中)



丁肇中在无尽探索中

“芦沟桥事变”时的守桥排长李文成
长沙大火及其引发的一场笔墨官司

藏匿在赛珍珠名著中的间谍秘密

丁肇中的科学之路

康熙和平统一台湾

ISSN 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 CN 11-2817 邮发代号: 82-507
定 价: 3.20元